内部材料
注意保存

苏修反华历史文章

内部材料
注意保存

苏修反华历史文章

出 版 说 明

为供批判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需要，现将最近两年苏修报刊、电台所发表的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问题上攻击、污蔑我国，歪曲和篡改历史的反动文章汇印一辑，内部发行。由于时间仓促，收集的文章不够完全，译文也未能仔细校勘。批判引用时，请核对原文，出处请注原载报刊。本书系内部材料，请各单位注意保存。

一九七三年七月

苏修反华历史文章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人民美术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1974年2月出版

书号 11002·439　定价 0.62 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阿穆尔河流域的古代遗迹说明了什么……（1）
远东考古的新发现 ……阿·巴·奥克拉德尼科夫（8）
论俄中边界形成史
……别斯克罗夫内、谢·齐赫文斯基、弗·赫沃斯托夫（39）
证实真相的文件——摘自俄中关系史 ……卡皮查（61）
帕米尔各族人民历史点滴（摘要）……伊斯坎达罗夫（67）
十八世纪下半叶清帝国入侵中亚和俄国的
政策……古列维奇（74）
齐赫文斯基主编《中国近代史》一书的《编者的话》和
关于俄中关系部分摘译 ……（93）
第一个平等协定——纪念苏中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签订四十九周年 ……阿列克谢耶夫（129）
北京怎样伪造历史 ……尼古拉耶夫（132）
研究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七〇年苏中关系的新
步骤 ……科瓦廖夫（144）

*　　*　　*

为北京的大国主义阴谋效劳的假
历史 ……阿斯塔菲耶夫、纳罗奇尼茨基（157）
毛分子的世界史概念和东方各国人民的真实
历史 ……别列柳勃斯基（171）

关于中国领导违反列宁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的
谈话……阿列克谢耶夫（184）
列宁论当代帝国主义矛盾及其发展的
学说（摘要）……普列特涅夫（186）
北京的“世界战略”后面掩盖着什么（摘要）……雷巴科夫（190）
在毛主义哈哈镜里反映出的世
界史……茹科夫、克里夫佐夫、费托夫（193）

阿穆尔河流域的古代遗迹说明了什么

在我们的国土上有这样一些地方，它好象古代史籍一样，向人们讲述人类“童年”的历史，因为古代的遗存象路标那样，表明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复杂的发展道路。

由于我们的考古学家多年的工作，苏联阿穆尔河流域已成为这样的地区之一。这里，在阿穆尔河两岸，由于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属于人类最早期发展阶段的出色的遗存。它们确切地证明，早在远古时代，苏联远东地区现代土著民族的直接祖先就住在该河流域。

近年来苏联阿穆尔河流域的考古发现，大部分是同著名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史学语文学与哲学研究所所长——阿列克赛·巴甫洛维奇·奥克拉德尼科夫院士的名字相联系的。不久前《新时代》的记者弗拉基米尔·特里佛诺夫到了新西伯利亚。他在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的科学城遇见了阿·巴·奥克拉德尼科夫，并同他进行了交谈。

“阿列克赛·巴甫洛维奇，多年来您在阿穆尔河流域和我国远东地区全境系统地从事考古发掘。请谈谈这个地区最有趣的发现及其科学意义吧。”

“远东地区早就引起了对该边区语言不同的许多族群的历史问题进行研究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的注意。

“在这方面，考古学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为远东地区绝大多数民族根本没有他们自己以文字记载的历史。考古遗存实质上

是研究远东地区民族史的唯一资料，并且是可靠的、完全准确的资料。因为这种资料属于某一具体的时期，后来没有被人歪曲过，而文字史料（例如编年史）却往往相反。

“远东地区，尤其是阿穆尔河流域的发掘，已经为历史学家提供了关于该地区远古民族史的重要资料。但是可以大胆地说，远东地区早期历史的研究进程越是向前扩展，这段历史就越是引起研究人员和广大读者的注意，而围绕着苏联远东地区及其相邻的东亚、中亚各国民族史主要问题的讨论也就越是热烈。

“最紧张的研究工作是在远东地区南部，即阿穆尔河流域、乌苏里江流域和滨海地区进行的。

“根据该地区考古发掘可以得出的主要结论是，阿穆尔河下游的古代文化有其鲜明的特点。还有一个结论也很重要，那就是阿穆尔河下游的远古文化，即新石器时代文化，同阿穆尔河诸民族——那乃族、尼夫赫族和乌里奇族的现代文化有着最密切的联系。从这里自然得出一个结论：这些民族的祖先许多千年之前就生活在本地；他们创造了高度的文化，这些文化较之当时东亚和中亚诸民族的著名文化毫不逊色”。

“请您谈得详细一点，这些对远东地区民族史极其重要的结论是以什么为根据的？”

“新石器时代远东地区居民的生活情景，大概以艺术遗存反映得最清楚。阿穆尔河下游定居渔人的新石器时代艺术是如此鲜明而独特，它在全世界新石器时代艺术史的背景上描绘了杰出的景象。阿穆尔河下游和乌苏里江沿岸的古代穴室出土的土穴居民的艺术作品，特别是带有纹饰的陶器，给人以难忘的印象。这些陶器的纹饰不是常见于森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简单的窝纹和刻纹，而是精致而巧究的曲线纹饰，有奇妙地交织起来的螺旋纹，甚至还有象古希腊或古罗马时代那样的几何图案呢！

“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沿岸的崖画（峭壁上的雕刻）在亚洲大陆古代居民的艺术创造史上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以情节之丰富、形象之多样而论，萨卡奇——阿良地方的崖画尤为出色。

“以上所述足以说明，阿穆尔河流域新石器时期的社会是相当发达的。现在已经毫无疑问，在远东地区，五、六千年之前就存在在当时来说完全是独立而兴旺的艺术文化发源地。就其创作能力而言，就情节和形象的独特而言，阿穆尔河流域诸民族的新石器时代艺术并不亚于与之同时期的任何一个艺术中心。不仅如此，同它们比较起来，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沿岸的雕刻匠人和装饰匠人的技巧更显得远为自由，更富有创造性的幻想。

“应当指出，对造象的比较研究表明，这种艺术是在阿穆尔河畔本地产生的，它有其自己的源流，而不是别的部落传进来的。

“在亚洲大陆的边远地区发现新石器时代阿穆尔河流域诸部落的丰富的艺术，这件事就已经不能不使人惊奇。但更为惊人的是另一个事实，即这个地区的古代和现代民间艺术的相似性。

“现在我们已可以十分确切地查明，新石器时代阿穆尔河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居民的文化不是同别的某一种文化相符，而恰恰是和尼夫赫、那乃以及乌里奇等民族的现代文化相吻合。这些相同点包括这些地区人们的全部生活方式（定居，以捕鱼为居民主要生业）。但最明显的是精神文化方面，尤其是艺术方面的相同点。

“因此，通过对阿穆尔河流域古代遗存的研究，便必然得出一个结论：苏联远东地区各民族的独特文化溯源于远古时代。阿穆尔河流域的土著民族及其文化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柢。他们直接继承了由其祖先创造的独特的高度艺术文化和这种文化的出色的遗存。

“多年来在阿穆尔河上游和中游，从斯烈甸斯克到勃拉戈维申斯克，以至沿着通往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的方向，也进行了广泛的

考古发掘。在滨海边区的范围内展开了对考古遗存的系统研究。这里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属于人类最初期的事实，即人类在远东地区的土地上最初的足迹。现在我们握有十分值得注意的阿穆尔河中游旧石器时代遗存，这里发现了远东地区的整整一个新的下旧石器时代文化区，它的特点是使用石器时代初期技术阶段的砾岩工具。

“这些出土物不仅对远东地区，而且对相邻的亚洲各地都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以新的角度反映了现代人的祖先对亚洲内地和东部边境的最初开拓过程。

“人类的伟大形成过程及其对地球的最初开发，这在东方并不只限于中国，而且也包括几十万年之前即在下旧石器时代就已经不再是荒无人迹的一些地区。

“根据最新的科学发现，那种把民族分为‘有史’民族和‘史外’民族的旧观点，那种以‘欧洲中心论’和‘亚洲中心论’的观点来对待世界文化——历史过程的看法是毫无道理的。企图把亚洲政治史上和文化史上的领导作用仅仅归诸于亚洲某个民族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请原谅我打断您的话，我只想提一下，在这方面，您很清楚，最近中国发表了形形色色的考古‘研究’的许多资料，依您看，这种对考古学异常广泛的兴趣是什么东西引起的？”

“在我看来，现在中国特别注意考古，其主要原因是毛主义分子企图‘科学地’论证一个神话，说中国在古代统治了几乎整个东亚。考古学被毛主义分子首先当作政治工具来利用。而且考古学是伪造的。因为现在根据近来的考古发掘所作的结论，一点也不符合实际事实。

“全世界都很熟悉中国的几个最大的考古学家的名字。例如，我们知道裴文中，他曾在北京附近的周口店洞穴轰动一时地发掘

中国猿人；还有研究新石器时代的吴达，以及其他许多人。但是，现在这些名字都在中国科学出版物中消声匿迹了。通常看到的只是那些背叛中国科学进步传统的人的名字，例如郭沫若。”

“八十岁的郭的姓名摆在各种反科学的胡说八道之下。他的新‘探索’是明显地脱离真正科学的事实的，实质上是在企图争得毛主义的上层人物的好感，企图停留在现今中国内部政治生活激烈斗争表面的欲望驱使下进行的。因此，我觉得郭沫若从前作为中国古代史学家的威望，现在已经给败坏了。”

“郭沫若的投机‘创作’，可以以科学院《考古》杂志上他的一篇叫《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的文章为标本。这篇文章的开头是很简单的，我不妨说，是在对卜天寿这个十二岁的孩子抄录孔子经典著作《论语》时写的幼稚的错别字作语文学的分析。”

“请详细一点谈谈这篇文章吧。如果这是语文学的论文，那么为什么把它放在考古学杂志上呢？”

“虽然它是一篇文字考证的论文，当然也可以登在考古学杂志上，因为抄本是一九六九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附近发掘的墓葬中出土的。但重要的是什么呢？郭沫若的文章中根本没有该墓葬其它出土物的确切资料。他只是局限于对抄本作语文学的分析，但突然间却完全出人意料地作出了根据整个上文无论如何也无法得出的结论。

“主要结论是说唐朝时候（618—907年）在新疆存在汉语学校。他论证的路子大致是这样的：因为墓葬出土汉文写本，说明这些地区在当时就是以汉语占统治地位的，设有汉语学校。因为写本错误百出，文法不通，说明这孩子‘并不是豪门子弟’，而是普通家庭出身，属于‘居民的广大阶层’。根据这一点又引出一个结论，说那里组成‘居民的广大阶层’的是中国人！这样一来，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从远古时代起就住着汉

人，而维吾尔人、哈萨克人等等现今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民族，那都是‘异族’。

“这个结论根本没有证据，也不可能有什么证据，因为根据那篇文章的资料是得不出这种结论的。依我看，它纯粹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写出来的。

“其次，郭沫若的文章还有一个奇怪的特点，这就是冲着苏联学者、苏联科学进行咒骂。我甚至认为郭沫若在其暮年的确损害了人格，现在已准不惜一切来保住由于他背弃马克思主义、背弃科学社会主义而由现今北京领导人赏给他的地位和许多封号。否则，很难解释在语文学的分析和他的文章中的一些话（例如‘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官僚和学者’，‘所谓汉学专家’）之间的联系。”

“您能否谈谈您所领导的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史学语文学与哲学研究所现在进行的工作？”

“我们的考古工作正在广泛地进行着，从新西伯利亚甚至从巴拉宾斯克开始，直至滨海地区的纳霍德卡城。这些工作首次包括了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整个古代史和文化。此外，正有一项也非常重要，那就是我们同蒙古考古学家的共同工作，苏联科学院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之间的合作。”

“你们的研究所具体同谁合作？”

“同以施·纳札格多尔什院士为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作。我们特别满意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院长勃·施连德勃院士对我们的共同工作所给予的巨大帮助。我们在蒙古的戈壁沙漠、西部和东部地区进行工作。

“去年秋天我们研究所在滨海地区纳霍德卡城附近进行了发掘。这些发掘有什么出色之处呢？那就是在我们面前展现了远东地区上古农业的图画。应当认为，农业居址、完整的农村，早在公元前二千年代甚至有可能是三千年代即已存在。而这一点是非常

重要的。因为过去总认为那些地区只有猎人和渔人。突然间我们在这里发现了独立的农业文化。然而恰好在蒙古也有类似的发现。这样便查明了石器时代在远东地区和蒙古都住有农人。这些研究更重要的是，过去总是把蒙古看成一个游牧地区。远东地区和蒙古的工作却能互相印证。

“有一种提法我认为是很生动而又很能说明我们所研究的问题的本质，就是‘文化的主权’，即文化的独立性。不过，这当然不排斥文化的互相影响和民族间的接触。

“过去，甚至有时候现在也是这样，在我们的科学中，更不消说西方的科学，只是片面地强调黄河的农业居民，中国的农业居民对邻近各族的影响。而现在已经查明，当时存在互相影响，并且大量的进步因素曾由蒙古和其它地区的草原民族以及阿穆尔河流域各族传入于古代中国农业居民的文化。

“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坚决反对那种为了自己实用主义的目的而离开真正科学的毛主义分子所奉行的对世界历史采取大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观点。”

（译自苏联《新时代》周刊1972年第25期）

远东考古的新发现

阿·巴·奥克拉德尼科夫

远东，这片起自阿穆尔河上游迄于太平洋、起自蒙古草原迄于太平洋岛屿世界的亚洲北部的辽阔大地，很久以来就吸引着研究亚洲大陆这一地区为数众多的操不同语言的诸族历史的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的注意力。

由于绝大多数远东民族（广义的民族，即族）或没有本身用文字记载的历史，没有文字，或曾有过文字（渤海人、女真人、契丹人），但是只保存了片断，有的则随着这些民族的迁走而湮灭了，因而考古学就占有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在此，考古学有权利做为研究历史的基本的或唯一的史料，而且这种史料是完全可靠的，因为它一般地属于具体的某一段时期，没有遭到后来的改动，而文字史料，例如带有后期抄录者和编纂者加工痕迹的编年史，却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形。

考古学史料特殊的珍贵性还在于它使我们可以深究远古的时代，这是受文献史料年代范围限制的史学家做不到的事。

可以大胆地说，今后随着远东早期史研究工作的不断展开，随着我们关于历史科学这个部门的知识日益充分，它将愈来愈大地引起研究者和广大读者的注意，我国远东和它接壤的亚洲东部和中部各国诸民族历史的基本问题以及直到澳洲甚至美洲大陆为止的更遥远的地域内的诸民族历史的基本问题，将引起愈益热烈的讨论。

往往可以见到这样的情形：一些观点和发现象爆炸似地突然闪现。在我国远东或比方在戈壁沙漠发现的一些乍看无关紧要的零碎事实，却能够导致往往竟是意想不到的新结论，导致对历史科学的未知领域进行新的探索，导致新的假说。不算太久以前，H. X.纳尔逊(P. Ч. 安竹思率领的著名的亚洲中部考古队的成员)在蒙古新石器时代居址发现石核(命名为"戈壁式"石核)就是一例。

后来，当这种独特的器物被发现于阿拉斯加的时候，纳尔逊便从中找到了解决"最初的美洲人"即古印地安人部落人居美洲大陆问题的关键。古印地安人部落的祖先由亚洲中部出发，越过白令海峡，入居于原先荒无人迹的新大陆。

当然，要把这些象流水一样不断涌现的科学情报以及在研究者视野中出现的纷芸复杂的事实、见解或观点都弄清楚，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必须从其中挑出一些带有关键性的基本题目和问题，通过对它们的考察便可以最省力地阐明我们所研究的这个区域历史发展过程中一切主要的、最本质的、最有代表性的东西。

为此，本文试图对远东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方面各项最重要的新发现做一总结并从理论上加以说明。

文明的起源

我们苏维埃历史科学在苏联远东诸民族远古史研究方面究竟取得了哪些基本成绩？

开头第一步就是大量扩充文献史料的基础，广泛开展田野考察工作，从而收集了经过认真科学鉴定的丰富的实物资料。

考察工作进行得最多的自然是在苏维埃时代，是在远东南部的阿穆尔河、乌苏里江、滨海等地区。其中有一九三五年在B. Г.

唐一波戈拉兹倡议下派往阿穆尔河下游的苏联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第一个专业考古工作队，这是阿穆尔河流域考古研究史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一九三五年的考古工作队并没有带回列宁格勒诸如古爱斯基摩型的华美的骨雕之类的珍品，应当说，这使波戈拉兹有点失望。但是，这个队发现并记录了几十处前所未知的古代居址，并且根据在那里收集到的大量资料做出了若干重要的一般性结论。

主要的结论是：阿穆尔河下游的古代文化具有鲜明的独特性。第二个同样重要的而且完全出人意料的结论就是：阿穆尔河下游远古文化（新石器时代文化）显出与阿穆尔河部落（那乃人〔译注：即赫哲人〕、尼夫赫人、乌里奇人）的现代民族学文化有着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真正"亲密"的关系，这是谁也想不到的事！

这样就查出了，几千年来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正是这些民族的祖先，而不是别的什么民族的祖先。他们曾经创造出当时高度发达的不亚于东亚、北亚其他民族著名文化的本地文化。

稍晚，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七一年，在阿穆尔河上、中游从斯列田斯克起到布拉戈维申斯克（译注：即海兰泡）止，再加上通往哈巴罗夫斯克〔译注：即伯力〕方向的一段，进行了广泛的田野工作，包括一系列大型遗迹的发掘。与此同时，在阿穆尔河左岸最大的支流结雅河河谷也进行了甚至更紧张的考古工作。结雅河及其支流曾是哥萨克部队从雅库特来到阿穆尔河地区的主要通道。

同时，从一九五三年起也展开了对滨海边疆区境内（南起朝鲜边界线北至捷丘贺〔译注：或译帖提尤贺，汉语"野猪河"的畸变〕，包括该边疆区南部全境和北部的一部分）的考古遗存的有系统的研究。应当补充一句，那几年的考古工作也包括了萨哈林岛（译注：即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继之，考古研究扩展到鄂霍茨克海岸马加丹附近及马加丹迤北。在楚科奇、科累马及堪察加等地进行了更为紧张的工作，邻近的雅库特情形也是如此。

光是以上开列的地区名单就给人以海阔天空的印象，考古学家好象突然走进了一个未曾经历而引人入胜的古代文化和古代民族的世界。而那些考古发现的本身，那一幅通过考古发掘得以恢复的历史图景同样是宏伟动人的。

仅就远东的阿穆尔河流域和滨海本身而言，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有关人类史的开端，有关人类在远东的最初足迹的那些事实。

自有考古研究以来，远东考古地图上最重大的空白就是没有旧石器时代遗存。

从一八七一年伊尔库茨克军医院附近发现西伯利亚第一个旧石器遗址算起，安加拉河流域的旧石器时代遗存为人所知已经有一百年。稍晚，叶尼塞河上的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有旧石器出土，随后在色楞格河以及勒拿河流域也有旧石器发现。在比较晚近的时期，一九四九年，在亚洲中部的蒙古腹地（乌兰巴托市土拉地方；蒙古人民共和国东部；南部，即戈壁；西部，即蒙古阿尔泰地区）发现了毋容争辩的旧石器遗存。

旧石器时代以亚洲东部最古老的周口店及鄂尔多斯出土物为代表。然而和北亚这些地区最靠近的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活动遗迹，过去在远东却没有发现。

现在我们终于掌握到了阿穆尔河中游的极有价值的旧石器时代遗存。这首先是费利莫施卡村原始砾石工具发现地。这些石器的加工技术以及器形如此原始而古拙，以至可以归属于石器时代技术的开始阶段。石英砾石在一端仅有一个唯一的打痕，形成粗糙的有缺口的刃部，和这类工具（刮削器的母型）一起还发现具有同样缺口的砾石，但缺口位于两侧，彼此相对。这种粗陋工具的缺口之间有一个好象“小鼻子”的突出部。

在另外两个明显的下旧石器发现地，也发现了与费利莫施卡

出土的一模一样的带“小鼻子”的砾石工具，即刮削器状的厚重器物——砍砸器以及打制后所剩的砾石块(石核)。头一个发现地是阿穆尔河边的库马拉村。其二是结雅河边的乌斯奇一图地方，位于同名村庄的下水方向。这样，在远东便突然发现了一个在类型学方面以砾石器物为特征的新的下旧石器时代文化区。

广泛采用砾石制作劳动工具的石器加工技术；生产这类工具时的极度省力；砍砸器状的粗陋砍伐工具及由这些砾石打出的石核等工具类型——这些特点的总和，不仅构成一个特定的统一体，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而且还显示出与亚洲、非洲和欧洲下旧石器时代普遍流行的砾石器体系有着惊人的相似点。如东南亚（柬埔寨）、非洲(奥杜威)和中欧的下旧石器遗存都属于此类。

这些发现物不仅对于远东而且对于邻近的亚洲各地区都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有了这些发现，现代人的祖先对于亚洲大陆内地以及大陆东隅最初的开发过程，便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我们眼前了。如果早先可以以为，古人（尼安德特人的先辈）向亚洲内陆的移动停止于中国北部的周口店，那么，现在已有根据来重新考虑这个传统的观念。

除结雅河及阿穆尔河的发现物以外，古老的砾石文化在阿尔泰(乌拉一林卡)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东部地区(沙音山达)同样出人意料的发现，也可以证明上述的看法。

由此可见，人类的形成及其对地球的最初开发的伟大过程并不局限于中国的东部，而是包括了在几十万年以前的下旧石器时代就已不是无人荒原的亚洲北部和中部的上述区域。

这些真正原始的远东最初居民的创造性活动，在上述基地上，继续发扬光大，呈现出更加宽广的、可以说更加动人的远景。

这里所指的是在同一地域内发现的另一些也很有特色的石器时代遗存。现在我们来谈一谈表明石器加工技术（这是旧石器时

代人类生产活动的基础)已显著进步的那些石制工具(与砾石工具共出于库马拉)。

在库马拉,离粗陋的砾石工具发现地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一些以同样的黑色矽质岩砾石材料而用完全另一种方法制造的器物。古代匠人照旧在河边石滩上拣取同样的砾石,但是却用根本不同的方法加以处理。他猛击砾石侧面,打掉一块石头。这样作成一个倾斜的刃部。然而这并不是刮削器或斧形工具的刃,而只是一个台面,在那上面再进行打击,以便从砾石平面上分离出长而锐的石片。他操作的目的正是获得这些石片,而不是要砾石本身。每一个石片可以当做现成的工具使用,代替今天的刀子,需要时,也可以当做矛头或者加工兽皮的刮削器。

这样,我们便看到由古朴的砾石技术演变出一种全新的加工技术——勒瓦娄哇打片技术。

这种技术的出现,同时还证明着人类本身的体质与精神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根本性的变化。需要一双更加灵活更加巧妙的手,才能完成预先确定的细致的而且经过周密算计的工序。为完成这一工序而对砾石进行预先加工,就非有比先前复杂得多深刻得多的思维活动不可。这个工序也要求一个比较精确的计划。需要比前一时期的人预见到更远的事物。这就是说,在劳动过程中,头脑已经成熟到足以胜任这样一类操作的程度。

库马拉的发现物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完全合乎规律的现象,是人类及其社会组织继续进化的实物证据。这一点可以从亚洲大陆邻近地区的发现中得到证实。正是这种勒瓦娄哇技术逐渐占据了亚洲中部、南西伯利亚和阿尔泰山前的广大地域。

勒瓦娄哇技术在中亚山区与同一技术会合,这种技术从伊朗著名的毕素屯洞穴时期起就成为近东旧石器中期的典型技术。毕素屯洞穴头顶的岩壁上,就刻着那个东方史中闻名的记述大流士

一世为维护波斯阿凯米尼得王朝统治权而与祆教徒战斗的事迹的宏大铭文。

这样就查明了，在我国远东境内历史不但很早就开始，而且沿着进步的道路不断前进。当然，是以石器时代的速度缓缓前进的，但一直是势不可挡地前进着。它在前进的过程中与整个旧石器世界其他地区不是隔绝的，而是互相交流着文化的财富和成就。

因此，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古老的俄罗斯村庄坦博夫卡附近阿穆尔河高岸上的采沙场里发现的用稀有岩石（坚固的发白色的石英石）作成的刀身形尖状器（клинок）是一件很值得注意的器物。它很象旧石器时代晚期桂叶状的刀身形尖状器，但是它厚重得多。它使我想起一件另外的东西：两面器，即属于更早时期的从两面打去宽大石料而形成的厚重的刀身形尖状器。这就是我们从教科书和博物馆收藏品中熟悉的那种下旧石器时代阿舍利晚期的手斧，即巴黎附近索姆河砾石层中出土的那一类。

如果不是一九六九年我们乘车经过蒙古东部沙音山达以西的沙漠时在雅尔赫山下看到沙土中露头的优质黄色玉石脉，又在它旁边看到了原始人的作坊的话，阿穆尔河流域的两面器可能至今还是一个谜。在这个作坊里我们发现了一些绝对想不到能在遥远的东方、在亚洲中部的地层里见到的器物。这里竟有典型的阿舍利型手斧的厚重的两面器石坯！有扁桃形的和三角形的及粗陋的勒瓦娄哇型石核和石片。

要理解这些发现物的重要性，就必须想到，亚洲中部及其邻近地区人类最初入居的情况，不久以前在我们心目中还呈现为这样一幅画面：喜玛拉雅山和天山以南居住着有手斧的部落，以北则是由打制砾石（即砍砸器）文化的所有者入居的地区。现在对这幅画面就需要做一些重要的改动了。这些改动并不是要在考古地图上增添一些以同样颜色标示的整片分布区，而是要画出一些镶嵌

式的或者“万花筒式”的地带，在这些地带，诸原始人群占据的地区奇异地互相交错着。其中每一人群在文化方面都有其“民族学”的特点。就象一个个的“原子”似的，诸原始猎人群处于经常的运动之中，为了追逐猎获物而长途跋涉。

大约就是这些小股的人群（“旧石器时代的原子”）之一在阿穆尔河岸今日的坦博夫卡村遗下了自己的手斧——尖状器。

我国远东生活的下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就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和由旧石器向新石器的过渡时期，一般叫做中石器时代。

奥西诺夫卡村边的岗丘上发现了乌苏里斯克（译注：即双城子）地区最古的居址，在厚厚的风化沉积层里埋藏着奇特的令人费解的石核状砍伐器，这些值得注意的遗存在文献中已经得到阐述。这些砍伐器酷似出自哈萨克斯坦并被断为下旧石器时代的劳动工具。

塔杜施河乌斯金诺夫卡村附近两个地层的居址也是同样值得注意的。这里可以看到，古老的勒瓦娄哇技术还明显地留有残迹，同时也产生了以特殊的“戈壁型”或端面型石核为代表的新技术。值得注意的是，与这种石核共出的还有其他形式的同类器物：阿拉雅（Арая）型的切割器、刮削器、宽石片。这些器物曾见于日本列岛陶器前文化中，经放射性碳素测定，日本出土的工具的年龄确定为一万二千至一万七千年！日本陶器前文化及滨海地区乌斯金诺夫卡文化的共同来源，可能是亚洲中部（或更确切地说是东蒙）的中石器时代或旧石器时代晚期。正是在那里，在靠近阿尔丹—戈勒河口的哈尔兴—戈勒河岸上居住过一个古代部落，在他们的住所遗址上留存了与上述同样的器物。远在西伯利亚腹地的伊尔库茨克附近，在各国考古学家早已知道的维尔霍林斯克山旧石器时代晚期居址里也出土了相似的东西。

“最初的美洲人”（美洲印地安人的远祖）走向白令海峡并由那

里走向阿拉斯加的道路，正如H. X. 纳尔逊早在二十年代就推测过的那样，可能就是从这里，即从亚洲腹地蒙古开始的。

但是这样一幅豁然展现的充满事件的历史图景，若同下一个时代即新石器时代相比，则又显得黯淡了。

远东古代诸部落的创造力和文化的独特性在新石器时代得到特别鲜明而尽致的表露。

时代的联系

北亚史上的新石器时代是北亚民族史和文化史中真正的转折阶段。它表现在这时新石器时代遗存已经可以明确地划分成几个地区性的大群，划分成几种考古学文化，这些文化分别属于远古时代居住于西起乌拉尔东至太平洋、北起北冰洋南至蒙古草原的这片疆域之上的各个族。

在这些文化当中，远东新石器时代文化有与众不同的深刻特点。首先引人注意的，就是阿穆尔河与滨海地区新石器时代部落的经济生活结构与居住在东西伯利亚森林的近邻有根本的区别。

自从在西伯利亚的河流沿岸第一次发现磨制石斧以后，认为西伯利亚新石器时代居民是游动的猎人和渔人的观点，在科学界已成为定论。他们在勒拿河、叶尼塞河、安加拉河流域的临时宿地上，的确只遗留了一些石灶，那上面曾经搭盖过简单的兽皮窝棚。

然而，使我们惊讶不已的是，在阿穆尔河岸上却发现了真正的村落遗迹。这是由一些巨大的、不少是结构坚固的公社住所组成的石器时代村址。这些房屋的基底是挖得很深的地坑。要挖这样的一个地坑，没有几十个劳力恐怕是办不到的。

稳固的长期定居必须以具备经常而丰富的食物来源为基础。这首先取决于我国远东特殊的自然条件。真的，过了雅布洛诺夫

山脉(译注:即外兴安岭)往东去,自然面貌就大变样。我们看惯了的白桦树在今日布拉戈维申斯克地区变成了艾尔曼种黑桦树。在辽阔的阿穆尔河高草原上生长的不再是松树和落叶松,而是柞树丛,野苹果、梨、葡萄的小丛林,有些僻静的湖泊水面上开着世界上最北的莲花。一句话,在这里展现了一个由乌苏里原始森林和满洲植物界构成的美妙多采的世界。满洲植物界以其富饶、以其南北形态奇异的搀混曾使我国早期的旅行家和博物学家马克西莫维奇、玛阿克、普勒热瓦尔斯基、科马罗夫等人为之惊倒。

但是,远东自然界的另一个特点对于我国远东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方向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正是这个特点给石器时代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经济和全部生活打下特别深刻的和有代表性的印记。每年一定的季节,无数的迴游性海鱼群(大马哈鱼、北鳟、王大马哈鱼)被延续后代的本能所驱使,由海洋深处沿河流溯游而上寻找产卵地。鱼量本来就十分丰富的河流,在这时期简直被鱼类挤得无处容纳了。

于是,靠近最便于撒网的鱼量丰富的地方,在小支流的河口处,在高峻陡峭的岸隈上,从远古时起就出现了阿穆尔和滨海地区河川渔人的大片的村落。不少村落有几十间宽大的半地穴式住所,居住者在那里度过漫长的冬季,到夏天他们就要搬进简单的地上建筑。住房旁边必定还安放着晒鱼干用的架子,插着系狗用的竿子,构筑着存放生产用具的仓库。这些东西使石器时代的渔村景色更显得丰富多采。

阿穆尔河新石器时代渔人的定居生活方式还反映在许多有代表性的生活细节上。首先,拿最普通的而且最能说明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的材料陶器来说,它的种种特点应当看做是与渔人的定居生活有关的。除了显然由北方带来的萨尔戈勒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容器以外,阿穆尔河地区的远古陶器都不是象西伯利亚东部和

西部原始森林地带陶器那样的尖底的，而是平底的。狩猎者帐篷的居住者既没有架板也没有长凳，他们直接坐在泥地上。所以他们的器皿或者以其尖底直接插在地里，或者安放在三块石头上。而阿穆尔河地区的住所里却有比较复杂的家具，有架板，有铺板；陶器可以稳当地放在上面。阿穆尔河地区出土的容器的体积与贝加尔湖沿岸出土物有很大悬殊，它们比森林猎人的器皿容量大、体积大。有的大概已经不是煮食物用的罐，而是贮存食物用的真正的瓮。此外，和煮食物用因而布满烟焰的陶罐的粗厚残片一起，在阿穆尔河地区还往往可以见到质地疏松的带有精致花纹甚至彩绘的薄壁器皿残片。

同样有代表性的是，新石器时代的河岸海边渔人与森林猎人不同，他们不是用兽皮和桦树皮制作衣着和家具，而是普遍地使用植物纤维。

此外，陶纺轮（有的用陶器破片刻成）大量地存在于滨海和阿穆尔河地区也可以证明那里在新石器时代纺织工业已经相当发达。这类陶轮有些也可以用做织机的部件，即小坠物。

至于渔人的劳动工具，属于大型石器的，在阿穆尔河地区常见一种火山岩石制成的带孔圆形石块，即石槌或“石拳”。据乌里奇和吉里亚克老年人解释，这种工具的用途是弄死被叉住网住或钓住的大鱼（鲟鱼或鳇鱼）。除了用这个办法，乘坐在易碎的小船上的渔人没有别的法子对付牠们。可见，在新石器时代鼎盛期的开端，在这一带不仅能够捕捞小鱼，而且大鱼也成为普通的捕获物了。

有凹槽以便系绳的网坠或一端有孔呈秤砣状的大型网坠同样代表了阿穆尔河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特征。这种秤砣形的大网坠应当不仅是用于小鱼网的，而且也用来装备重网，在水流湍急的大河上捕捞。

砍伐工具的丰富也不是偶然现象，其中有一些是加工木器用

的打磨精致的工具(木头当然不仅仅用于建筑住所,而且用于制造各式各样的捕具、鱼栅和鱼梁,也用于制造独木舟)。此外,在孔东还发现大量两端被树脂染成一片漆黑的狭长的椭圆砾石。这种砾石可能是用来蘸桦树脂给轻便的桦皮舟填缝。

上述种种捕捞工具证明一个重要的因素,即新石器时代存在着集体捕鱼的方式。一次捕捞有几十人参加,甚至整个公社参加。大规模的集体捕捞,特别在鱼汛期捕捞迴游性鱼类,比起在大河或西伯利亚林中小河里用鱼钩或鱼叉单人捕捞生产效果要大无数倍,这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公众捕捞的方式决不排除单人作业。新石器时代阿穆尔河渔人发明了自己的一套单人捕鱼的工具,并且创造了一套打鱼的方法。

在孔东发现的一头磨圆一头有钻孔的带槽的软玉片可以做为上述的证明。这件器物不寻常的地方,不仅仅在于它的原料当时稀少因而特别贵重,而且在于它研磨得非常精细,形制非常奇特。把它放在水里做一个简单的试验就明白了,这个东西是石器时代渔人装在钓钩上的假鱼。

远东新石器时代图景中最后一部分也是最鲜明的一部分是艺术遗存。远东新石器时代诸部落中以阿穆尔河下游定居渔人的艺术创作表现得最为有力。

阿穆尔河下游新石器时代艺术是如此地鲜明而独特,以至放在全世界新石器时代艺术史的背景上,它也显出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现象。阿穆尔河下游和乌苏里江古代穴室里出土的带纹饰的陶器给人以难忘的印象。这些器皿上的纹饰不是森林地区新石器时代常见的简单的窝纹和刻纹,而是意想不到地精细和考究的曲线图案,这些图案呈奇妙交织的螺旋纹状,甚至还有与希腊罗马古典时期完全相同的折线几何纹的形状。

新石器时代的阿穆尔河地区艺术宝藏的第二个组成部分——雕塑——有一件代表作，即一个妇女雕像。它是这种类型的作品中独一无二的完美的标本。

这个雕像以粘土为材料，雕刻完成后，经过细心的擦光和焙烧。雕像的外观和造型不仅表明其作者具有真正雕刻家的有经验的手和富有观察力的眼睛，而且表明存在着某一创作流派。这个作品似乎是融汇了许多代雕塑匠人的经验，反映出若干世纪形成的传统。

这个雕像全然是写实的。它从几千年前的混沌雾障中简直把古代民族的一个女子肖像留传到了我们今天，而不单纯是这个族的妇女形像。

这位新石器时代的雕塑家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真挚的热情用粘土塑造成一个特定人物的面貌。今天在孔东村美丽的那乃姑娘们当中可以看到和这个雕像一模一样的面孔。她们的轻盈婀娜的体态也活现在这个在石器时代住所的填土层中沉睡了几千年的小雕像身上。

阿穆尔河及乌苏里江的岩画在亚洲大陆古代居民的艺术创作史中占据着极为特殊的地位。就题材之丰富和形象之多样，以萨卡奇—阿梁的岩画首屈一指。乌苏里江舍列美切沃村下水岩壁上的图画、基雅河右岸（由哈巴罗夫斯克，沿旱路去符拉迪沃斯托克〔译注：即海参崴〕途中的九十公里处）岩壁上的图画、阿穆尔河下游卡利诺夫卡村边的岩画，以及绥芬河“熊脸峡”小洞穴中现已剥落的图画，按其风格和题材都和萨卡奇—阿梁岩画同属一类。

这些图画的“节目”是固定的，其基础也是一个式样的。占第一位的是人面图案画一类的人形题材。它们彼此不是绝对重复，但仍可按照总的轮廓来分类，至少可以分成八个基本类型或八个

组：椭圆形、卵状椭圆形、心形、梯形、方形、上圆下直形、猴头形或颅骨形、还有一种只画出局部的头像，即只用窝点表示眼和嘴，没有外圈——轮廓线。

阿穆尔河及乌苏里江岩壁上的第二类图画是麋像和鹿像。第三类是蛇像。第四类是禽鸟像。还有载人小舟的象征性图案画。至于人形画像则是过去实际生活中存在过的头像面具的写真。

后者把我们引入了有关面具的宽广的知识领域。面具在一切或绝大多数民族的历史上都曾普遍流行。它表示阴间的幽冥之物——鬼魂的形象。活人戴上它便成为鬼魂的化身，在需要鬼魂出场的各种仪式和祭祀活动中面具是不可缺少的用具。柯赫·格伦堡谈到巴西印地安人时说："鬼魂附在面具里，面具体现鬼魂，所以当舞蹈者戴着这种独特的面具的时候，鬼魂就一直附在他们的体内。"(A. 几. 阿弗捷也夫：《戏剧的起源。原始公社制度中的戏剧成分》，莫斯科一列宁格勒，一九五九年，一四二页。)在这方面很有代表性的是，乌苏里江及阿穆尔河岩画中有一组很特别的头像，它们描绘的显然不是活人的面孔，而是人的颅骨——"骷髅头像"。例如，舍列美切沃村两幅保存完好的头像就是这样的，它的轮廓线勾出失去皮肉的颅骨的形状，嘴里呲露的牙齿象一排密密麻麻的木栅。这自然是死人颅骨的面具。

这种面具在南太平洋及非洲的各种部落中曾经广泛流行。往往它们正是抹着粘土或施以彩绘的部分颅骨或整个颅骨，它们是死者鬼魂的容身处，是鬼魂的代表物。这种做为鬼魂化身的面具出现在各种戏剧性的表演中，出现在秘密宗教仪式（宗教戏剧的萌芽）中。

在这类秘密仪式里，与男性秘密会团的活动有关联的那些仪式占重要地位。这些仪式的目的是巩固男人在原始公社里的统治地位，对妇女实行恐吓。有戴面具的化装舞蹈者参加的仪式的具体

内容主要是举行成丁礼，即授予少年以享受全权的公社成年成员地位以及男性秘密会团成员地位的典礼。在古代公社社会结构发展的较高水平上，当具备了相当于由母系氏族过渡为父系氏族的经济前题条件的时候，便出现了这样一类的男性的会团。在一些情况下，生产性经济（即农业）的出现构成这种前题条件。在另一些情况下，如在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地区，阿穆尔河型的渔人专门化经济可以起到这种作用。

以上所述就足以说明，不能把阿穆尔河新石器时代居民的社会看做是简单的"原始的"，而应当看做是充分发达的社会。

当然，这里必须特别着重提出它的艺术的特点和高度的艺术价值。现在已经不可能怀疑，五、六千年以前在远东存在过一个完全独特的并且对当时说来是强大的艺术文化发源地。

远东新石器时代艺术就其创造力，就其题材和形式的独创性，比起与它同时的任何一个艺术中心，例如新石器时代存在于黄河仰韶文化地区的艺术中心，毫不逊色。不仅如此，和后者的艺术比较起来，阿穆尔河及乌苏里江新石器时代雕塑匠和纹饰匠的技巧显示出大得不可比拟的自由和创作想象力。

至于孔东村的妇女圆塑像，它是那么富于写实感，体现了那么丰富的真挚感情，以至仰韶陶匠们的粗陋雕塑，甚至日本列岛虾夷绳文文化陶器艺术家们的雕塑作品都根本无法与之相比。我们见到的绳文文化的人形造像，堆砌了许多离奇的繁缛装饰和涡文。而在阿穆尔河这里，清晰而明快的手法占着上风。

阿穆尔河下游的一些比较简单的但同样是写实性的燧石雕刻也具备这个特色。这些雕刻尽管形式有些简略（由于燧石和玉髓质地的特点），但同样清晰地刻划出兽类、鱼类（有时还有禽类）的写实的形象。

在分析阿穆尔河石器时代艺术的独特性这一部分，最后要谈

的是它的起源问题。拿岩画中那些最可能是细嘴松鸡的松林飞禽栖息图与萨卡奇—阿梁出土的燧石鸟像对照，便可以证实，这种艺术是在阿穆尔河当地诞生和成长的。它溯源于本身的中石器时代，既不是外面的异族部落带进来的，也不是从那里借用的。

在亚洲大陆遥远的边陲发现了阿穆尔河新石器时代部落的丰富文化，这种即使用现代眼光来看也属第一流的古代文化源地从真正的"时代的黑幕"之后出现在我们眼前，这件事情本身就不能不令人惊讶。但是更加令人震惊的还是另一个事实。苏维埃时代第一次于一九三五年派往阿穆尔河下游的专业考古队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做出了这样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这个地区的古代艺术和现代艺术相似。

后来，特别在《远东各族文化的渊源》(一九五四年)这篇文章中(《古代文化探踪——从伏尔加河到太平洋》文集。莫斯科，一九五四年，二二五——二六〇页。)，这个结论大大地加深和扩大了。现在我们可以更加充分和清楚地考察出，阿穆尔河及乌苏里江流域新石器时代居民的文化不是与别的什么文化相一致，而正是与尼夫赫人(吉利亚克人)、那乃人(果尔特人)以及乌里奇人这些部落的现代民族文化相一致。

这种一致性涉及整个生活方式(定居、长期的住所、捕鱼为基本生业)。但是在精神文化领域，首先在艺术和纹饰中，这种一致性表露得最著目和明显。

首先就是螺旋纹。螺旋纹既是阿穆尔河部落新石器时代纹饰的主要财富，也是他们现代纹饰的主要财富。

除了螺旋形花纹的种种变体以外，新石器时代阿穆尔河诸部落中还盛行一种由较宽的带子彼此交织而形成菱格网状的花纹——"阿穆尔河编织纹"。"阿穆尔河编织纹"是远东新石器时代纹饰的基础，在同样程度上也是现代纹饰的基础。

“阿穆尔河编织纹”类型的花纹至今还见于阿穆尔河沿岸诸民族，它是现代花纹的无可争辩的“始祖”。这个图案至今保留着它原来的简朴形式，与新石器时代的原貌毫无实质性的差别。在这里我们见到的仍然是棋盘式布局而以衬底的空白条纹彼此隔开的菱形。这个“衬底”本身其实是真正的纹饰，而菱形不过是衬底。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是，这种以各类变体的形式不仅流行于阿穆尔河下游，而且也流行于乌苏里江流域（例如舍列美切沃村新石器时代居址）以及乌苏里斯克市附近（奥西诺夫卡新石器时代地层）的“阿穆尔河编织纹”，正是滨海地区和阿穆尔河沿岸所特有的花纹。它不见于以上几个地区之外的任何地方。这一点是和螺旋纹不同的。

因而，“阿穆尔河编织纹”是最精确的“族属指示器”，是考察古代民族关系的一种石蕊试纸。

根据螺旋纹和“阿穆尔河编织纹”这两个因素，特别是根据后者，完全有充足的理由提出阿穆尔河部落古代文化与远东某些部族现代艺术之间的渊源关系的问题。然而它们之间的相似点还要广泛的多，不仅仅局限于这两个特殊的因素。

我们已经看到，岩画是远东居民艺术文化的第二个同样有代表性的组成部分。远东诸部落的审美观和对周围世界的艺术感触，在岩画中表现得更加强烈，更加集中。

在阿穆尔河及乌苏里江的岩画中，当然既没有“阿穆尔河编织纹”，也没有以篦点纹技术做出的之字纹。在这里寻找那样的花纹完全是徒劳的。那都是纯属日常生活的纹饰，它们和陶器，衣着及各种木、骨生活用具有机地连系在一起。乍一看可能会觉得岩画与阿穆尔河部落现代装饰艺术没有什么联系。但这只是初看的印象而已。

实际上曲线条在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一带的岩画中不仅存

在，而且占头等的地位。这种对阿穆尔河流域现代和古代纹饰的面貌和本质起决定作用的曲线花纹具有各种形态和变体。那当然不止是同心圆，不止是各种弧线，而且还包括“地地道道的”螺旋纹——阿穆尔河沿岸纹饰的“灵魂”。螺旋纹不仅存在于那乃人或尼夫赫人的现代花纹中，而且也是构成萨卡奇—阿梁岩画及其他地点的岩画各种题材的基本因素。

螺旋纹或其衍生物(同心圆)有时候用作画面内部空间的装饰性填充物，它补充画面，起着画面细部的作用。例如，萨卡奇—阿梁的某些头像的眼睛，或图案化的鹿像中的涡卷饰纹和圆圈，都属于这一类。我们看到过，有时头像的鼻子也以同样的方式刻成涡纹的形状。还有更为显著的例子，即岩画的整个画面都是用同心圆或螺旋纹构成的。

在具体的形象和题材方面，也可以进一步考察出古代岩画艺术与现代艺术的一致性。蛇、“慕度尔”、龙在那乃人的纹饰和岩画中也都是习见和传统的因素。那乃人的“慕度尔”通常不但弯曲为波浪形的条带，而且盘成紧密的螺旋形，而萨卡奇—阿梁的巨石上或乌苏里江岸的岩壁上所刻画的也正是那样。

在乌苏里江和阿穆尔河沿岸发现的岩画上，还可以见到一些鹿像，它们不但有涡卷饰纹，而且还特有横越躯体的直线带纹。据Б. 劳费尔说，阿穆尔河沿岸诸部落的纹饰中，鹿像起着极重要的作用，仅次于“公鸡”和龙。他发表的阿穆尔河沿岸诸部落的纹饰标本中，鹿像同岩画一样，身上正好也带有这样的横带。

岩画上第三种形象是禽类，它不那么常见，但极为重要。有人认为，现代那乃人的纹饰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公鸡”。然而，细看劳费尔发表的纹饰标本，可以发现也有岩画中的那些水禽：鹅、鸭或天鹅的形象。

阿穆尔河沿岸岩画中的人形怪异头像也不是消失得无踪无

影，它也进入了后代的纹饰成分之列，成为后代纹饰的基本内容之一。它被采用于阿穆尔河流域纹饰的方式，也和鱼、禽等形象相同。头像被当作一种“建筑材料”使用，成为繁缛的纹饰构图的细部。

但与鱼、禽形象所不同的是，头像完全纳入了纹饰的整体结构，几乎完全溶化在其中而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以至只有拿纹饰同起初单独地刻着头像的岩画相比较，才能把它识别出来。

这样，岩画上的基本图形便都重见于现代的纹饰，包括猴形和螺旋状的面具头像，身上有横带纹的鹿像，水禽和蛇。

根据新石器时代的纹饰、岩画同现代民族学艺术题材的相似点，我们便有可能通过语义学的研究，通过分析作品的思想内容，来进一步探索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例如，岩画上的一对水禽图像，可以借助于同萨卡奇一阿梁岩画有关的那乃人的创世神话得到解释。这个神话讲的是两只水禽（天鹅）创造宇宙的故事，据说牠们潜到水下，从淹没世界的一片汪洋的海底衔出泥土。

岩画上的“嘉度尔”蛇也是一个流传最广的神话英雄。牠有时被说成是善良的，有时被说成是凶恶的，与人为敌的，但不管怎么说都是神通广大的英雄。那乃人似乎为了强调这个神灵和他们特别亲近，不用借来的异族的“龙”字来称呼牠，而用其本族的“嘉度尔”一词来称呼牠。根据关于巨蛇的传说，也可以断定那乃人的“嘉度尔”起源于本地。巨蛇的传说不仅流传于阿穆尔河流域的居民中，而且流传于离这里很远的若干北方部族（通古斯部落的后裔）之中。后者的说法是，开天辟地之初，有一条巨蛇出来整治大地，开拓通道——河床和湖底。

小舟图像是一个有代表性的题材，它对于探索岩画同阿穆尔河流域民族学之间的关系也是有价值的。Л. И. 施连克和Б. А. 库夫廷先后描述了出动小舟的仪式。

在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沿岸的岩画上，可以看到施连克和库夫廷所描述的仪式中出现的那种“载满人”的小舟。大概二者的含意也是一样的：禳祓恶魔并祭祀河神。

关于时代的联系即阿穆尔河沿岸诸民族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联系，还有一个也许是最令人想象不到的例子，这就是关于骷髅头骑马漫游的那乃神话。这个神话是广泛流传于北亚诸民族(包括居地遥远的民族)的一系列关于骷髅头漫游的神话之一。这个古亚细亚的传说故事起源极为古老，毫无疑问属于石器时代，并且建立在颅骨崇拜的基础上。在勒拿河与安加拉河沿岸进行发掘时，我们曾在新石器时代和格拉兹科沃时期的墓葬中不止一次地发现过没有颅骨的骨架，有时在骨架旁边还见到过“别人的”颅骨。更有意思的是，萨卡奇—阿梁的一幅很古老的岩画上，刻着一个骑马的骷髅头像，它简直可以当作关于骷髅头骑马漫游的那乃神话的图解！

萨卡奇—阿梁岩画的最后一类，也是数量最多的一类，即人形图像，也显示出与民族学材料的一致性。萨卡奇—阿梁岩画里少有的几个刻有身躯的人形图像中，有一幅相当大的图像，无手，身内空处填以人字纹，代表“肋骨”。那乃猎人的神像（或称为“吉尔基”或“吉尔基—艾雅米”），也正是这样描绘的。十分重要的是，萨卡奇—阿梁的神像是在玄武岩巨石的棱部凿出的，因而具有立体形式。看来，其母型当与现代那乃人的木雕神像相似。岩画头像上“光芒四射”的帽子或头发，也使人想起那乃人和尼夫赫人表示萨满教鬼魂的古代木雕的顶饰。

岩画中的人形头像同阿穆尔河沿岸诸民族的萨满教巫祝仪式成分之间的联系，最明显地表现在那乃人和乌德盖人的萨满教巫祝仪式用的面具上。哈巴罗夫斯克地志博物馆的民族学收藏品中有两件这样的木制面具(№16、17)。它们的外貌，特别是大概表

示刺面文身的黑色及红色螺旋纹，几乎完全重复着萨卡奇—阿梁巨石上凿刻的某些头像的花纹和外貌。我们知道，面具表示萨满“化身”为面具上描绘的那种幽冥之物——鬼魂。因此，萨卡奇—阿梁头像同萨满的木制面具之间的一致性是自然而然的了。

分析岩画同阿穆尔河流域诸部落宗教艺术品之间的上述一致性，再一次证实了关于阿穆尔河流域古代艺术与现代（即民族学的）艺术之间存在亲缘关系和继承关系的想法。

同时，这些一致性也使我们能够比较贴切地理解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一带岩画的含意，它与古代神话和萨满教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古代信仰的遗址以大大改观的残留形式流传到现代，存在于施连克、劳费尔、施特恩别格、洛巴金、施姆凯维奇及其他民族学家所见的十九世纪至廿世纪初的民族学现实之中。

当然不能断言古代信仰和远古创造的艺术形式整个地或者多少完整不变地流传到我们现代。从新石器时代起，阿穆尔河流域诸民族走过了漫长而复杂的文化发展道路，经历了不少重大的历史事件和转折。比方说，在阿穆尔河中游及滨海，先后兴起又衰亡了一些由当地居民创建的国家，如契丹人的“铁的”辽帝国或“黄金的”金帝国，在它们以前还有渤海国（以其高度文化而闻名），尽管阿穆尔河下流诸部落距离激荡于那些地区的政治风暴十分遥远，但是那些变动总会这样或那样地反映在这些北方部落的文化（包括艺术）当中。

在这方面，萨卡奇—阿梁的金属时代岩画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它们反映出草原世界的骑士及游牧人的思维方式，也具体显示出靺鞨部落同亚洲中部及中亚突厥部族之间的联系。

因此，施连克和劳费尔就曾提出的一个问题，即关于阿穆尔河部落对一些较晚期的高度文化因素的借用问题，是很有意思的。劳费尔说，那乃人民族学纹饰中存在外来的因素，如公鸡、蝙蝠甚

至还包括鱼，这样说当然是对的。确实，在岩画的“节目”中既没有鱼，更没有公鸡，也没有蝙蝠。

然而劳费尔及另外一些研究者写道：在那乃人纹饰中公鸡占特别重要的地位。对于这种说法就绝对不能完全同意了。实际上某些被解释为公鸡像的禽类图形是我们在舍列美切沃岩壁上所见的古代天鹅像或鹅像的强烈图案化变体。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那乃人花纹中的公鸡往往嘴里叼着鱼，如果真是公鸡，那无论如何也不会这样做的。

另外还有几例也是改动传统题材的作品。如带有外来图案画风格的“慕度尔”蛇神的形象。

但是这种改动自然是纯外在的，并未触及古代形象的实质和结构。例如，那乃人宗教图画上有鳞有须的“慕度尔”龙仍然和萨卡奇一阿梁岩画上的蛇一样盘成螺旋状。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在邻近的中国，周、秦、汉各代的古老艺术中的龙的形象与中世纪晚期作品中那种龙的形象是完全不同的。有可能，龙的“古典”形象是在中国的北邻部落和东邻部落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些部落的神话中自古就存在关于各种水界主宰者的观念，它们被描绘成巨蛇的样子，有时被说成鱼，如阿尔泰人神话中的“凯里巴雷克”。

除了前面提到过的几种禽类和其他动物的图形可以认为是那乃人在十七至十九世纪满清朝廷统治邻近的满洲和中国时期从外面借用来的之外，那乃人纹饰中还有一个占据很重要地位的成分，即添加了植物纹（叶状或花状涡纹）的“奔驰的螺旋纹”或波浪形线条主题。“奔驰的螺旋纹”或这样一类的波浪纹是那乃人最喜爱的图画框饰，也是那乃妇女民族服装（鱼皮袍子）最流行的镶边图案。

这个主题的来源同阿穆尔河诸部落历史上与外族交往有关，这种交往至少在公元第一千纪的前半叶即已存在，研究过这个主

题的学者们认为，它是由带有叶子和嘟噜的葡萄藤图案演化来的。这种图案从它的故乡即地中海沿岸古典时期和中世纪早期的国家广泛地向东方传播。还在唐代便传到中国，在渤海国时代传到我们滨海地区，在日本中世纪文化鼎盛时期的奈良时代传到日本。为什么这个主题被那乃人如此普遍地采用，并且在他们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如果考虑到，螺旋纹以及一般的曲线图案在阿穆尔河地区是土著居民自古以来的财富，就会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说，原因不在于异域影响的力量和深度，而在于它纳入了当地部落几千年形成的民族传统形式和对世界的艺术感触的轨道。

可见，劳费尔的另一个假设也需要重新考虑。据他们推测，来源于异域的主题强烈地渗入远东部落的纹饰是从女真时期开始的，这是由于女真人在征服中国北方的过程中与中国人增加接触的结果。

一般地说，异域主题类似的渗入自然是发生过的，但是，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渗入，远远没有达到以前可能想象的那种规模和那种强度，而且也并不一定是来自中国。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现在知道，阿穆尔河新石器时代螺旋纹和“编织纹”的发现就象是逻辑的长链中的第一个环节，它带动了和引出了另一些新的观点和假说。

把古代农人与猎人、渔人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往往象催眠术似地抑制着我们。确实，农人后来大大地超过了他们处于不利的自然条件之下的伙伴。他们更快地发展了自己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然而另一方面，本世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马克辛·高尔基说得非常对，他说文化史学者们“委屈”了猎人。他认为猎人在历史上也创造了具有独到之处的同样巨大的文化财富，首先是在艺术

创作的领域内。随着猎取猛犸和北方鹿的游猎人原先的生活方式的衰落，旧石器时代人类具有惊人的现实主义风格的生动活泼的艺术也就随之消失，这也不是偶然的。

所以用不着奇怪，在邻接着一些早期农业国家的地方还有另外一个国家，更确切地说，不是一个国家，而是整个一个世界，它具有同样古老、同样鲜明而独特的文化，其中包括我们阿穆尔河的文化。他们根本不是“蛮人”和“野人”（如古今有沙文主义倾向的史学家所描写的那样），而是对世界文化做出了有充分价值和同等意义的贡献的人们。在数千年中他们曾是自己土地和自己命运的唯一握有主权的主人。

高度的文化水平使阿穆尔河诸部落的远祖有可能发现和开发远东森林区的大片原始森林、湖泊与河流。他们创造的丰富的艺术，如我们所看到的，到今天仍保持了自己的生命力。谁知道这个艺术的影响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空间上究竟传播得多么久远？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阿穆尔河的螺旋纹无论如何不晚于黄河流域仰韶的早期农业文化中见到的螺旋纹。螺旋纹和曲线纹整个说来是太平洋区域广大部落的财富，其中包括居住在阿穆尔河以南很远的南太平洋岛屿世界，即玻里尼西亚、新西兰的部落。特别是在新西兰诸岛上的毛利人那里，正是这种曲线纹开出了灿烂之花。

在每一部民族学概论著作里都可以看到毛利族酋长布满螺旋形图案的刺文面孔，以及饰有真正华丽而又奇特的螺旋形花纹的神像和祖先雕像、木建筑和各种生活用品。同样重要的是，阿穆尔河岩画的面具头像，包括以螺旋纹构成的头像，也可以沿着同一方向从阿穆尔河口一直追索到澳洲。我们还知道南太平洋岛屿上这类头像所代表的神祇的名称。它是玻里尼西亚人的创世主，是他们至高无上的神灵和“文化英雄”玛凯—玛凯。十分重要的是，在

神话里这个神是以骷髅头的形象出现的。我们从萨卡奇—阿梁的玄武岩巨石和乌苏里江岸舍列美切沃岩壁的图画里见过的那种骷髅头面具就这样再三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阿穆尔河远古文化联系的总的走向，似乎是绕过东亚大陆地区(其中包括黄河流域①)。它沿着太平洋列岛的链条向南延伸，依傍太平洋沿岸形成一个大弧圈。

“太平洋沿岸”这个名词在这里还有一个更广泛的含意。在大洋的彼岸，沿着北美海岸，从阿拉斯加科迪亚克岛到不列颠哥伦比亚温哥华岛，分布着一些岩画，就其造像技术，就其在沿岸巨石上的位置，就其内容，都和阿穆尔河岩画出人意料的接近。这里有些地方还可以见到一些头像，它们竟然同萨卡奇—阿梁的发现物一模一样！因而，太平洋好象从两面被相同岩画构成的巨大的钳形或弧圈所包围。不仅可以说存在一个阿穆尔河—乌苏里江岩画区，而且可以说存在一个疆域辽阔的太平洋头像岩画地带。有可能，北美海岸岩画与阿穆尔河岩画的这种相似性是亚洲和美洲远古接触的新证据。这种接触仍然只是限于沿海一带而不涉及亚洲、美洲两大陆的内陆地区。

具体说到东亚大陆地区，很明显，无论阿穆尔河类型的岩画还是阿穆尔河饰纹中的螺旋纹，它们和古代中国的世界观都是内在地格格不入的。螺旋纹在中国艺术中不是基本因素，而是外加的、与原始农人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因素。那些原始农人的心智不能从螺旋纹中领会到任何东西。同他们的思想，同他们的希望和期求，同他们争取收获的斗争直接相关的是另一种东西，是对他们重要得多的农业神力的象征。例如，满肚鱼籽的鱼(半坡)，或者饱含瓜子的南瓜，即丰产的象征。无论在中国人的神话里还是民间

① 在黄河流域，仅在半坡居址一地发现过某种类似面具头像的东西。但在那里，这明显是偶然的和孤立的题材。最大的可能是来自太平洋沿岸的影响的产物。

文学里，都没有任何东西有助于解释在借用时丧失了的螺旋纹含意，螺旋纹与他们艺术思维的整个体系就是如此地格格不入。

可是在阿穆尔河一切情形则完全相反。新石器时代的螺旋纹在这里不仅存活到了现在，而且在现代的装饰中仍然保存了原来的含意。

例如那乃人到现在还烙一种压印着螺旋形花纹的饼，花纹尽头的线条清清楚楚地勾划出……蛇头！

那乃人的圣饼上"蟠踞"着蛇并不是偶然的。蛇在西伯利亚各族的神话中全然不是邪恶、黑暗和死亡的象征。它曾经是善良慈悲的神、伟大的太阳蛇"慕度尔"、天空和水域的主宰者的形象。传说里讲，从前大地上一片汪洋，蛇神在治理洪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全通古斯民间文学中的这条睿智勇武的蛇和神奇的"猛犸"一起开凿了河谷，疏导了洪水。

可见"时代的联系"并未完全中断。在那乃人和邻近的阿穆尔河下游各部族的民族学文化中，他们祖先的远古遗跡即泰初文化的残余一直保存到我们现在。这个文化是这样地富于生命力，以至不仅保存了下来，不仅经历了许多世纪，而且做为一个组成部分而进入了我们当代人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当我们的考古工作队来到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共青团城地区的那乃人古老的村庄孔东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乃妇女和姑娘现在还是用阿穆尔河螺旋纹装饰自己的衣裳，当地俱乐部的墙上也装饰着同样的螺旋纹。

就在那几天，在该村一个正在建设中的学校的院子里，在推土机掘出的深坑里发现一个石斧，旁边有一个压碎了的器皿，那上面装饰着与集体农庄俱乐部墙上相同的那乃人的螺旋纹。

孔东村石器时代住所里还发现了炭。放射性碳素测定表明，人们居住在这里的时间是公元前第三千纪中叶(4520+60)。在另

一个最晚的新石器时代居址——马雷舍沃村旁“山岩上”的居址，古代居民居住的时间晚一千年，为第二千纪中叶(3590+60)。

这样，我们便掌握了那乃人螺旋纹的可靠断代。而且也不止一个螺旋纹。差不多五千年以前就奠定了那乃人装饰艺术的基础，形成了它的基本因素，其中除螺旋纹之外，还有用交织的带子构成的巧妙花纹——阿穆尔河编织纹。

所以说，那乃人及其邻族的艺术财富的渊源不是在劳费尔寻找的那个距离阿穆尔河遥远的地方，而在于阿穆尔河本土之上。

关于这一点，不仅我国远东“阿穆尔河编织纹”和螺旋纹的古老可以证明，而且还有另一个尤其明显的证据，即这种纹饰是阿穆尔河下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区别于亚洲大陆邻近地区其他一切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典型特征。

朝鲜、辽东及东蒙的新石器时代纹饰中都没有螺旋纹。因而螺旋纹不可能通过这些地区从某一个别的来源传到阿穆尔河，比方说从乌克兰的特里波列或者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传入。那些地方同阿穆尔河之间隔着辽阔的没有螺旋纹的“空白”地带，所以这类假说不能成立。

不能不谈一谈阿穆尔河流域古代居民与亚洲其他地区的历史和文化上的接触，谈一谈日本列岛虾夷人新石器时代绳文文化的陶器纹饰。例如，北海道岛 Нисэко 新石器时代居址（译注：可能是日高遗址）出土的一件器皿，上面按照纯粹的阿穆尔河风格（而且器皿的形制与阿穆尔河的相象）以螺旋纹画出两条横带。这件器皿显然是古代虾夷陶匠按照令他惊讶的阿穆尔河标本仿制的作品。

还有一点也很有趣，日本列岛绳文文化早期曾广泛流行饰有垂直篦点纹的桶形或截椎形容器。后来，到了绳文文化晚期，那里广泛流行的是以螺旋纹为基础的纹饰。这一切都证明虾夷部落和

阿穆尔河流域居民之间古代的接触。

阿穆尔河下游强大的艺术和文化中心在大陆上也有其影响。在滨海地区发现了几件螺旋纹容器：一九七一年在纳霍德卡城附近的一个属于本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居址中发现一个这种样子的完整容器。安特生在满洲西南部进行发掘时，在著名的沙锅屯墓穴中发现了饰有彩绘及之字纹的容器残片。饰有之字纹的容器也是赤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有代表性的器物。

阿穆尔河典型的之字纹大概间或地也通过这里向南渗入到黄河流域，这可以从仰韶文化中出有这种纹饰的个别标本得到证明。

还应当补充一点，无论沙锅屯或赤峰还是这一地带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存，都有称为“细石器”的大量燧石器物。这类器物对于包括西伯利亚、蒙古、阿穆尔河等地的北方地区是有代表性的，而在仰韶文化中却以磨制石器占统治地位。

这里所讲的自然是各个文化发源地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不是一种文化压抑另一种文化。

在这方面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纯粹的阿穆尔河下游古亚细亚文化，即我认为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在该河下游以外的邻近地区分布的界线问题。

第一个分布区是哈巴罗夫斯克和布拉戈维申斯克之间的阿穆尔河上游沿岸。这里，距犹太自治州的诺沃彼得罗夫卡村不远处，出有精致的石器和陶器（磨制石斧和其他器物）。这些工具和陶器的性质与第二个分布区（哈巴罗夫斯克下水方向的若干新石器时代居址）的同类出土物完全一致。本地的地方志学者在廿年代还在哈巴罗夫斯克市克腊斯纳亚河畔发现过同样的器物（饰以篦点之字纹及螺旋纹的器皿）。

在乌苏里江左岸舍列美切沃村，距离 P. 玛阿克和阿里夫坦最早著录的著名岩画不远的地方，发掘出了更为出色的器物。舍

利美切沃的出土物最清楚不过地表明，古代是谁居住在乌苏里江流域，这些居民与远东其他地区有过怎样的文化联系。

这里，在河边巍然矗立的一座高山的脚下，曾有一个新石器时代的居址。从它的文化层中取出了属于阿穆尔河下游类型的器皿残片，上面饰有篦点纹、“阿穆尔河编织纹”，有的带有红赭石着色的痕跡。石器有单面凸起的厚重石磨（这是阿穆尔河下游马里因斯克城苏丘岛居址的典型器物）。这里还出有用来弄死大鱼的钻孔大石槌，也有经过仔细修琢的小型燧石工具。

由此可见，在乌苏里江流域曾经居住过阿穆尔河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部落，或称古亚细亚人，即现代尼夫赫人、乌里奇人和那乃人的祖先。

为了理解阿穆尔河下游新石器时代纹饰的深远渊源，为了揭示这种纹饰内在的语义学规律，值得注意的不仅有螺旋纹，而且还有另一个基本因素——“阿穆尔河编织纹”。在这种花纹的最好标本上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编织纹凸起的带子交织成网眼。对于渔人来说，还有什么比鱼网更亲切的东西呢？由此可见，网状编织纹是真实鱼网的概括的图案画。

另一种广泛流行的花纹即鱼鳞纹，同样与渔人生活的现实事物有着十分明显的联系。这种花纹的母型实际上应是真正的鱼鳞。

前面提到的之字形花纹（或被误称为“枞叶纹”）也和渔人对世界的感触有关系。如同“编织纹”清楚地描绘出鱼网一样，之字纹表达出荡漾的流水。

所有这些古代阿穆尔河纹饰的代表性因素都一整套地存在于阿穆尔河沿岸现代土著居民（那乃人、乌里奇人、尼夫赫人）的纹饰中。

但最重要的是，考古学不仅证明了阿穆尔河本地部落几千年历史过程的连续性，而且还揭示了他们文化发展的具体过程。

本文写到这里就可以告一段落，并且可以做出原则性的最后结论。

阿穆尔河土著部族及其文化正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这些部族直接继承了他们祖先创造的自成一体的并在当时具体历史条件下以其独到之处达到高度水平的艺术文化。前面介绍的萨卡奇一阿梁岩画就是这种艺术文化的出色遗存。

* * *

近来在中国围绕与中国边疆地区新的考古"发现"有关的问题进行着越来越起劲的讨论。这种讨论照例变成了一场旨在为毛主义分子对邻国（主要是苏联）某些领土的要求进行辩护的宣传运动。毛主义分子拿出中国考古学的一些伪造的"新东西"是怀着一定目的的：一方面，"从科学上证明"存在一个"永恒"的中华国家的大汉族主义观点，据说这个国家的边界曾经扩展到邻国的一些领土上；另一方面，一笔勾销居住在现代中国领土上的人数众多的非中国民族的历史和民族独特性。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提法，不仅完全违背中国本身的真实历史，完全违背现存诸邻国的真实历史，而且也完全违背由于中国的扩张而业已消亡的那些邻国的真实历史。

自然不能否认，中国边疆一些紧张施工的地方有一部分出土物同古代中国文化残跡相似。但是决不能承认它们能够构成中国学者们现在所提出的那些结论的充足根据。何况，这些发现物与廿世纪初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头十年）中外考古队在中国收集的大量考古资料相比是非常微渺的，而那些极其丰富的资料却证明着另一回事。

人类的形成及其最初开发地球的伟大过程在东方并不局限于一个中国，而且还包括了在几十万年以前的下旧石器时代就已经不是无人荒原的另外一些区域。

根据最新的科学发现，那种把民族划分为“有史”民族和“史外”民族的陈旧作法，那种以“欧洲中心主义”和“亚洲中心主义”来看待世界文化历史过程的观点是毫无道理的。企图给亚洲某一个民族硬加上这个大洲政治史和文化史中的霸主身分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这篇杂志论文只能根据必要性而局限于远东历史初期阶段的特定时代范围，即石器时代。

考古学在史籍辅助下对于阐明远东后来的历史事件自然也正在做出非常重要的贡献。这些事件同样令人信服地证明着远东各族文化的独特性，证明着他们政治和经济的主权。而且时代愈近，他们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也就表现得愈强烈。

（译自苏联《远东问题》1972年第3期）

论俄中边界形成史

别斯克罗夫内、谢·齐赫文斯基、
弗·赫沃斯托夫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出现大量有关俄中关系和苏中关系的书籍和文章。这些作品的许多作者不掩饰他们拿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现状进行投机的意图，同反对苏中关系正常化的人一唱一和。

他们狂热地一再重复的苏联"威胁"中国这个虚构的主题，就是这类"著作"的作者所喜爱的题材之一。例如，一九七二年初在华盛顿出版的一本别有用心地命名为《站在门口的熊。中国的政策在苏联的压力之下形成》的书的作者、中苏关系研究院的一位教授(居然有这样的教授!)哈罗德·欣顿，甚至在一九六九年十月在北京开始的苏中边界谈判中也看到"苏联压迫"中国的证明。

哈·欣顿在这本书中，也和他在一九七一年第一、二期的《共产主义问题》杂志和九月号的《现代史料》上发表的内容相似的文章中一样，歪曲地、别有用心地叙述了同俄中边界形成的历史和正在北京进行的谈判有关的问题，公开抱怨美国政府一九六九年在苏中边界武装冲突期间没有采取"更加积极的立场"，并建议美国统治集团以后不要错过美国进行干涉的恰当时机。

无论是哈·欣顿还是选中了俄中关系和苏中关系这个题目的其他作者，都否定用阶级的态度分析历史事件的方法，把满洲皇帝的扩张政策理想化，从唯心主义的立场来看待国家之间和人民之

间相互关系的历史。他们把民族主义感情看成是这种相互关系的主要动力；但是，他们在这里故意闭眼不看满洲在中国的统治的外国本质，闭眼不看在清朝时期（一六四四——一九一二年）中国人民本身也受到外族的封建压迫。

鉴于人们对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划界的历史问题日益关心和西方政客力图利用这些问题达到投机目的以破坏苏联和中国两国人民友谊，因此简要地阐明这些问题是适宜的。

俄中边界是在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这一漫长时期中形成的。因此，边界的形成，正是两个封建国家在这些或那些历史发展阶段中、在各种各样的历史条件下相互关系的结果。

早在十七世纪上半期，俄罗斯的新土地发现者就开始渗入阿穆尔河沿岸和滨海地区了。在这一世纪的中叶他们到达了太平洋沿岸。B. 波雅尔科夫考察队开始了对阿穆尔河流域的开发。这个考察队在一六四三——一六四六年收集了有关阿穆尔河流域的相当详尽的资料。C. 科索戈考察队于一六四七——一六四八年考察了阿穆尔河口。B. 尤里耶夫和 A. 奥列尼在这里开辟了新的道路。著名的旅行家——新土地发现者 E. 哈巴罗夫于一六四九——一六五三年间行经这里，以后，阿穆尔河沿岸就正式并入俄国（见《西伯利亚史》第二卷，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一九六八年）。

并入俄国的土地是一些尚无国家组织的达斡尔人、久切尔人、埃文基人、尼夫赫人和纳特赫人等少数部族游牧的荒凉原始森林地带。到十七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这些地区的土著约为四万人，而俄罗斯居民达两千人（见 B. A. 亚历山德罗夫著：《俄国在远东边疆〔十七世纪下半期〕》，莫斯科，一九六九年）。在这些地方既无满洲人，更无中国人居住过。可见，早在那些遥远的时代，俄国就着手开发几乎无人居住和不受任何人管辖的阿穆尔河沿岸和滨海地区了。

由于来自俄罗斯的农民和哥萨克人对自由土地开发的结果，他们沿阿穆尔河两岸建立了一系列的村落、自由村和大居民点(城堡)。例如，建起了阿尔巴津、库马拉、科索戈尔、阿钦斯克等城堡和索尔达托沃、波克罗夫斯科耶、伊格纳申诺、莫纳斯蒂尔希纳、奥捷尔纳亚、潘基、安德柳什基诺等大村落。哥萨克曾经两次(一六四九年和一六六九年）在离阿穆尔河口不远处树立了石界桩。在当时就出现了阿纳德尔城堡和鄂霍次克镇。为管理这个地区，俄国政府设立了阿尔巴津省。

满洲人是居住在辽东半岛(现今满洲的南部)一个人数不多而好战的民族，在十六世纪末，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军事封建国家组织，并从一六一八年起对封建明朝统治下的邻国中国多次进行掠夺侵袭，把它的城市村庄劫掠一空。满洲人在一六四四年后同中国封建主中的一个大集团（他们召来外国人同起义的中国农民作斗争)相勾结，征服了整个中国并建立了新的满洲清朝政权。征服者同起义的中国农民和其他阶层的爱国者进行了长期激烈的斗争，直到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初清朝政府才巩固了自己对所征服国家的控制，并开始实行针对蒙古、阿穆尔河和滨海地区的俄国居民、以及针对准噶尔、东土耳其斯坦和其他邻近国家的对外侵略政策。

清朝把建立一个使满洲同外部世界隔绝的，人烟稀少的缓冲地带作为自己头等重要的任务。清朝把阿穆尔河两岸出现哥萨克村落看成是对满洲世袭领地潜在的威胁。因此，清朝政府开始对俄国村落采取一系列军事性措施。在那些年，俄国曾多次试图同中国建立睦邻关系。然而，无论是Ф. 巴伊科夫（一六五四——一六五八年)的使团(见Н. Ф. 杰米多夫、В. С. 米亚斯尼科夫著：«在中国的第一批俄国外交官»，莫斯科，一九六六年)，无论是И. 佩尔菲利耶夫和С. 阿勃令的使团(一六五八——一六六二年）还是Н. 斯巴伐利亚的代表团(一六七五——一六七六年）(«十七世纪

俄中关系»·资料和文献，第一卷，一六〇八——一六八三年。莫斯科，一九六九年，文献，第九十六、九十八、一百一十四、一百八十、一百八十二、一百八十三、二百零九号，第一百七十——五百一十八页）都没有取得成功。清朝政府不仅拒绝建立友好相互关系的发展贸易的建议，而且采取了敌对行动。

一六七八年，奉满清皇帝康熙之旨，开始在南满修建边界工事线，历史上称为"柳条边"。它是顺地势修建的，绵延达九百公里。这条严密的边境壁障，有几段是用两排柳树构成的，许多柳树扎下了根，形成一条无法穿越的林带。篱笆前挖了一条深深的壕堑。"柳条边"的修筑用了好几年，其残余至今可见。在这条"边"以外的土地，当初满文和汉文的文件都称之为"界外土地"(«盛京通志»汉文版，第十章，第二十页甲到乙)。从"柳条边"到阿穆尔河沿岸，是宽达数百公里的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带。根据康熙的侵略政策，于一六八三年在阿穆尔河右岸设立了中国要塞瑷珲，在瑷珲旁边筑下了军屯区。

早在这之前，满洲人就不时地袭击俄国哈巴罗夫和斯捷潘诺夫的部队，并两度包围阿钦斯克城堡和库马拉城堡（一六五二年、一六五五年）。他们还不止一次地袭击和破坏阿尔巴津城堡，但哥萨克部队夺回了并且修复了要塞。一六八六年，阿尔巴津城堡再次被逼近城下的满洲军队包围。尽管敌人处于绝对优势，哥萨克人经受住了长期被围。由于同准噶尔汗国关系的紧张化，使清朝政府不能在这时对俄国发动更大的军事行动。这就是康熙皇帝之所以向俄国政府建议就划界问题进行谈判的原因(见 H. 邦迪什—卡缅斯基编：«一六一九——一七九二年俄中外交文件汇编»，喀山，一八八二年)。而那时，正在准备同奥斯曼土耳其作战的俄国，也没有能力分出较大的部队来保卫阿穆尔河地区，因此同意谈判。选定尼布楚城为两国使节会晤地点。沙皇政府指派以费·戈洛文

为首的外交使团并一支由五百零六名特种常备军和一千多名哥萨克人组成的部队参加谈判。责成戈洛文不仅要通过外交途径，而且以“军人天职”来保卫俄国的东西伯利亚地区（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Ф. 第二百一十四〔西伯利亚衙门案卷〕，九百六十五卷，第七十四页、第一百二十七——一百二十九页、第二百三十三——二百三十四页、第三百四十八页、第三百五十一页、第四百一十二——四百一十四页；Ф. 伊尔库茨克衙门Д. 九十五，第一至二页）。

在谈判中代表清政府的是皇帝的内大臣索额图，代表团的成员还有满清公郎坦和皇舅佟国纲。为了在谈判过程中向俄国人施加军事压力，索额图随带了一支一万七千人的军队。

谈判于一六八九年八月十二日开始，是在使俄方感到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清使拒绝了戈洛文提出的沿阿穆尔河流域到捷亚河河口的边界线，并提出了对清帝国有利的要求：即不仅要求放弃整个阿尔巴津省，而且要求放弃外贝加尔的大部分领土。（H. 奥格洛勃林著：«一五九二——一七六八年西伯利亚衙门卷宗和书籍评述» 第三部。莫斯科，一九〇〇年。H. 邦迪什一卡缅斯基编：«命令文集»，第五十——五十一页）戈洛文坚决地拒绝了清使的苛求，之后，满洲人中断了谈判，并于八月十四日包围了尼布楚。由于包围未能获得成功，清朝方面宣布，如果戈洛文不作出让步，就将攻占尼布楚。这迫使戈洛文同意让出额尔古纳河右岸和从格尔必齐河到布列亚河河口的阿穆尔河两岸的土地。戈洛文希望保住滨海地区，所以宣布自己只受权解决阿尔巴津省以内的边界问题，并坚持把其他地段的边界问题搁置起来。这样，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七日就签订了以尼布楚命名的第一个俄中条约。条约的文本用俄文、满文和拉丁文书就。各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尼布楚条约的第一条规定了沿格尔必齐河（石勒喀河左边支流）为界，往后边界从格尔必齐河上游沿“石山”走去，（这些“石山”

在条约中规定得不十分明确，是一些山岭，名叫：斯塔诺维奇、切尔内舍瓦、扬坝、图库林加和索克塔汉）一直到贾格达山脉西部支脉。至于乌第河以东和以南的领土，即整个阿穆尔河下游和滨海地区则未曾划界，另行定议（«一六八九——一九一六年俄中关系»，莫斯科，东方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第九——十页）。①

第二条规定了额尔古纳河的边界："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边界左岸所有之地直至河源皆属中国右岸所有之地皆属俄罗斯国"，同时，这一条接着又说，"其南岸"所有设施应迁移到俄国这边来（同上，第十页）。

尼布楚条约第三条确定了俄国的阿尔巴津城寨的命运："雅克萨地方俄罗斯国所筑之城（俄文本为阿尔巴津城——译注）应尽行拆毁，所居俄罗斯人民及一切军用与他种物品悉行撤回俄境不得稍有存留致受损失"（同上）。

清朝使者发誓，大清帝国保证不在阿尔巴津地方构筑工事，不往那里移民（见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 Ф. 第二百一十四，第一千五百五十五卷，第七页）。可见，满清中国政府承认它对被它夺取的俄国土地所享主权的局限性。

谈判是通过长期居住在清朝宫廷的耶苏会教士翻译人员张诚和徐日升进行的，他们两人对于作为东正教支柱的莫斯科国怀有敌视情绪。尼布楚条约边界条文的俄文、满文和拉丁文各文本，由于不无上述翻译人员的参与，因此措词是不相同的。对条约文本甚至在当时也感到难以理解的另一个原因是：条约没有附图来确定边界所在地点。例如，在尼布楚条约满文和拉丁文本中，大格尔必齐河（"кербиьи"）作为边界，此河现称阿马扎尔河，是阿穆尔河北边的支流。在俄文本，边界则是另一条格尔必齐河（小格尔必

① 本文所引用条约的中文，系引自一九二七年出的«中外约章汇编»第七部«中俄部分»，其中多处中俄文的内容颇有出入。——译者注

齐)，它注入石勒喀河。还有，在条约的俄文本和拉丁文本中，山岭简单称为石山，而在满文文本中，边界山岭称为“大兴安岭”，这座山的布列雅支脉当时认为位于阿穆尔河左岸。

在尼布楚条约第二条中，边界沿额尔古纳河全长——从它流入阿穆尔河处起到河源(“到最上游”)划定，这就使俄国有权据有蒙古的相当大一部分，因为额尔古纳河的发源地位于满洲西部和蒙古东部的边界上。这一条的满文和拉丁文本都简单地指出，额尔古纳河是国界。这一切使人可以随意解释条约的许多条款（见П. Т. 雅科夫列夫著：«一六八九年第一个俄中条约»，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并且满清中国方面还为自己保留了可沿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沿岸，在吉柳伊河(捷亚河支流)河口单方面以界标标示边界的权利。满洲人在他们评价尼布楚条约时承认，他们得以占据了从来不属于中国的土地(何秋涛：«朔方备乘»〔«北方地域志»〕一八八一年)。

清朝政府达到消灭阿穆尔河沿岸的俄国村落的目的后，占领了属于独立的蒙古王公统治的蒙古北部，并开始力图划分哈尔哈—蒙古地区的俄中领地。

既然根据一六八九年尼布楚条约的条件，俄中之间划分了从额尔古纳河到乌第河的土地，那么额尔古纳河以西当时就没有确定国界线。哈尔哈的蒙古游牧民往往利用这个情况出现在俄国境内。这一切曾引起了频繁的边境纠纷和冲突。在这一地区，俄国和满清中国之间只有一个假定边界，这一边界是俄国色楞格专员与依附于中国的蒙古(哈尔哈)有封邑的王公双方协议确定的。

为了解决边界问题，Л. 伊兹玛依洛夫大尉作为特命公使于一七一九年被派往中国，但是他没有能够解决纠纷(苏联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 Ф 第六十二，Д一(一七一九年)，第七——八页，第三十四——三十六页，Об 第四十四——四十六，八十二——八十

六)。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拉古津斯基伯爵于一七二五年作为特命全权大臣被派往北京。满清中国方面在新的一轮谈判中再次要求把位于外贝加尔湖、阿穆尔河流域和滨海地区的所有土地交给清帝国。务拉的思拉维赤—拉古津斯基拒绝了这些没有理由的苛求(H. 邦迪什—卡缅斯基编:«命令文集»,第一一四——一一六页,第一二九——一三〇页)。清朝政府为了迫使务拉的思拉维赤—拉古津斯基满足他们的要求,剥夺了这位俄国外交家的行动自由,长时期不准他从使馆外出。被邀请参加清帝国军机处会议的务拉的思拉维赤—拉古津斯基说:"俄罗斯帝国希望得到中国皇帝的友谊,但是也不很害怕不友好,它对两者都有准备。"

俄国使节的强硬最终迫使清朝当局降低了自己的要求。最初务拉的思拉维赤—拉古津斯基努力使双方都从"现在占领的领土即为各方所有"这一原则出发。然而,务拉的思拉维赤—拉古津斯基在强大的压力下放弃了这一原则,并作了某些领土方面的让步。一七二七年八月二十日签署的布连斯奇条约的草约确定边界线的走向是东自额尔古纳河,西至沙毕纳依山口,并重申了尼布楚条约关于未划界地段条件。

布连斯奇条约包括在处理俄中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的总条约之中。一七二八年六月的总条约是在恰克图市批准的,因而取名恰克图条约。因而,在十八世纪初清朝中国又夺去了俄国的一部分土地,继续向北和西北部扩张。

尽管国民经济利益和东西伯利亚防御战略迫切要求解决领土问题,然而直到十八世纪末俄国政府并没有处理收回被清朝中国侵占的俄国领土的问题。问题是,俄国曾被迫顽强地同瑞典、普鲁士和土耳其作斗争。直到十九世纪初,俄国政府才派以全权大臣Ю. 戈洛夫金为首的特派使团到中国解决同北京的领土问题(见«俄国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对外政策»第二卷,莫斯科,一九

六一年，文件第一百四十二——一百九十二号、第二百〇五号，第四百七十二页，六百〇九至六百一十一页，六百四十三页至六百四十四页）。然而使团只到达了库伦（现在是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清政府要求俄国使节不仅在到达北京之后向清朝皇帝行侮辱性的跪拜礼，而且要求在库伦就在象征清朝皇帝的祭坛前进行“演习”。由于戈洛夫金坚决拒绝，就不让他继续向北京进发。一八〇六年这位使节回到了俄国（见尤·阿·戈洛夫金公爵的文件《戈洛夫金使节记》，圣彼得堡，一九〇四年）。俄国政府因忙于同拿破仑法国作战，没有特别注意清朝中国拒不接待俄国使团一事，只发出一个备忘录说明对作为一个主权强国俄国的使节提出的要求是不合适的（见《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俄国对外政策》第三卷，莫斯科，一九六三年，文件第六十五号，第一百七十七页至一百七十九页）。

然而，俄国不断开发东西伯利亚的过程，要求解决俄中阿穆尔河沿岸边界问题。为此，一八二六年往滨海地区和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派去了一个专门考察队。考察队队长乌瓦罗夫斯基了解了当地情况后写了一本《阿穆尔河见闻》。其中指出，阿穆尔河沿岸和滨海地区整个是荒漠，那里的居民“不属任何人管辖”（П. И. 卡巴诺夫著：《阿穆尔河问题》，布拉戈维申斯克，一九五九年，第三十二页）。

一八二六年至一八二八年同波斯的战争以及后来一八二八至一八二九年同土耳其的战争，又把俄国的注意力吸引到近东问题上，原来拟定的解决远东事务的措施搁置起来了。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一八四〇——一八四二年）期间英国和法国军舰在中国海岸的出现，迫使俄国政府认真考虑其太平洋海岸的防御问题。东西伯利亚总督 H. 穆拉维约夫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其所辖地区的措施。穆拉维约夫在堪察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

建立了一个西伯利亚区舰队的基地（这实际上防止了英国人占据阿瓦恰湾。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国军舰曾在这里巡航）。改组了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军队，增加了其兵员。

穆拉维约夫关于实行俄国对阿穆尔河下游的控制的措施特别重要。穆拉维约夫指出了日本和美国船只闯入阿穆尔河的危险（见И. 巴尔苏科夫著：«Н. Н.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莫斯科，第二册，一八九一年）。这种可能性由涅维尔斯科伊率领的阿穆尔河考察队（一八四九——一八五五年）加以证实。考察队不仅肯定了海船可以进入阿穆尔河，而且肯定环绕着俄国人早在十八世纪后半期起就进行开拓的萨哈林岛航行的可能性。最后，涅维尔斯科伊证明，阿穆尔河沿岸和滨海地区没有中国人居住（见Г. И. 涅维尔斯科伊著：«一八四九——一八五五年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哈巴罗夫斯克，一九六九年；中央国家海军档案库，Ф第十九，目录四·Д. 第十六，第十六——二十三页）。

在英国和法国对中国联合进行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一八五六——一八六〇年），清朝廷终于决定同俄国调解关系。一八五八年五月十六日，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和大清国钦差全权大臣奕山签署了瑷珲条约。该条约的第一条写道：“黑龙江松花江左岸由额尔古纳河至松花江海口作为俄罗斯国所属之地右岸顺江流至乌苏里河作为大清国所属之地由乌苏里河往彼至海所有之地此地如同接连两国交界明定之间地方作为大清国俄罗斯国共管之地”（«一六八九——一九一六年俄中关系»，第二十九页）。

清朝根据瑷珲条约归还给俄国的并不是它根据尼布楚条约从俄国夺去的全部土地。根据尼布楚条约第二条规定以在额尔古纳河和阿穆尔河右岸保持有限主权为条件划归中国的俄国土地，并没有归还俄国。

瑷珲条约的目的是对付西欧大国对阿穆尔河地区的侵犯。这

一点不仅反映在条约的序言中，而且反映在第一条关于阿穆尔河、松花江和乌苏里河航行问题的措词中："由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河此后只准大清国俄罗斯国行船各别外国船只不准由此江河行走"（«一六八九——一九一六年俄中关系».第二十九页）。

在签订瑷珲条约期间，俄国钦差全权大臣、海军中将普提雅廷适在天津，他是被派往天津就同中国建立贸易和政治联系的条件和边界问题进行会谈的。在瑷珲条约签订两周后，普提雅廷尚未从穆拉维约夫处获悉谈判已在瑷珲顺利结束，就签订了关于两国相互关系总原则的天津条约。大清国钦差全权大臣（桂良和花沙纳）拒绝同普提雅廷缔结任何边界协定，但这一新的条约的第九条确认，必须确切地划定两国在一些地区的边界。"中国与俄国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员秉公查勘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边界既定之后登入地册绘为地图立定凭据俾两国永无此疆彼界之争"（同上，第三十三页）。

由于英法侵华军事行动的恢复以及太平天国起义继续进行而造成的麻烦，再次迫使清朝政府考虑有必要巩固它同俄国的关系。一八六〇年十一月二日，俄国钦差大臣伊格那提耶夫和清朝恭亲王签署了北京条约。条约除了重申瑷珲条约的全部条件外，还承认乌苏里地区是俄国领土。为了履行北京条约的条款，还绘制了边界走向地图，沿乌苏里左岸（中国一边）用红线标出边界。地图由双方全权代表签字盖章（换图议定书是由俄国方面的卡扎克维赤海军少将和布达果斯基上校，中国方面的成琦和景淳签订的。议定书说："在将各种文本的地图和记文最后核定后，这些地图和记文完全相符。"见«一六八九——一九一六年俄中关系»第四十二页）。

这样一来，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最后地确定了俄国和中国在远东的边界。根据这两项条约，俄国收回了按照一六八九年尼布

楚条约中国从俄国夺去的阿穆尔河沿岸的领土的一部分。滨海其余未划界地区的划界问题解决了。

必须结合签署尼布楚条约时的各种情况来研究十九世纪中在阿穆尔沿岸和滨海地区的划界问题。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再造规定这个地区俄中边界的正确地图和驳斥中国和西方历史著作中流行的所谓俄国曾经"侵占"中国领土的说法。真正的情况是：清帝国根据一六八九年的条约侵占了阿穆尔河沿岸大片领土，而根据一八五八年条约和一八六〇年条约被迫退还了一大部分侵占的领土。中国根据尼布楚条约侵占的其他领土则划给了中国。

一八八二年，清政府提出了对波谢特湾沿岸一带部分领土的要求，目的是割断俄国同朝鲜的领土联系。北京打算依靠这种作法来加强朝鲜对中国的从属关系。一八八六年检查了这一段边界的界线，因为一系列地点的界标已经消失了。检查证实了在这一段和在远东边界其他地段，其中包括在卡扎克维赤河岔地段原先的分界线是正确的。一八八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在靠近琿春的诺沃基耶夫天然分界线地区签订了这个地区的分界总约。十月间结束了签订关于所有这些地段的界约的工作(«外交部通报»，一九一四年，第四集，彼得格勒，一九一四年，第十四至三十一页(附录))。

清朝中国无论在政治上或是在经济上都未曾征服这些归还给俄国的领土。在缔结尼布楚条约时，这块领土上居住着三万四千五百名土著和将近三千名俄国哥萨克和农民，而到缔结北京条约时，这些地区土著的人数减少到了二万九千人。

俄国人开始开发阿穆尔河沿岸和乌苏里地区。在那些过去甚至没有人烟的地方，出现了许多大城市：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尼古拉耶夫斯克，乌苏里斯克。俄罗斯和乌克兰居民迅速增加，到一九〇六年达到三十八万二千五百五十八人，而到一九一六年已经达到七十七万六千六百七十八人。土著也增加了(B. M.

卡布赞著：«一八五〇—— 一九一六年乌克兰人向远东迁移的情况»——刊载于«乌克兰历史杂志»一九七一年第二期，六十九至七十页）。在一九〇四年全线通车的世界上最长的西伯利亚铁路的建设，当时具有巨大的经济和国防意义。它使远东加入了国家的经济生活，并且促进了居民的进一步增长。

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是规定俄国和中国在中亚未来边界的第一个俄中协定。

满洲中国征服者对中亚，首先是对准噶尔地区和东土耳其斯坦的渗入是在十八世纪中叶进行的，同时对居住在那里的人民进行残酷镇压（准噶尔中国诞生于十七世纪三十年代，直至一七五八年灭亡。这个汗国奉行防御性的反满清政策。清朝政府利用长期的封建的相互残杀削弱汗国，对卫拉特人进行三次讨伐—— 一七五五年、一七五六年和一七五七年，把汗国灭亡〔И. Я.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一六三五—— 一七五八年）»，莫斯科，一九六四年〕）。清人策划讨伐准噶尔早在十八世纪头二十五年。俄国政府曾两次接到满清关于采取联合行动的建议——一七三〇年和一七三一年，但是，加以拒绝了。过了二十五年，清朝中国就进攻了准噶尔。清兵大败准噶尔汗国后几乎杀尽了居住在那里的卫拉特人。这次屠杀，死人几十万。被征服的准噶尔和东土耳其斯坦取名为新疆，中文意思是“新的疆界”。

同时，中亚和哈萨克斯坦某些地区也成了满清中国人掠夺政策的对象。大清帝国部分军队入侵了哈萨克和吉尔吉斯游牧区，掠夺当地居民。同时，无论是十八世纪，还是十九世纪初期，大清帝国在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地区都未曾设立任何常设政府机构或军屯区，也没有在那里留下大兵。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人为了寻求保护以防范准噶尔人后来又防范清朝而归入俄籍。

到十九世纪中叶，由于俄国和清朝中国在中亚辖地的接近，这

些地方也必须建立两国官方的相互关系以便解决各种政治、经济和领土问题，以及确定俄中边界线。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第二条，根据当时中亚状况确定，中亚未来的分界线，从恰克图界约划定的边界的西端起"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пикет)等处"通过"一千七百二十八年即雍正六年所立沙滨达巴哈(布连斯奇条约中文本译为沙毕纳依——译注）之界牌末处起往西直至斋桑淖尔湖自此往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一六八九——一九一六年俄中关系»，第三十五页)。

北京条约规定的关于勘分俄中边界西段的谈判，从一八六一年底开始，断断续续地持续了数年。

俄方代表坚持恪守北京条约第二条，该条规定边界走向沿清帝国常驻(不是非常驻)卡伦之线，这反映了当时实际状况(清方钦差要求承认临时卡伦线)。

谈判于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五日结束，在塔城签订了勘分从阿尔泰到天山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俄方参加谈判的是：驻伊犁总领事依旺杂哈劳和西伯利亚部队作业部主任(обер-квартирмейстер)依旺巴普考上校；中方参加谈判的是：明谊、锡霖、博勒果索)。分界线的走向考虑到地势，取决于中国常驻边防哨的所在地。新勘定的边界分成三段：自沙滨达巴哈界牌起，顺萨彦山岭到喀喇额尔齐斯河上的玛呢图噶图勒干卡伦；从玛呢图噶图勒干卡伦到阿勒坦特布什山岭东边末处；从阿勒坦特布什山岭到葱岭靠浩罕汗国之界(«一六八九——一九一六年俄中关系»，第四十六——四十七页)。

可见，根据塔城议定书留给俄国的有：布哈塔尔马河上游和库尔楚木河之间的河谷、喀喇额尔齐斯河流域的一部分、斋桑湖(但该湖沿岸东南隅仍归清朝中国管辖，这为哥萨克人的游牧造成严重困难)。这些领土在俄中划界以前实际上没有受中国管辖。

同年在准噶尔和东土耳其斯坦（居民为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语各民族）爆发的反对满清中国统治的东干维吾尔起义（一八六四——一八七八年），干扰了塔城议定书的实施。这次起义是在伊斯兰教徒对“非教徒”的满洲人和中国人发动宗教战争的口号下掀起的。这次起义彻底震动了清帝国在新疆的军事官僚大厦，在它的废墟上成立了几个独立于清朝中国的苏丹王国（它们是阿古柏—伯克建立的国家“哲德莎尔汗国”、塔兰钦苏丹国和东干苏丹国）。清朝在新疆的行政当局请求俄国当局帮助它消灭起义，然而当时的俄国政府并没有派出军队。它通知北京说，不打算参与中国人同东干人的斗争，将保持中立。

但是，新疆的不依附于清朝的新统治者之一阿古柏—伯克谋求依靠英国反对中国统治的愿望孕育着英国势力扩张到中国西部地区的危险。这就使沙皇政府同意帮助清政府。俄国军队在没有遭到当地维吾尔居民任何反抗的情况下占领了以伊宁市为首府的伊黎地区。

满清中国讨伐者在消灭东干维吾尔起义者时，再次对新疆的和平居民进行了血腥的镇压。中国人打死了十万多人。由于讨伐者这种残酷无情（首先是对东干人），大批东干人逃入俄国，造成了当时俄中关系的新问题。

在新疆的起义被镇压之后，清政府要俄国从伊犁地区撤军。与此同时，它要求将从来不属于中国的土耳其斯坦和西西伯利亚的一部分交给它。形成了紧张的局势。

一八七二年在谢尔吉奥波尔的谈判没有取得积极成果。一八七九年又举行了一次会议，结果签署了利瓦迪亚条约，然而清政府没有批准这一条约。但是，冲突终于以和平途径解决了。

按照一八八一年二月十二日签订的关于将伊犁地区归还中国的彼得堡条约的条件（见«一六八九——一九一六年俄中关系»），

该地区西部一小块地方留归俄国管辖，“以便因入俄籍而弃田地之民在彼安置”(«一六八九——一九一六年俄中关系»，第五十六页，俄方在条约上签字的是H. 吉尔斯和E. 比尤索夫，中方是曾)。伊犁地区的大部分归还了中国。绝大多数的维吾尔人和东干人由于担心满清中国讨伐者的迫害(象七十年代那样)同俄国军队一起离开了伊犁地方到了俄国，在这里这些难民迁入了新合并的地区和七河省的内部地区(迁入俄国的有七万人，他们就是自愿加入俄国籍的维吾尔族人、东干人和哈萨克人〔«哈萨克科学院东方学部著作»第一卷，阿拉木图，一九五九年，第五十一页〕)。

根据彼得堡条约第七条，伊犁地方的俄中国界自别珍岛山顺霍尔果斯河至该河入伊犁河汇流处再至乌宗岛山，这条边界同塔城界约规定的边界线相接。条约的第八条规定修改斋桑湖和黑伊尔特什河（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中文本译为喀喇额尔齐斯河——译注)地区的界线。

鉴于在签订彼得堡条约前夕，浩罕汗国已纳入俄国版图，并成为土耳其斯坦总督管辖下的费尔干省，因此，就有必要划定费尔干省同东土耳其斯坦的边界。浩罕汗国成立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位于费尔干纳盆地，国都浩罕。十八世纪中期，它从布哈拉汗国独立出来后，存在到一八七五年，然后于一八七六年归入俄国版图，成为费尔干省。浩罕汗国——沙皇政府认为自己是这一汗国的合法继承者——的边界在东干维吾尔起义前夕由从帕米尔东一直延伸到萨雷阔勒盆地的萨雷阔岭以东。东土耳其斯坦的新的执政者阿古柏—伯克本人就出生于浩罕，他把同他发生纠纷的浩罕汗的军队赶到费尔干盆地。在东干维吾尔人起义被扑灭后，满清中国当局开始同俄国就中亚划界问题进行会谈，作为基础的不是老的边界，而正是这一新的边界，即所谓的“阿古柏边界”。在条约的第九条中就此写道：“俄国所属之费尔干省与中国喀什噶尔西

边交界地方亦由两国特派大员前往查勘照两国现管之界勘定安设界牌”(«一六八九——一九一六年俄中关系»,第五十六页)。

标定边界的工作是在一八八二至一八八四年进行的。一八八二年十月十六日,两国钦差全权大臣签订了特别界约,标定了伊犁地区的边界线:从天山北麓开始,向东北方向前进,穿过特克斯河,沿沙尔套山、喀尔套山向霍尔果斯河河口前进,沿霍尔果斯河至别珍套(彼得堡条约中文本译为别珍岛——译注)山上。从别珍套山开始,边界线走向阿拉套山,在名为喀尔达板的山口树立了最后一个界标〔见«外交部通报»,一九一四年,第四册,彼得格勒,一九一四年,第四十一至第四十五页(附件)〕。

塔城界约决定的边界的修改工作于一八八三年进行,七月三十一日,俄中两国特派全权大员亲到喀巴沙,签订了关于两国在从大阿勒泰山到赛哩乌兰山地段的边界新走向的条约(同上,见附件第四十六至第五十页〔附件〕)。

根据一八八一年彼得堡条约勘分的俄中边界,并没有到处都考虑到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的利益。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的居住地留在清帝国的版图内。因此,边境地区居民越境迁居往往产生误会。有时双方甚至不得不为此而签订补充协定。譬如,根据一八八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塔城签订的协定,一千八百户俄国籍游牧人归入中国籍,而另外一千户原来中国籍的人转入俄国籍。

由于一八八一年彼得堡条约条款规定后来勘划费尔干省和喀什噶尔省之间的界线,产生了所谓帕米尔问题,或称东帕米尔问题。

自从浩罕汗国在一八七六年归附后,俄国政府虽然也认为自己是浩罕汗的法定继承者,但在起初对东土耳其斯坦的原来浩罕的领地不特别感兴趣。这点在俄国全权大臣麦登斯基同清国特使在新玛尔拉城的谈判过程中表现出来,那次谈判的结果是,一八八

四年缔结了新玛尔拉界约。根据这一界约，分界线经过萨雷阔勒岭到乌孜别里山口（郎库里湖西北），那里设置了最后一批界牌。界约中假定边界线再往前去的走向是：从乌孜别里山口起俄国界线转向西南，清帝国界线一直往南。这两个方向都是暂时性的。

由于八十年代末期满清中国当局在英国的唆使下企图擅自占领东帕米尔，同清朝中国在东帕米尔领土上的划界问题又出现了。这使土耳其斯坦俄国当局不得不把在萨雷阔勒岭放哨的一些武装部队派到那里去。同时举行外交谈判，在谈判过程中，清朝政府特别引证一八八四年新玛尔拉界约，对中亚这些地区提出了毫无根据的要求（见扎伊钦科著：«帕米尔和萨雷阔勒»，塔什干，一九〇三年）。

一八九二年在彼得堡举行一次特别会议，讨论了帕米尔问题，会议本着和平解决的目的，决定放弃原来归浩罕所属的萨雷阔勒山谷的权利，决定同意沿萨雷阔勒岭划界。会议获悉在郎库里地区发现英国特务进行挑唆鼓动。这使俄国政府不得不通过俄国驻北京公使喀希尼提出如下声明：沿萨雷阔勒分水岭标界应是划界的主要根据。但是，清朝政府不同意这一建议。

一八九三年在彼得堡举行了第二次会议讨论帕米尔问题，会上研究了清朝政府通过喀希尼致彼得堡的专函。当时双方代表未在彼得堡举行会晤。在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吉尔斯同清廷驻巴黎公使庆章（чин чан）会晤时又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次年，庆章来到彼得堡举行谈判，但是，这次谈判并未使问题得到解决。最后，在同年即一八九四年四月互换照会，双方同意保持现状（«外交部通报»，一九一四年，第四册，第五十九页〔附件〕）。喀希尼曾呈报说，“双方在此情况下将保持各自阵地，而有关当局将奉令不越过上述阵地。”由此可见，萨雷阔勒岭南段边界线仍然没有划定。根据中俄换文，边界的走向是从乌孜别里山口沿着上述山脊起直至俄国、

阿富汗和中国领地的交接处(同上)。

中亚俄中领土的划界就这样结束，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的决定是这次划界的基础。这次划界是在比远东更为复杂而独特的政治、地理和民族的条件下进行的。然而，在这里有几个中亚汗国的领土并入俄国，它们过去从未属于中国，而历史上曾属于俄国版图。

这样，俄国同大清帝国的划界工作在二十世纪初就已完成。只有帕米尔的某些高山地段例外。在以后的年代中，曾对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规定的边界进行核定。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对额尔古纳河和阿巴该图丘陵地区的旧界曾进行检查。黑龙江将军(总督)和俄国全权代表菩提罗夫将军在齐齐哈尔达成了必须修定塔尔巴干达呼山到额尔古纳河口间的俄中边界的协定(见«外交部通报»，一九一二年，第二册，圣彼得堡，一九一二年，第一百零九至第一百一十一页；«外交部通报»，一九一三年，第三册，圣彼得堡，一九一三年，第六十七至第七十五页)。齐齐哈尔界约(一九一一年十二月)确认了一七二七年十月十二日换函中确定的这条边界线(从塔尔巴干达呼山第五十八界点到阿巴该图丘陵第六十三界点)。接着，正如尼布楚条约早就规定的那样，边界线沿着额尔古纳河伸延，直到该河与阿穆尔河汇合处。双方用新约划分了额尔古纳河上的岛屿(见«外交部通报»，一九一三年，第三册，第六十四至第六十七页)。

最后，于一九一五年签署了俄中关于霍尔果斯河(在哈萨克斯坦)划界补充议定书。这个文件核定了沿霍尔果斯河(伊犁河支流)边界线的走向。

可见两个封建强国——俄罗斯帝国和清帝国在开拓亚洲的一些从未形成过国家的土地的过程中发生了冲突。然而，这两个大国的相互关系是在不平等的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七世纪

到十八世纪，俄中关系的力量对比有利于中国，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清帝国是进攻的和侵略的一方。对于俄国来说，那时的远东是遥远的边陲。往那里调派军队只能步行或骑马，夏天只有几段水路可以利用。而清朝中国，特别是满清皇帝的世袭领地离阿穆尔河流域和滨海地区要近得多。俄国人在武力的压力下被迫割让了已经开发的和已经归入俄国版图的东西伯利亚和远东的领土。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是不平等关系的具体表现。

后来，在十九世纪时，俄国部分地收回了清帝国于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从俄国夺去的领土，而且是在没有使用武力的情况下收回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的意义就在于此。至于十九世纪中俄在哈萨克斯坦和中亚的相互关系，则俄国在这个地区继承了一些领土，这些领土或是自愿加入俄国版图的(哈萨克汗国)，或是塔什干汗国和浩罕汗国所辖但从来没有隶属过清帝国的领土。

俄中边界是在沙皇俄国和满清帝国尚是封建君主国的时期形成的。后来，随着新的资产阶级关系在俄国的发展，特别是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它的最后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沙皇政府对清朝中国的政策的性质，也同欧洲各资本主义强国、日本和美国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就在中国推行的殖民政策一样。弗·伊·列宁于一九〇〇年十二月在第一期«火星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战争»的文章，抨击了沙皇以及在中国参加镇压义和团人民起义的讨伐性军事远征的帝国主义列强政府奉行的侵略政策。弗·伊·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写道："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买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一八五六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抢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早就对中国实行这种掠夺政策了，现在俄国专制

政府也加了进去。”(«列宁全集»中文版，第四卷，第三百三十五页)

弗·伊·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谈到当时沙皇政府缔结的条约时讲了如下一段话："同志们，有各种各样的条款，各个强盗政府不仅签订了关于抢劫的协定，而且在这些协定中，还包括一些经济协定以及其他各种关于善邻关系的条款。……我们拒绝一切关于抢劫和暴力的条件，但是我们乐于接受一切关于善邻关系和经济协定的条款，这种条款我们决不能拒绝。"(«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第二百三十三页)

苏联政府从列宁的这些指示出发，在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的告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书中明确指出了它已宣布取消的那些条约，并建议中国政府同它就废除这些条约问题开始谈判。

苏联政府宣布，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同日本、中国及协约国"签订的一切密约都予以废除。众所周知，边界条约不是秘密条约。呼吁书中具体列出了苏联政府建议中国就其废除问题开始谈判的那些条约。其中有：一八九六年的俄中密约、一九〇一年的北京和约、一九〇七年到一九一六年间俄国同日本签订的有关中国的全部协约。

在苏联和中华民国一九二四年五月建立外交关系以后，两国间从未发生过任何有关苏中边界走向的原则问题。由于发生了日本军国主义占领中国东北三省（"满洲"）和在那里成立一个傀儡"满洲国"这两件事，在苏联的远东边界上开始出现无休止的武装挑衅。日本黩武主义者总是把"满洲国"对苏联领土某些部分的觊觎，特别是对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上的属于苏联的岛屿的觊觎作为进行挑衅的口实。所有这些蛮横挑衅，每次都遭到了苏联边防军和苏联正规部队的毁灭性回击。

在一九四五年八月苏军粉碎日本关东军以后，中国东北与苏联毗邻的地区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从那时起，特别是一九四九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以后，苏中边界，无论在远东，还是在中亚，成了两国人民的和平友好的边界。在这里建立了密切的贸易经济合作，共同与水灾、火灾和其他自然灾害作斗争，广泛进行科学技术和文化交流。在五十年代末以前，在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长达七千五百公里的整个边界上，没有任何边界冲突和争议曾使苏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变得暗淡无光。

从五十年代末，特别是从六十年代初以来，由于苏中关系总的恶化，中国边防当局（不无北京的指示）开始向苏联边防军提出无根据的要求。苏联出于使边界局势正常化的愿望，于一九六四年向北京派出了以苏联边防军总局局长泽里亚诺夫上将为首的代表团。代表团受权就核定两国国境线某些地段的边界走向进行协商；然而由于中国方面缺乏本着和平合作的精神解决一切问题的意愿，协商未获结果。

由于苏联表现出的主动精神，一九六九年十月苏中解决边界问题的谈判在北京恢复。要使谈判顺利进行和结束，必须采取建设性态度的不仅仅是苏联方面。苏共中央向党的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总结报告中强调指出，苏联不会放弃苏维埃国家的民族利益。苏联的边界是在我国整个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总结报告说，同时我党和苏联政府“深信，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的改善将符合我们两国根本的长远利益，将符合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自由和巩固和平的利益”（«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材料»，第十二页，一九七一年，政治书籍出版局出版），并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使苏中关系正常化和使苏中边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头十年存在的那种和平和睦邻关系的局面。为了顺利地实现这一目的，自然也需要对方朝着同一方向努力。

（译自苏联«国际生活»1972年第6期）

证实真相的文件

——摘自俄中关系史

卡 皮 查

苏联人民今年纪念了远东土地从白卫军和武装干涉者压迫下解放五十周年的大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文化科学的繁荣景象、苏联远东的发展成就——这一切都不仅使人对我国这一地区的今天和明天很感兴趣，而且也使人对这一地区在统一的俄国版图内发展的历史很感兴趣。

例如，对于我国同它在远东的最大邻国中国建立和发展相互关系的多方面的历史作深刻的科学研究就一定很有趣味。由于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国外有些人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千方百计地力图歪曲这一过程的真实情况，进行这种深刻的科学研究就更为重要了。

现在，由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东方学研究所及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共同编印«十七世纪俄中关系»两卷集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献和资料两卷集汇编»第一卷，一六〇八——一六八三年，莫斯科，一九六九年；第二卷，一六八六——一六九一年，莫斯科，一九七二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东方图书社主编，编纂者为 Н. Ф. 杰米多娃和 В. С. 米亚斯尼科夫，责任编辑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С. Л. 齐赫文斯基，校订者为历史学博士 Л. И. 杜曼)这部书是为读者和研究人员系统地和最充分地选用两国早期关系文献而编纂的。

第一卷于一九六九年出版。这一卷包括二百一十四篇文献，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首次发表。从文本的复制、日期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方面对过去已发表过的文献进行了重新核对。这部汇编中按时间顺序收入的文献包括从一六〇八年到一六八三年的事件，也就是，俄国政府同中国两个王朝——明朝和清朝的代表建立联系这段历史中的“谈判之前”的时期。

十七世纪初，当俄国东部疆界急剧扩大的时候，西伯利亚各城市的执政当局得到了一个半真半假的消息说，在草原和山岭那边有一个遥远而强大的国家，它威严地称为“大中华帝国”。这部汇编中的材料证明，这一消息促使西伯利亚各省设置了半官方的出使驿馆。汇编中有曾到过中国的西伯利亚哥萨克人写的报告，报告是用鲜明、形象、近似口语的文字写成，而且有确切的描述和恰当的评价。在普通俄国人眼中的十七世纪初的中国仿佛就在我们眼前。参加首次中国之行的人有，U. 佩特林，E. 维尔什宁及其随行人员，他们在北京受到了中国官员的友好接待，发给哥萨克人的证书可证明这一点。但是，由于中国路途遥远、道路艰险，所以当时同中国的关系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满族征服者夺取了全国政权和清王朝在北京接了帝位以后，俄国使节在北京受到的接待就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了。从时间上说，这两件事正逢俄国政府人士对中国的兴趣越来越大的时候，之所以产生兴趣是由于莫斯科和西伯利亚一些城市的市场上开始出现由中间商和蒙古使节运来的中国生产的商品。正是由于这些纯经济上的动机促使俄国于十七世纪中叶向北京派了第一个正式使团(费·伊·巴伊科夫使团)。

但是大使关于通商和建立固定的外交关系的建议遭到了满清方面的激烈反对。由于满清当局顽固地要求履行一套有损尊严的宫廷礼节，态度傲慢，明显地不想根据平等的原则进行谈判，使团

不得不离开中国，没有获得成功。以著名的外交家和学者尼·加·斯帕法里为首的七十年代派出的另一个大型的俄国使团也遭到了类似的命运。

汇编中发表的使节的札记（报告）中包含了各使团的全部历史、有关它们走过的道路的详细描写以及对它们所旅行过的那个国家和风土人情的叙述。尽管使团在外交上没有成功，但是他们的报告中所记载的材料对他们的同代人在认识方面有重大的意义，大大地扩大了对十七世纪中叶和第三个二十五年满清中国的知识，并有了具体感受。

除外交材料外，这部汇编的第一卷还收进了同两国关系有关的，关于俄国人于十七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迁居并从行政上管理阿穆尔河（黑龙江）流域的一大批文件。俄国移民迁移并定居阿穆尔河地区，以及他们沿着该河右侧支流挺进的做法很快引起了清朝政府的不安，这个政府把此地俄国人的出现，以及以罕帖木儿公爵为首的一大批当地居民自愿当俄国臣民的事实，看成是对离这些地方还很远的清朝政府在中部和南部满洲的领地的威胁。在叶·巴·哈巴罗夫和O. 斯杰潘诺夫的报告（公文）中，叙述了他们所遇到的满洲侦察队对他们的态度是如何逐渐变化的。开始时，他们持旁观者的立场，后来采取侵略性的敌视立场，即袭击俄国的封锁和单个哥萨克队伍，把向俄国人交实物税的达呼尔人赶到满洲腹地。

一九七二年出版的汇编第二卷实际上只是以前从未出版过的费·阿·戈洛文一六八六年到一六九一年外交报告文件集。这本文件集的篇幅很长。它包括了不仅在外交上，而且在内政上具有全权的外交使团活动情况的每日详细记载。这本汇编收集了同使团有关的所有的文件，这些文件都是逐字逐句地照登的，并且是用大使直接叙述的方式编纂起来的。关于内部供给队问题，关于湟

尔琴斯克省(尼布楚)和其他省的执政府的问题，只是简单列举了使团在好几年中所做的那部分准备工作。

但是，戈洛文使团的一项主要任务(同时也是文件资料文本中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一六八九年八月在涅尔琴斯克(尼布楚)举行谈判，谈判后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这是俄国和大清帝国之间第一个条约文件。

尽管关于这个问题有许多文献，但是，对尼布楚谈判经过以及在条文的解释方面，迄今仍有许多不明确和引起争议的地方。因此，详尽准备、全部公布这一极其重要的资料，会把这个问题阐明得更加清楚。就资料的丰富和可靠性来说，费·阿·戈洛文的文件资料不仅对研究俄中关系史，而且对研究诸如蒙古公国史及其同邻国的关系，西伯利亚和远东民族史等一系列问题，都是具有重要价值的资料。

除了俄国的主要文献外，汇编中还作为附件公布了与其有关的中国方面的文献，这一点应认为是十分有价值的。其中有西方耶稣徒杰尔比约(张诚)和佩雷尔(徐日升)的有趣的手记译本。他们俩人是作为满洲方面的翻译和调停者参加谈判的。首次用俄文公布了满文和汉文文献，这个文献包括两篇中国历史论文(«制服俄罗斯人的战略计划»和«兰塔尼(лантань)的履历»)，这些文献证明清政府对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要求是没有法律根据的。除此之外，还附有尼布楚条约的各种文本(俄文、满文和拉丁文)，后两种文本附有现代俄文译文。

用各种来源的材料这样来叙述这个问题，就保证这个问题的阐述具有最大客观性，使得能够互相查对和批判地核定他们所掌握的材料。所公布的全部文件描绘了谈判前双方所进行的准备工作。但是，对俄国方面来讲，这种准备工作的目的是保卫自己的边界，而清朝在谈判前夕所采取的行动的侵略性质则是不容置疑的。

许多年来满清军队有步骤地准备了入侵俄国领地，积集了兵力。他们的目的是把俄国人从自古以来就是他们所开拓的地区排挤出去，消灭阿穆尔河及其支流上的要塞和农村。

文件表明满清人在实现自己计划时所采取的阴险的策略。例如，满清将领致函俄国军营提议开始就领土问题举行谈判（老实说，这是派遣 Ф. А. 戈洛文使团的原因），但是不等复函到，他们就开始把阿穆尔河上的俄国前哨——阿尔巴津要塞包围起来了。把俄国和清朝外交活动手段加以比较，也可以看出同样的方针。Ф. А. 戈洛文小心翼翼地遵守事先约定的举行谈判的条件，满清使者却破坏这些条件的原则：他们违背协议陈重兵于涅尔琴斯克（尼布楚）附近，唆使邻近的民族和部族来反对俄国人。

不仅俄国人，而且连参加谈判的耶稣教徒，也都看出了满清方面在涅尔琴斯克（尼布楚）提出的领土要求是毫无根据的和荒诞的。这些要求是凭借武力提出来的。清朝当局在谈判期间在涅尔琴斯克（尼布楚）附近集中了大约一万七千五百人精锐部队。公布了这批真实文献，就可以打破中国史籍中所说的涅尔琴斯克（尼布楚）条约是双方自愿缔结（？）和互利的这种神话。

在这批资料中，关于双方通过条约确定界标的那一部分谈判情况是特别有意思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为什么缔约后不久就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含糊不清，而且这些含糊不清之处后来变得更加严重了。问题在于，到谈判的时候为止，对于有争议的地形的地理情况显然是研究得不够的；双方都不曾准确地知道一些山岭和河流的名称与走向以及海岸线的轮廓。这就在条约的文本中造成了乍看来是无法解释的一些异读。由于所有这些情况，俄国外交当局就有理由在十九世纪中叶通过和平途径修改条约的条款并最终确定远东的俄中边界。

这部文集的编纂工作是有高度科学水平的。以客观的科学的

态度来研究与往昔的俄中关系有关的事件，就可以证明某些人士想要加以歪曲的那些历史事实的公正性。

（译自1972年11月13日苏联《消息报》）

帕米尔各族人民历史点滴

（摘　要）

伊斯坎达罗夫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材料判断，帕米尔于十——十二世纪时共有三个相互有联系的集中开采银矿的地位：

（一）贡特河上游——托库兹—布拉卡盆区；

（二）巴查尔河谷；

（三）西普沙尔特河及其支流河谷。

在上述三个地区的每个地方都发现了古代矿工住地、熔炉残迹、熔渣堆和古坑道。在巴查尔河谷，除了这些古物外还发现了具有城市规模的居民区——巴查尔—达拉古城遗迹，很好地保留了中世纪物质文明的遗迹。这为全面说明帕米尔古代矿工的生活情况、生活条件、他们的文化联系和商业交往提供了条件。根据现有科学材料，帕米尔这个地区同西帕米尔有最密切的联系，后者是一个农业地区，同时也进行寻找和开采银矿的事业。为了寻找越来越多的银矿使中世纪西帕米尔的矿工越来越向东移，进入了东帕米尔，他们在那里开发了巴查尔河谷和西普沙尔特河谷。发掘这些地区古墓的工作证明，这些地区的居民很象当代的塔吉克人，属欧罗巴人种。证明这一点的还有下述事实：大居民点的发掘地点是十——十二世纪巴查尔达拉山区（穆尔加布地区）矿工、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城镇，在那里发现了保留到现在的用阿拉伯文和塔吉克文写就的文献。市民是塔吉克人，而城市本身叫作萨马尔罕达克——

小萨马尔罕。该地发现的出自费尔干的陶器和骰子证明这个城市同费尔干盆地有着广泛的联系。这一切说明，东帕米尔无论在中世纪，还是在远古，就同中亚有了最密切的联系。

历史事实表明，不仅帕米尔的居民，而且东土耳其斯坦的居民在经济上、人种上和文化上长期以来一直同中亚其他地区有联系。

众所周知，十一——十二世纪时东土耳其斯坦同整个中亚一道属于卡拉哈尼国的版图。再晚些时候，即十三世纪至十四世纪蒙古入侵之后，它纳入了察哈台汗国版图。历史证明，一旦到了决定中亚或东土耳其斯坦各族人民的命运时，他们就结成统一战线反抗奴役他们的人。随着八世纪初阿拉伯征服者的入侵，东土耳其斯坦与中亚之间的联系更加扩大了，因为这个地区的居民开始信奉伊斯兰教。东土耳其斯坦的教职人员享有了他们在毗邻的中亚地区享有的势力。随着霍加制度（霍加被认为是从布哈拉来到东土耳其斯坦的穆罕默德的后代）的出现而巩固了教职人员的地位。霍加迁往东土耳其斯坦是十五世纪中叶的事情。稍后，这里产生了两个教派，分别称为“伊什基亚”和“伊萨基亚”，嗣后分别称为“白山派”和“黑山派”。这些教派一直是敌对的。这种敌对状态过去曾被东土耳其斯坦的外部敌人，特别是准噶尔沃伊洛特人以及晚些时候的满清中国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加以利用。

满清军队还在十七世纪末就试图夺取东土耳其斯坦，但是他们受到了当地居民强有力的抵制，中亚各族人民帮助当地居民反击了满清的侵略。一直到十八世纪前叶，东土耳其斯坦是一个不依附满清统治的独立国家。满清军队经常出现在东土耳其斯坦境内进行掠夺。

在谈到这个时期时，必须指出十六世纪东土耳其斯坦以北出现了在政治上联合在一起的沃伊洛特人部落。邻近的穆斯林民族称他们为加尔梅克人，那个时期的俄国也很了解他们。这些沃伊

洛特人部落把留在那里的各民族从准噶尔排挤出去之后就同东土耳其斯坦直接毗邻起来，从那里不止一次地发动袭击，使当地经济蒙受了巨大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在十八世纪下半叶，满清乾隆皇帝奉行扩张主义的帝国政策，指派兆惠将军统率的大军攻打加尔梅克人。满清中国的军队进行了可怕的屠杀，结果打死了大约一百万加尔梅克人。其中只有一万人左右由于逃入俄国境内而得救。

中国军队先是向东土耳其斯坦，后来又向东帕米尔进攻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满清边疆都统的副手富德将军开始受到了当地居民的顽强的抵抗，但兵力是十分悬殊的。侵略者残酷镇压了为本身自由而斗争的当地居民。喀什噶尔和叶尔羌霍加中的封建上层无力抵抗，带领其信徒逃入帕米尔东部。富德为了追赶他们越过布伦湖与伊塞克湖之间的东帕米尔高原直捣霍加的营地。清兵用步枪和小型野战炮夜间轰击，使霍加的拥护者陷于一片惊慌混乱之中。满清中国人冲入营地。开始展开了白刃战，直到黎明。据史册指出，霍加和大部分忠于他们的居民逃往巴达克山。

富德致信巴克达山埃米尔苏丹索要求交出霍加。苏丹索起初试图拒绝富德要求。他向这个清朝将军保证说，他完全不知道东土耳其斯坦发生的事情。说他将根据教规惩处肇事霍加。不久的确有一霍加"死于"伤势，另一霍加被控侮辱苏丹索而处死，并将其首级并妻子儿女送交富德，保证尊敬满清皇帝。

但是清廷并不以此为满足。它要苏丹索将后者的尸体交出来。苏丹索同意了。霍加的尸体已遭野蛮处置，人头曾放在笼子里示众以恐吓北京居民。

所谓帕米尔，特别是帕米尔东部地区属于清帝国的说法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中国当局举出用来为这种说法辩护的唯一证据就是富德在镇压追随霍加进入叶什库里地区的东土耳其斯坦居

民时在一块石头上留下的题词。他在石头上写道，他路过了这个地区，因此这个地区臣服于清帝国，尽管人们确实知道富德很快就又回到东土耳其斯坦去了，帕米尔的居民仍然是独立的。北京统治者边疆政策的这种手法是有传统的。中国皇帝宣布凡是他们的军队曾经路过一次的地方就是自己的土地。与中国毗邻的各个国家在与中国打交道的全部历史上有过不少这样的事。人们大概不会承认这样的事就是论据。

东帕米尔在中世纪被认为是瓦汉人领地和舒格南人领地的一部分。东帕米尔的居民在历史上很长一个时期倾向于向费尔干纳方向发展并同帕米尔西部各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

十六世纪，在东帕米尔和卡拉捷金出现了吉尔吉斯民族。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吉尔吉斯人又移居新疆，他们在那里长期夺得了权力并成为对清帝国侵略军的威胁。

在十九世纪，吉尔吉斯人依附于浩罕汗国，其领地的边界远远地深入了帕米尔西部地区，甚至到达了东布哈拉。根据研究帕米尔国家的专家著名的Б·格罗姆勃切夫斯基确定，达尔瓦兹山的浩罕汗国的边界沿穆克苏河流域的山脊，从奥比兴古河、万奇河和雅支古列木河上游直下，继而转向贡特河和雅奇古列木河分水岭，走向舒格南地区的达巴斯特村。之后边界向东直到兰加尔一基什特地区，在那里穿过帕米尔河直达沙雷库里湖(维克多利亚)西岸，续而达到索尔哈达村而被兴都库什山和巴罗基尔山隔断。这条界限从古就是浩罕汗国与舒格南和瓦汉领地的分界线。

事实证明，沙雷库里领地和自古以来就是沙雷库里领地首府的塔什·库尔干城是受浩罕政府管辖的。沙雷库里的居民主要为塔吉克人和吉尔吉斯人。沙雷库里无论是在加尔梅克人统治东土耳其斯坦时期，还是在那以后一直是一个独立自主的领地。随着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浩罕汗国威力的增长，沙雷库里成了浩

罕汗国的势力范围。这个地区的居民同帕米尔周围各公国（其中许多是浩罕汗国直接的势力范围）其余地区有着血统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种局面。

专门研究这个地区的人写道："沙雷库里地区和帕米尔是浩罕各汗国所属的领地并由浩汗指派的特命官员管辖。的确，这些地方官经常宣布自己是独立的，并且由于地处边远难于接近有些时候也享有过独立。可是反抗者稍有作为就会重新感到它北面君主的威力。"

根据同一资料，沙雷库里的最后一个统治者是巴巴什长老的儿子叫阿拉夫一朔。老氏族巴巴什的这个后裔独立自主地管理了国家，是沙雷库里的一个独立的统治者。

满洲当局对沙雷库里领地不感兴趣。满清中国军队第一次出现在穆日河谷查柯尔湖地区沙雷库里是在一八八一年由佟嘎将军率领的部队。他是妄想夺得东土耳其斯坦统治者哈吉姆汗丘列宝座的人中的一个。他第二次出现是在一八八三年以普提雅廷为首的俄国科学考察队接近沙雷库里的时候。

随着中亚各个主要地区并入俄国，忙于组织管理新地区工作的土耳其斯坦边疆区当局没有可能准确地确定前浩罕汗国领地的边界。清朝巡逻队利用这个机会，在英国间谍的唆使下逐渐开始渗入毗连帕米尔的沙雷库里地区和西喀什噶尔山区，这些地区以前都是属于浩罕汗国版图的。

中亚的并入俄国和后来俄国部队向帕米尔移动在英国统治集团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英国人为了想制止俄国人继续向英国殖民地印度方向移动，就开始迅速向兴都库什挺进以便最后夺取许多小块封建领地并使这些领地同英帝国其他地区连接起来。例如，久兰特上校在写给乾竺特的统治者信里写道，乾竺特应受英国人的管辖。乾竺特的首脑赛必得·艾里汗断然拒绝英国军队进入自

己国家的领土。为此，英国人开始在这个地区集结军队。一八九一年一月二十一日一支拥有一千五百人的英国部队从吉尔吉特指向查尔特。次日英军夺取了查尔特并向乾竺特挺进。赛必得·艾里汗的失败导致英帝国主义最后侵占了这个地区。

新疆总督以英国人进攻兴都库什为借口打算侵占帕米尔并命令满清将领向苏满地方派出部队。表面上这支部队的责任是经常观察英军在帕米尔的动向，实际上这一举动的目的是要控制这个地区。

为了解决业已成熟了的帕米尔的矛盾，沙皇政府于一八九二年春决定派军队赴帕米尔并开始同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就标定边界问题进行谈判。

俄国代表在就帕米尔问题举行的谈判中提出了一些更根本地解决帕米尔问题的办法，然而中国清朝政权每次都找到了拖延解决问题的“原因”。自然，清朝当局的这种立场加剧了由于三个帝国——中国、英国和俄国——扩张主义政策而在这个地区造成的本来就是紧张的局势。在一八九四年标定边界的谈判中，俄国和中国商定“不越过各自在帕米尔沿沙雷库里山占有的阵地”。这条边界线一直存在到现在。

帕米尔居民在满军入侵帕米尔时不止一次地奋起反抗外国压迫。满人非法向当地居民征收赋税、征用马匹和产品，强迫人们在东帕米尔缺乏树林的地区为军队准备木柴。满清中国的军队特别残酷地镇压了该地区的多次起义。所以帕米尔土著居民大规模地开始逃往中亚其他地区、当地居民呈请俄国当局的代表表示自愿归并于俄国的事情屡见不鲜，这并不是偶然的。西帕米尔和东帕米尔被占领的地区的居民认为俄国的帮助是顺利进行反抗满清中国的压迫和反抗英殖民主义者的保证之一。

东帕米尔的吉尔吉斯族居民和帕米尔西部地区塔吉克人大部

分归并于俄国曾经起过进步作用。帕米尔被压迫的各族人民的历史命运至今同我们祖国俄罗斯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正在完成着给他们带来完全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伟大的革命事业。

（摘译自苏联《远东问题》1973年第1期）

十八世纪下半叶清帝国入侵中亚和俄国的政策

古 列 维 奇

在中亚的国际关系史中，十八世纪中期的标志是：清帝国开始大规模军事扩张，其矛头针对西部蒙古人或卫拉特人的国家——准噶尔汗国，也威胁到这一地区所有其他国家的人民。

由于受到满清中国的入侵以及肉体上被消灭（准噶尔居民已经遭受这种灾难）的威胁，哈萨克人和阿尔泰部落就请求俄国援助，俄国在中亚北部的影响在这时明显地加强了。俄国政府方面在额尔齐斯河流域和南西伯利亚采取了一系列非常的军事防御措施，以便防止清帝国可能发动的进攻。

虽然满清中国人毁灭准噶尔汗国的后果在苏联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得到了反映，但十八世纪中叶独立的蒙古国灭亡后的俄国的整个政策仍需要进一步研究。这无论对更深刻研究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和中亚的历史，或者是对揭露中华人民共和国某些历史学家美化清政府在中亚的对外政策的企图，都是必要的。

本文的任务是揭示十八世纪下半叶清帝国在中亚扩张的基本方针和特点，说明这一时期的俄中关系以及俄国在哈萨克斯坦和南西伯利亚采取的从军事上和政治上阻止满清中国在准噶尔、东土耳其斯坦和西蒙古疆界以外扩大侵略的措施的性质。

在十六世纪五十年代，当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汗汗国以及伏尔加河流域中游和下游纳入俄国版图之后，俄罗斯人就开始开发

西伯利亚了。十六世纪下半叶，从西西伯利亚直到鄂毕河都划入俄国，从而俄国的官宦和二界人士深入到南西伯利亚。在他们前进的途中出现了各种大小村庄，还筑起了大小城镇，它们起着据点作用并促进了俄国同当地居民贸易关系和其他关系的发展。在整个十七世纪，西伯利亚的俄国当局同阿尔泰的游牧部落头领们(王公一斋桑们)建立了牢固的联系，这些部落的一部分头领当时就已加入了俄国国籍。由于俄国在西西伯利亚和南西伯利亚设立居民点，俄罗斯帝国同独立的蒙古汗接近起来，并通过他们同明朝统治的中国接近起来。

从十六世纪九十年代起，当西西伯利亚大部分都已归入俄国的时候，卫拉特的封建主就经常提出对这个地方的南部地区的要求。然而在十八世纪头几个十年里，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上游也划入了俄国势力范围。准噶尔汗国的封建统治者不敢同北方邻国进行公开的军事冲突——因为满清中国的占领者从东南部发动进攻——但是他们时而也骚扰北方邻国。

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就在南西伯利亚和额尔齐斯河上游加紧修筑城堡。伊凡·布赫果里茨勘察阿姆河口之后，一九一六年建立了鄂木斯克和亚梅舍沃湖畔城堡。一七一八年在额尔齐斯河右岸建立了塞米巴拉金斯克要塞。第二年，一批俄国军官考察了斋桑湖畔和喀喇额尔齐斯河流域。此后不久，利哈列夫的考察队来到这里，它的任务是更详细地研究额尔齐斯河的河源。在返回途中，利哈列夫筑起了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要塞(一七二〇年)。就这样建立了一条阻止准噶尔封建主骚扰巴拉巴草原、鄂毕河流域和阿尔泰的额尔齐斯军事防线或称西伯利亚的军事防线。

额尔齐斯、库兹涅茨克、奥伦堡和其他防线的建设，为邻近各区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并使俄国移民源源不断而来，这反过来又促进了这里新居民点的出现。从而，这些防线既是军事

城堡，又组成了俄国在南部的居民点的链条。

为了使自己在南西伯利亚的领地免受游牧民族的骚扰，俄国政府希望加强卫拉特人的汗国政权。同时它还企图通过和平方式使某些准噶尔的统治者变为自己的臣民，而使它统治下的居民变为沙皇国库实物税的供应者。最后，沙皇政府认为最低纲领就是要继续维持独立的准噶尔汗国以便对抗清帝国，应当说这点加强了俄国在东西伯利亚和远东的阵地。

来自清帝国日益增长的威胁迫使准噶尔汗国统治者自己去寻求取得俄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支持的机会。首先是策妄阿布坦亲王。实际上这里说的是关于缔结俄国—卫拉特联盟和把一支俄国大军派往额尔齐斯河上游的事。实现这种计划的可能性就引起了清政府越来越严重的不安。但是这一计划始终未能实现，因为自从满清皇帝康熙死后卫拉特的封建主们希望清帝国的对外政策方针有所改变。但这种希望没有实现。

清帝国统治集团仍旧准备打击准噶尔汗国，并开始寻找俄国作为盟国。他们这样做是希望俄国同卫拉特的关系紧张起来。一七三一——一七三三年驻彼得堡的清政府代表就明确地暗示，只要俄国政府支持满清中国的计划，两个帝国可以瓜分准噶尔汗国领土。一位满清大使直截了当地说，当清军“进攻准噶尔人民(卫拉特人——作者注)，并占领其土地，那么……如果女皇陛下向他们提出什么领土要求，就将其割让给俄国。”但是，俄国政府不同意清帝国的意见。

在准噶尔汗国的东部和东南部边界给卫拉特统治者造成的困难形势，并没有妨碍他们经常对邻国哈萨克斯坦和中亚细亚进行骚扰掳掠，以及干涉俄国在南西伯利亚的内政。十八世纪初在哈萨克斯坦形成了对骚扰特别有利的形势。这里同时存在三个互相孤立的早期封建社会的大国——老帐或大帐、中帐和小帐，它们之

间为争夺权利和牧场发生了内讧。

当时中亚细亚就是这样一幅政治上分崩离析的五光十色的图画。希瓦汗国、布哈拉汗国和已经形成的洪罕汗国（安集延郡、那木干郡、玛尔噶朗郡和浩罕郡）和其他更小的封建领地也都被内讧和民族纠纷等搞得支离破碎。游牧于费尔干谷地和阿莱的吉尔吉斯部落处境特别复杂，它们经常受到较强的邻国，首先是浩罕汗国的压力。南阿尔泰为数不多而民族复杂的居民成了外国占领者的目标。

对中亚北部的事态发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的俄国政府特别关心哈萨克斯坦的形势。这是为了要保障俄罗斯帝国东南边界的安全。与此同时，俄国打算利用哈萨克草原作为进一步进入中亚的基地。哈萨克帐的统治者则表示希望同俄国接近，这是由哈萨克人生活的外部条件（准噶尔入侵的危险）和内部的经济条件（他们乐于同邻近的俄罗斯居民点建立更密切的贸易联系，向那里出卖牲口，换来工业品和粮食，这点具有特殊的意义）所决定的。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哈萨克斯坦开始并入俄国，这是一个漫长复杂的历史过程，这里不仅有政治上的原因，而且有深刻的经济原因。

一七三一年二月，小帐的哈萨克人自愿加入俄国国籍。入国籍的条件规定哈萨克人服兵役和向沙皇政府缴纳实物税，沙皇政府则承担保卫哈萨克人不受“俄国臣民”和其他“任何不怀好意的人”的攻击的义务。同年底中帐的汗谢麦克和他的一些绅绅加入了俄国国籍，一七四〇年，中帐新汗阿布尔马姆贝特和与老帐一些部族有紧密联系的该帐有影响的苏丹阿布赉申请加入俄国国籍。这样，到十八世纪中叶，中帐的大部分就并入俄国了。

与此同时，老帐的哈萨克人表现出向往俄国，老帐中的一部分苏丹和长老早在一七三三年就表示希望加入俄国国籍。一七三四年六月，安娜·约安诺夫娜女皇表示同意接受老帐的哈萨克人加入

俄国国籍的条件与接受小帐的条件相同。一七三八年秋，把类似这种内容的文书寄给在此之前申请加入俄国国籍的老帐汗若尔巴尔斯。这样，哈萨克斯坦东南部就开始并入俄国，这证明准噶尔的封建主企图加强自己在老帐中的影响失败了。但是，由于复杂的国际局势和上述地区远离俄国，沙皇政府没有能利用同老帐统治者协议的结果而巩固自己在巴尔喀什湖以南谢米列契的地位。

俄国那时在西伯利亚没有多少兵力，对中亚的事态就不能给予应有的注意。但是，清帝国日益增长的扩张野心迫使俄国当局加强南西伯利亚和哈萨克东北部的防御。例如，一七三八年，把额尔齐斯防线延伸到奥伦堡防线前哨，取名为新西伯利亚防线或伊希姆防线。一七四四年，在托博尔斯克建立了指挥驻扎在与准噶尔汗国毗连的地区的西伯利亚军队的指挥所。次年，由金杰尔曼少将指挥的两个步兵团和三个骑兵团被调到额尔齐斯防线。根据枢密院的命令，从一七五二年开始在哈萨克斯坦北部再修一条防线，称为普列斯诺戈里科夫卡防线或称高尔克防线。这条防线同伊希姆老防线（沿着伊希姆河、瓦加依河和托波尔河）之间的大片森林草原地区开始由俄国农民定居和开发。但是在中亚北部的俄国新领地的防御任务仍然靠有限的军事力量承担。

清帝国入侵中亚前夕的局势就是这样的。在准噶尔汗国内部，当时噶尔丹策零的继承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内讧，这种尖锐的政治形势助长了入侵的成功。俄国政府已经失去了对卫拉特国家事态产生影响的可能性，仍然奉行不干涉的政策。一七五四年底，一个准噶尔王位的觊觎者阿睦尔撒纳在夺权斗争中求助于清政府。这一来，满清人终于可以放肆地打击准噶尔汗国了。

一七五五年五月中，以阿睦尔撒纳为首的清军先遣部队进入了杰基斯河谷（准噶尔）。准噶尔汗国的主力很快就被摧毁，其国遂亡。征服者决定不准准噶尔汗国复兴，不履行让阿睦尔撒纳成

为总台吉(即全卫拉特统治者)的诺言，而把这个前汗国按其卫拉特部族的数目划分为四部分。这是阿睦尔撒纳反对自己以前的庇护者的原因。他们之间的激烈斗争于一七五七年以阿睦尔撒纳带一小批亲信逃跑而告结束。涌入准噶尔的清军残酷地杀害卫拉特居民，就连中国的历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例如，《中国历史丛刊》强调指出，“这次胜利是通过最残酷的、几乎是灭绝人性地屠杀准噶尔居民取得的。在准噶尔兴盛时期有六十万人以上；兵戈后，十分之三的居民遭清军屠杀，十分之四患病而死，而死里逃生的准噶尔人不得不逃入俄国。”这次逃跑是大规模的。一些阿尔泰部落也很快就并入卫拉特。

一七五五年初，清帝国的军队对阿尔泰一些地区造成威胁，要求阿尔泰的斋桑加入中国国籍。斋桑拒绝了并对征服者进行武装抵抗。同时，他们向库兹涅茨克的俄国当局请求帮助，向西伯利亚俄国当局的代表请求接受他们加入俄国国籍。例如，在一七五五年秋天，十五个斋桑联名向库兹涅茨克一科雷万斯克路线司令杰一加里加上校发出了这样的申请。为此，奥伦堡省督涅普柳耶夫向外交委员会报告，上述阿尔泰斋桑请求保护他们不受清军的危害并表示愿意甚至“先交今后……三年的实物税……”。阿尔泰人不等到正式答复就已经成群结队地在俄国南西伯利亚和上额尔齐斯的防线附近出现了。伯克斋桑十分艰难和付出了巨大损失来到乌斯季卡缅诺格尔斯克堡，向俄国指挥部报告，清军不仅“全部根绝了卫拉特人”，同时还“进攻我们(阿尔泰人——作者注)所有人，要一个不留地砍死，把小孩往河里扔或把他们送到远方”。

从一七五六年初，一批又一批的阿尔泰人请求加入俄国国籍。诺姆克斋桑代表其他十二个斋桑答应除交付实物税外，应沙皇政府的请求还派二千名士兵（杰一加里加一七五六年二月十八日的报告）。随后，以奥姆巴斋桑为首的所有斋桑来到比斯克要塞，请

求在上述条件下加速解决有关接受他们加入俄国国籍的问题。他们给杰一加里加写信："给我们保护吧；保护我们的土地以防不测，你们看到哪里合适，就修建城市吧。如今，我们这里有白人先生了"。

一七五六年五月二日，西伯利亚省督米亚特列弗接到外交委员会发来的一个命令，允许在南西伯利亚和东北哈萨克斯坦（在库兹涅茨克、比斯克、科雷万斯克、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和其他地方）筑防线开始接受卫拉特人、阿尔泰人和其他难民，以便引导斋桑及其亲属和其他绅绅宣誓，他们在加入俄国国籍后，"可以放心不受中国方面的威胁了"。毫无疑问，俄国政府作出决定是根据一七二七年签定的恰克图条约的条件，该条约宣布两国对它们之间的和平都表示关心，规定，只有逃民系对方臣民时才加以引渡。这为遭到清军追捕的卫拉特人和阿尔泰人大批迁到安全地方开辟了道路。已到的大批难民缺衣少食，几乎无法生存。他们有时虚弱和疲惫到无法自己走路，俄国当局不得不从要塞给他们派出专门的救护队，然后，给予物质帮助，据一个文件指出，"即使吃得很好……他们能否恢复也很难说。"

事态的这一进程加速了阿尔泰并入俄国，政府一七五六年六月一日的指令从法律上肯定了这一并入。俄国同阿尔泰各部族的政治和经济联系发展进程到此就完成了。额尔齐斯河上游在乌勒巴、布赫塔马和纳雷姆诸河入口处，以及比伊、丘伊、卡图尼、哈雷什河上游，捷列茨基湖和楚雷什曼河附近的阿尔泰人土地都划入了俄国版图。这时，大多数阿尔泰人仍在阿尔泰游牧，而卫拉特难民则迁到西伯利亚一些地区和其他地方。从此，阿尔泰人和从满人征服者那里逃出来的卫拉特人就免遭消灭了。他们面前展现出和平生活的前景，他们参加了俄国人民的比较先进的经济和文化行列。一八八一年俄中彼得堡条约最终规定南阿尔泰并入俄国版图、

关于阿尔泰并入俄帝国的问题的解决是适时的，特别是由于当时满清中国军队的入侵而引起的中亚北部局势的紧张没有缓和下来。一七五六年七月十八日，乾隆皇帝下令派清军追逐来自准噶尔的难民，而不顾这些军队打算行动的地方当时已属俄国版图。当时调动一支大军追捕阿睦尔萨纳，而且马上估计到，清兵将"开往俄国的边界"。不久，满清中国人以搜捕阿睦尔撒纳和其他卫拉特难民为借口，首次侵入哈萨克领土，并获准一旦哈萨克人对他们进行抵抗"就使用武力"。因为苏丹阿布赉不仅在中帐，而且在老帐的统治者中也有影响，他开始聚集力量以反击满清中国人，在一七五六年八月清军和以阿布赉为首的哈萨克自卫军发生了决战，结果哈萨克人失败了。

清军讨灭准噶尔汗国之后，从一七五六年夏天起就借口查拏阿睦尔撒纳，竭力进入卫拉特难民和阿尔泰难民所逃往的西伯利亚线。清朝当局坚决要引渡他们。这时，满洲政府硬说，卫拉特人早已加入"中国籍"，因此，应当遣回。但是，沙皇政府拒绝了这一要求，并公正地指出，一七二七年的恰克图条约规定可引渡属于缔约双方的逃民。而卫拉特人不是清帝国的臣民，因此，不应当引渡。

在满清中国军队打败苏丹阿布赉的自卫军之后，哈萨克人不得不象早先的南西伯利亚的阿尔泰人一样向俄国防线靠近。一七五六年十月三日，涅普柳耶夫向军事委员会报告，"中吉尔吉斯哈萨克汗国由于现正受到中国军队的压力，所以已向乌伊斯线接近，并请求保护……"。虽然有同清朝先遣部队发生冲突的危险，但是，彼得堡仍于十一月十九日向涅普柳耶夫及其副手捷夫克列夫发出命令：给予哈萨克人和其他难民提供避难和保护。这样做是出于下列理由："上述汗国（指的是中帐——作者注）本身已经不能对付这样的敌人，而我们方面……不予以某种保护是不上算的。"沙皇政府决定援助哈萨克人，并让他们通过哈萨克斯坦的防

线，因为沙皇政府懂得，清军有可能追踪难民。这在中亚细亚给俄国制造了新的军事政治问题。

政府一七五六年十一月十九日的命令根据当时的局势规定，不仅要以外交努力来给清帝国“沉重回击”，而且采取防御性行动。首先是，必须采取措施以集中哈萨克族的一切人力和物力对付侵略者，地方当局也应当设法对小帐的统治者努拉里汗施加影响，“从而对中帐提供必要的救助以对付其敌人”。其次，建议涅普柳耶夫和捷夫克列夫在必要时“向他们（满清中国人——作者注）发出急信说明，吉尔吉斯哈萨克人是我国臣民，因此，如果他们对中国朝廷提出什么不满的原因，则可以通过正当方式要求必然的决斗，否则，对他们——我国臣民的进攻定会违反目前同我们缔结的界约（指的是一七二七年的恰克图条约——作者注）”。因此，只有在确信一切和平方式已用尽时，才应该对入侵哈萨克斯坦的满清中国人采取军事行动。

一七五六年十二月十日，涅普柳耶夫向枢密院报告说，有相当数量的中帐哈萨克人向俄国防线接近，已采取了预防措施以应付这些地区一旦出现满洲中国军队的局面。但是，中亚细亚整个军事政治局势立即发生了变化。由于受图瓦人支持的蒙古王公成贡扎布进行反清朝起义和寒冬的开始，满清政府不得不把自己的军队撤出哈萨克斯坦。但是，满清中国人入侵哈萨克草原的威胁仍然存在。

一七五七年春天，清帝国的统治者着手准备对中亚细亚北部地区发动新的军事攻势。从乾隆皇帝一七五七年四月十五日的谕旨可以看出，在准噶尔的边境地区设立“一切重要卡子”，把由两三千名士兵组成的突击队集中到额尔齐斯河附近。以防（同哈萨克人）“发生军事行动”。曾同成贡扎布建立了联系的阿睦尔撒纳马上恢复了同满洲中国人的斗争，但是，在一七五七年七月遭到了失

败，于是不得不在俄国寻求避难。

一七五七年六月至七月在准噶尔展开的军事行动扩大到哈萨克斯坦边境地区。那部分未来得及接近俄国防线的哈萨克人被满洲中国部队追上，他们在最初的武装冲突中再次遭到了失败。接着苏丹阿布赉同清朝当局进行谈判。谈判以达成协定而结束，据中国资料记载，阿布赉根据协定表示同意“臣服中国”。似乎处于既依附俄国又依附清帝国的双重地位的阿布赉后来在阐述这样做的理由时说，“他那样做是迫不得已的，由于在人少的情况下他受到中国军队的各个方面的包围，不这样他无论如何逃不出他们的手掌”。

然而，哈萨克统治上层对臣服中国问题意见不一。据访问过阿布赉兵营的俄国密使说，“现今……许多长老都抱怨他——苏丹阿布赉，因为他们都不同意“背地里把他们列入中国国籍”。他们指出，“阿布赉下面的有名望的长老曾多方劝阻他不要加入这个国籍……”。哈萨克许多有影响的长老和缙绅不无理由地认为，阿布赉是“为了渔利”才承认双重附属地位，因为他指望从北京得到厚礼和确立自己在哈萨克草原的势力。但是，俄国当局，从涅普柳耶夫和捷夫克列夫一七五八年一月二十九日给外交委员会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则要阿布赉对俄国履行“虔诚的义务”，并告诫他谨慎对付中国人，记住卫拉特人的遭遇，记住满清人“对他们——吉尔吉斯哈萨克人要达到同样的目的，但由于他们靠近俄国要塞而得教了”。勿庸置疑，对俄国的防线的依靠使阿布赉有可能在俄国和中国之间周旋。

俄国政府在哈萨克小帐中居有较牢固的地位。一七五七年，努拉里汗就满清中国军队入侵哈萨克斯坦及其可能同俄国武装部队发生冲突一事会见捷夫克列夫时表示愿意站在俄国一边，并答应派出不少于三万人的军队……，甚至更多得多”。但是，一七五七年八月，清帝国武装部队不得不放弃哈萨克斯坦，以便参与镇压东

土耳其斯坦的反满解放运动。

一七五六年初，清帝国在东土耳其斯坦确立统治遭到了维吾尔族的顽强抵抗。满清中国人以血腥镇压来回答。譬如，清军在夺库车城(库车尔)时击毙了将近一千名和平居民。满清人妄图利用前封建神权统治者艾哈迈德霍加的后裔布尔汗·丁和汗·霍加兄弟的宗教威望没有成功。他们两人如同阿睦尔撒纳一样最初转向征服者一边，后来于一七五七年七月又反对他们。这场斗争进行了两年之久，但是力量不等，在清军的压力下，霍加及其信徒于一七五九年秋天由东土耳其斯坦逃往中亚细亚。满洲人如同对待阿睦尔撒纳一样，妄图利用追踪布尔汗·丁和汗·霍加的机会派自己的军队穿过吉尔吉斯游牧区进入浩罕、巴达克山和某些其他中亚细亚封地的边境。

伊斯色克库尔沿岸和南费尔干纳的吉尔吉斯人此时已经在浩罕、安集延和其他郡长老的控制下。但是，据中国资料叙述，满清人不顾这些，仍然力图要他们承认是清帝国的“藩属”，还妄图把这种附属形式强加于浩罕。但是，浩罕汗国统治者很快强盛起来了，以致威胁到满清中国人在其新领地中的统治。譬如，一七六二年，乾隆皇帝曾要求浩罕汗额尔德尼归还他从吉尔吉斯人手中夺去的土地，额尔德尼不仅拒绝这样做，而且在第二年，他的军队在东土耳其斯坦境内占领了一系列吉尔吉斯游牧区。封建主的连续不断的内讧以及来自邻国的经常威胁促使吉尔吉斯人于一七八四年向彼得堡派出了第一个使团，以便得到俄国的庇护。

由此可见，中亚细亚各族人民政治上的分散、俄国在该地区地位的软弱以及欧洲的复杂局势(那里的七年战争即将来临)，为清军最初入侵邻国提供了方便。但是，满清中国人在中亚细亚、哈萨克斯坦和南西伯利亚的扩张只造成边境地区偶尔的逃窜和混乱。尽管清政府仍然能以武力迫使哈萨克和吉尔吉斯的某些封建统治

者宣布自己为中国“藩属”（按中国半官方资料理解这个词的意义），但是，这一决定纯粹是形式。这种关系的基础是进贡制度，它仅是象征性地强调了臣服“宗主国”，因为它的“藩属”不对满清政府承担任何具体的义务，仍然免于交纳任何固定的赋税和服兵役等等。通常，在这方面，满清朝廷的答礼要比哈萨克斯坦和中亚细亚一些统治者给它送来的贡品丰富，这是为了证明满清皇帝的威力和“慷慨”，也象征着他的宗主权。清帝国同亚洲其他邻国也在不同时间保持了这种性质的相互关系。

由于满清中国军队占领准噶尔和东土耳其斯坦，于一七六〇年划入特殊行政单位“新疆”（“新的边界”或“新的疆域”）的这两个地方，实际上成了清帝国在中亚细亚的前哨。满清地方当局的一切内部措施以及新疆同哈萨克斯坦和中亚细亚边界的军事化政策都是服从于巩固这个前哨的任务的。

一七五八年初，由小帐努拉里汗兵营返回的俄国翻译雅科夫·吉利亚耶夫在奥伦堡介绍了他从哈萨克一些统治者那里获悉的清政府对准噶尔和东土耳其斯坦的以下计划：“……中国皇帝打算在准噶尔卡尔梅克各地建立城市，让中国人居住在那里，把原来属于准噶尔的小布哈拉城（东土耳其斯坦——作者注）……现在已经看作是自己的了，而在新城市建成之后，则打算向他们征税……”。根据他的材料，当时新疆已经驻扎了十八万清军，“吉尔吉斯人面对人数如此众多的军队处境十分危险”。

因为准噶尔在通往中亚细亚、哈萨克斯坦和西西伯利亚的道路上居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在这里，在前卫拉特游牧区，塔城（一七六一年）、绥定（一七六二年）、伊犁（一七六三年）等要塞城一个接着一个建立起来，流动哨兵正向附近的哈萨克和吉尔吉斯草原移动。譬如，可以根据这样一个事实来评断新疆的作用，即这里由中国内地来的移民剩下的非常少了。清朝当局想方设法限制边疆

区同邻国和邻国人民的经济联系，限制曾有过的（例如，中哈贸易）不太巩固的人为联系。实际上，贸易对于满洲中国人来说只是一个“政策工具”，在这种意义上的贸易与我国同哈萨克斯坦和南西伯利亚的迅速发展的经济联系有着天渊之别。

一七五七年夏天，阿睦尔撒纳以及在他周围的其他卫拉特难民在俄国的出现，使俄中关系进一步激化。尽管暴动的卫拉特汗在这之后不久就去世了。从一七五七到一七五九年期间，北京和彼得堡就引渡从准噶尔逃出的难民和交出这位前卫拉特统治者的遗体的问题频繁地交换了外交信件。

沉醉在对准噶尔人的轻易胜利中的清朝当局态度十分傲慢。例如，一七五七年秋曾在北京呆过的俄国政府钦差大臣勃拉季谢夫说，乾隆皇帝收到俄国关于卫拉特难民问题的一次答复后，威胁说要向俄国边界派出大军并“用武力把已加入俄国国籍的准噶尔人从那里挽救出来”。一七五八年三月十九日，外交委员会根据勃拉季谢夫从北京写来的惊人的报告，指示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俄国当局采取一系列“手段抵抗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正在继续针对额尔齐斯河流域的俄国加强防线增兵。两个月后，奥伦堡当局报告彼得堡：它们从哈萨克人处得知，满清中国人“真的”打算“进攻俄国边界”。怪不得乾隆皇帝也在一七五八年夏天追问哈萨克使者乌穆尔泰：“他们吉尔吉斯人是不是早就加入俄国国籍了。”他得到的回答是：“很早了，大约有五年到二十年了”，于是他千方百计地企图弄清哈萨克人在中亚发生俄中武装冲突时会采取什么立场。

哈萨克斯坦和南西伯利亚同清帝国边疆上的紧张局势促使奥伦堡当局积极努力吸引哈萨克人抵抗清军入侵哈萨克斯坦。一七五九年初，得到了小帐关于军事上支持俄国的口头保证。奥伦堡当局还想得到中帐，特别是阿布赉的军事支持。捷夫克列夫和勒奇

科夫还考虑了把中亚各国和东土耳其斯坦的维吾尔封建主的军事力量吸引到俄国这方面来的可能性。

关于哈萨克斯坦和南西伯利亚边境局势的惊人消息，促使俄国政府除采取外交努力外，在中国满清人可能发起进攻的道路上加速建设军事防御设施。西伯利亚省督索伊莫诺夫是这种办法的提议人之一，一七六〇年三月他提出了在从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堡沿布赫塔马河而下，直到捷列茨科耶湖这一段建设筑垒点的主张。向阿尔泰山脉派出了两个勘探队勘察建设新城堡和多角堡的地形。外交委员会根据这两个勘探队提供的资料，认为必须批准索伊莫诺夫的提议。

一七六〇年十月十七日枢密院发布了从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到捷列茨科耶湖以及在其他"合适地点"修建碉堡的指令，以及把二千俄国移民移到乌达河、乌利巴河、别廖佐夫卡河、格卢鲍卡亚河以及"注入这几条河和注入额尔齐斯河的其他河流"的两岸居住的指令。该命令说明政府十分担心清军的可能进攻。命令中指出，之所以需要修建碉堡，是"为了能对那方面更好地防御"，因为"中国人……越住下去那方面就越强大，并正在成为这方面（指俄国——作者注）的可疑邻居"。

与此同时，根据地方当局从哈萨克人那里得到的情报，清帝国首都对俄国发出了直接威胁。一位哈萨克苏丹的使者曾于一七六〇年到过北京，他说，乾隆皇帝仍然坚持要引渡全部卫拉特难民，乾隆还说："要是做不到这点，我就于今春（一七六一年——作者注）派出四十个山① 的中国兵到俄国的额尔齐斯河去打仗。"还从这位使者那里得知了中国清军在准噶尔集结的消息。

一七六一年夏，关于清朝中国准备对俄国和哈萨克人采取行

① 据原作者注一山合一万人。据清朝兵制，此处疑为"尚山"。——译者注

动的传闻最为流行。例如，从那时访问过苏丹阿布赉大本营的翻译戈尔捷夫的报告中就可看出。他得知，“似乎中国人真的想同俄国作战……”鉴于这些情况，叶卡德琳娜二世于一七六一年命令在布赫塔马河到额尔齐斯河的入口处修建碉堡。很快就建成了一个不大的布赫塔马筑垒。接着西伯利亚当局装备了一个考察团，派它到斋桑泊和喀喇额尔齐斯河去弄清中国人乘船沿额尔齐斯河入侵西伯利亚的可能性。考察团带回了令人宽慰的结果。但俄国政府仍然没有减弱对中亚北部地区事态的注意，因为仍然存在着俄清爆发武装冲突的危险。俄中关系继续恶化，最后，于一七六二年中断了贸易联系。俄国驻北京的传教团所在地受到了真正的包围。

该地区的令人担忧的紧张局势不能不影响到中帐的统治者，他们最终得要坚决地确定自己对俄国和清朝中国的态度。例如，巴图鲁库尔萨拉一七六一年十一月十九日的日记就证明了，“目前……苏丹阿布赉和吉尔吉斯哈萨克人毫不倒向中国方面，但却希望倾向于俄国方面，并且象以前一样坚定不移地加入俄国国籍，而对阴险狡猾的中国人却十分害怕。”还是用那位库尔萨拉的话来说，如果“中国军队向吉尔吉斯人发起什么进攻，他们就把自己的帐篷和妻儿送到俄国碉堡去，自己去抵抗中国人，要是抵抗不住，那么为了自卫，他们自己也希望到俄国碉堡去。”但是清当局警惕地注视着哈萨克斯坦统治者的行动。上面提到过的翻译戈尔捷耶夫在访问阿布赉后，于一七六二年秋天说，“驻在巴里坤湖的中国清军司令部派到中帐一个使团，带来了写给哈萨克的一些主要统治者(阿布尔马姆贝特和阿布赉等等)和吉尔吉斯全体人民”的信。使者代表乾隆皇帝要交“每户交一普特库尔特羊毛，要求一千只牛羊，要求派每人有两匹马的一万名吉尔吉斯军队及其装备。”应当于一七六三年春把哈萨克的非常后备军带到“伊希姆河或额尔齐斯河上游”，这支后备军应当在那里并入八万中国清军，然后“经额

尔齐斯高地到亚洲的撒马尔罕和土耳其斯坦……”。戈尔捷耶夫说：清朝当局的要求在中帐的哈萨克人中引起了“很大的疑虑”。据这位翻译说，在阿布尔马姆贝特汗和其他统治者召集的会上决定：“要是俄国方面不给中国人以任何援助，不通知他们要压制吉尔吉斯人，那就拒绝清政府的要求”，理由是“要是没有仁慈的女皇（叶卡德琳娜二世——作者注）的旨意，他们不敢这样做”，哈萨克人同清当局的关系日益激化了，这还有一个原因：中国满清军队不断骚扰边界山村，侵占牧场、牲畜等等。边境清当局特别迫害那些想收回过去被卫拉特人侵占的牧场的哈萨克人。

因此，在准噶尔同哈萨克斯坦的边界上经常发生哈萨克同中国的争端和武装冲突。有影响的哈萨克苏丹、长老和缙绅对阿布赉同清帝国调情的政策日益不满。这最终迫使他离开他所统治的阿塔盖族哈萨克人，企图得到其他族的支持，但没有成功。中帐的长老在一七六二年至一七六三年拒绝清使团通过他们的游牧区到阿布赉那儿去。最后，阿布赉本人也相信同清政府联系是毫无前途的。他的拒绝参加中国清军从准噶尔境内发动新进攻的准备活动就可作为这点的证明。据库拉卡的缙绅证实，苏丹阿布赉甚至已准备好以“个人名义”向中亚派出“急使”，以便弄清“那里的土耳其斯坦人和撒马尔罕人是否将同吉尔吉斯人一起反对中国军队。……”

所有这些事在同哈萨克斯坦毗邻的穆斯林国家里，首先是在阿富汗得到了反应。苏联一系列档案资料证明，阿富汗统治者艾罕默德—沙赫那时企图通过外交途径对清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它放弃在中亚扩张，然后，根据某些资料可以看出，他似乎曾开始准备同清帝国作战，力图为此把中亚的所有穆斯林人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俄国政府得知艾罕默德—沙赫可能采取行动的消息后，一七六四年底答应，一旦阿富汗人同中国满清人发生冲突，俄国政府将给以军事援助。但由于一系列原因，艾罕默德—沙赫一直没

有采取行动。

俄国当局继续密切注视哈萨克斯坦及其南部边界的事态。因此翻译马特维伊·阿拉波夫在一七六三年夏访问苏丹阿布赉之行的过程中收集到的情报特别引人注意。

这些情报涉及的问题很广。俄国政府特使首先说，中帐的哈萨克人“一般说并不效忠于中国”。他还报道了中国军队继续在哈萨克斯坦边界集结的消息，并说“那些中国军队当然打算同俄国不和”。阿拉波夫收集的关于东土耳其斯坦的反清解放运动日益高涨的消息引起了注意，东土耳其斯坦的人民“感到了中国军队的无法忍受的挤压”。

俄国政府无疑考虑到了所有这些因素，但是在存在着同满清中国发生军事冲突危险的中亚。它的政策则是从自己的本身力量出发的。哈萨克斯坦和南西伯利亚防御线的建设工作仍在继续。关于清军在俄帝国边界附近集结的消息和清军可能进攻北方的传闻，以及清军一七六四年夏天在布赫塔马盆地的挑衅行动，成了加紧这种努力的借口。同年十月在彼得堡举行的“国务会议”决定改进西西伯利亚的管理系统，并“重新命令防御边境，以免遭到突然袭击”。这里指的是不仅要增加西西伯利亚的兵员，而且要增加东西伯利亚的兵员，增加鄂木斯克、圣彼得和圣保罗的城堡、雅梅舍沃、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热列津卡、比斯克、库兹涅茨克、伊尔库茨克和色楞格斯克的兵员。

俄国同哈萨克斯坦在互利基础上发展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对哈萨克草原的形势起了有利影响，并促进了此地破坏性极大的封建内讧的停止。这不能不影响到那些仍然信任新疆满清当局的各种应诺的哈萨克苏丹和长老的政策。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在俄国和清朝中国之间看风使舵的苏丹阿布赉，于一七七八年二月要求叶卡德琳娜二世封他为汗。这个情况证明，俄国政府在中帐的阵地

加强了，再加上采取了其他措施，俄国在整个哈萨克的影响得到进一步加强，哈萨克越来越全面地同俄国的经济和政治生活相融合。

俄国在哈萨克斯坦和南西伯利亚防御线的加强，促使俄国人更积极地迁往额尔齐斯河沿岸地区和阿尔泰。这些地区的开垦则又引起了保卫它们的必要性。因此一七九二年在不大的布赫塔马防御工事上，建了一个强大的布赫塔马城堡，而在额尔齐斯河上游设了沃罗纳、切列姆尚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台，这些边台为新的布赫塔马防线奠定了基础。从纳雷姆河口沿右岸上溯，俄国设立了下海柳佐夫卡、上纳雷姆和小纳雷姆等岗哨。布赫塔马城堡不仅被当作“主要城堡”而寄予很大希望。它还应当促进同“亚地直至莫卧儿王朝”(印度——作者注)发展贸易。因此，组成新的军事防线和增加防线兵员，不仅是保卫哈萨克斯坦和南西伯利亚的重要因素，而且为从经济上和文化上开发这一地区创造了良好条件。

俄国的新老防线，到十八世纪末期构成了连绵不断的各种城堡，可靠地保护着东哈萨克斯坦和南西伯利亚免遭中国满清人的进攻。好战的清帝国统治者不甘心已经变化了的形势，仍威胁要派“大兵”“慑服”俄国。为了回答这些威胁，一七八五年七月曾宣布：“要知道，俄帝国什么都不怕；它在一大群强大的军事邻国的包围之中，但一直十分团结，它周围的国家都充分体验到了它的武力的分量，都知道我们的军队极其灵活，那儿需要就能立即调到那儿。”除这封信外，彼得堡同时向西伯利亚当局发了一条指示：要和平解决俄中可能发生的争端和分歧。

直到十八世纪末，清帝国入侵的威胁还一直使中亚各国担惊受怕。例如，以捷利亚特尼科夫和别兹诺西科夫为首的俄国驻塔什干第一个外交使团（一七九六——一七九七年）的材料就可证明。塔什干统治者尤努斯·霍加通过使团成员要求俄国政府在中国发动进攻时给予军事援助。一七九七年底来到彼得堡的尤努

斯·霍加的使者重申这一要求。他们还说，塔什干统治者愿意接受俄国的“庇护”。因为当时已经清楚，清帝国未必敢进攻中亚，因此俄国政府只是对尤努斯·霍加说，要是塔什干同中国发生冲突，“不排除……采取相应措施”。在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俄国在经济和军事政治上超过清朝中国的情况越来越明显。满清政府在中亚的阵地日益削弱，而同时，俄国在东方各族人民中的威望却日益提高。

十八世纪下半叶，清朝中国利用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阿尔泰人和其他民族之间的互不往来的情况，利用他们之间不间断的封建和种族间的内讧以及俄国在中亚地区阵地的相对弱小，在对中亚的政策方面把主要赌注放在武力上。但俄国政府顶住了满清中国人的进攻，避免了军事冲突，保卫了哈萨克斯坦和南西伯利亚的各族人民。满清中国侵略者因而未能最终实现自己的侵略计划，不得不停留在准噶尔、东土耳其斯坦和西蒙古的北方边境上。

应当指出，俄帝国和清帝国的中亚政策是有本质区别的。如果说俄国主要是通过和平方式把南西伯利亚同哈萨克斯坦的土地合并进来，那末清帝国则是在进行血腥的毁灭性的战争后，才使准噶尔、东土耳其斯坦和蒙古加入清帝国的，满清侵略者还曾企图把这种战争扩大到中亚北部，其中包括居住着当时已加入俄国国籍居民的土地。突出的一点是，俄国政府在把新土地纳入俄国版图后积极吸引当地居民参加国家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而清当局却继续使中亚的非汉族人民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

因此，俄国十八世纪下半叶针对清朝中国入侵中亚采取的政策，对哈萨克斯坦和南西伯利亚各族人民的历史发展起了巨大影响。深入研究这一政策不仅会引起巨大的学术兴趣，而且具有十分迫切的政治意义。

（译自苏联《苏联历史》1973 年第 2 期）

齐赫文斯基主编《中国近代史》一书的《编者的话》和关于俄中关系部分摘译

一、编者的话

现在献给读者的这部«中国近代史»是苏联中国史专家们编写的集体著作，它是专门探讨世界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的。众所周知，近代史的年代断限上起奠定欧洲资本主义胜利基础的十七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下迄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社会主义纪元的俄国一九一七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资本主义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后的对抗性社会经济形态战胜封建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确立和发展的过程，构成近代史的基本内容。

中国象绝大多数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一样，由于种种原因，远在荷兰、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之后才开始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在整个近代史时期，甚至延续到更晚的时期，封建关系一直在中国保持着统治地位。然而，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内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因素，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即在反抗封建秩序的压制并和殖民帝国主义势力压迫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结构。中国近代史的中心事件是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推翻满清王朝、形式上确立共和制的所谓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和波斯、土耳其的革命一样，同是一九〇五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之后到来的“亚洲觉醒时代”的最重

大事件。正是以“亚洲觉醒时代”为开端，中国卷入了世界民主运动。

住在辽东半岛北部、起源于女真部的少数民族满人之征服封建明王朝统治下的中国，恰好与世界史近代时期的上限——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相重合。一六四四年，满洲军事封建主终于侵入了中国疆界，他们首先依靠请清兵入中国以便镇压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强大的农民起义的中国封建主执行反民族政策，得以轻而易举地占领中国的京城北京，登上中国皇帝宝座。但是，满清向中国其余领土上扩展其统治，就遇到了广大中国人民群众的激烈而持久的抵抗。

满洲侵略者和中国封建主在对付中国人民过程中形成的联盟，是满清后来统治中国长达二六八年之久的阶级基础。本书考察的中国近代史时期的下限是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的各种事件正是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对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反应。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完成时期，中国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半殖民地。资本主义结构在中国所占比重还是非常微弱的。年轻的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在一九一二年借助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推翻了满洲统治、废除了君主政体，但是它在阶级关系上并没有和各种封建地主势力划清界限。它对工农劳动群众以及他们的革命行动十分恐惧，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对华政策抱有幻想，它看不到建立独立的资产阶级国家的途径和办法，支配着它的是走投无路、悲观失望的情绪。中国处在危机四伏的状态中，它被帝国主义列强支持的各个封建军阀集团无休止的混战弄得四分五裂。只是到了现代时期，在伟大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中国于一九一九年五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议封建军阀统治和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浪潮。只是到这个时候，方才开始了争取普遍民主和民族解放的新阶段。这一新阶段最后导致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一九四

九年创立主权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年轻的中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一部分经济上与国外市场有联系的地主登上政治斗争舞台之前，和依靠满汉封建主联盟的清廷封建统治进行斗争的主要角色是无数分散的、排满的秘密结社。在这些秘密会社中，主导作用往往为士绅所攫取（士绅为封建阶级中的读书阶层。厕身于士绅之列，就正式走上了升官和担任社会职务的通途）。

十九世纪末期产生的中国工人阶级，在本书考察的整个时期内并不是独立的政治力量。在二十世纪最初十年内产生了有组织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后，中国农民、士兵群众和城市劳动人民仍然是与满清王朝进行斗争的主要动力。由于一九一一年末至一九一二年初短时间内农民群众、城市工人、手工业者、城市贫民的自发起义，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资产阶级和地主自由派的君主立宪运动这三股反清力量的密切配合，推翻满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任务乃告完成。这三股反清基本力量的联盟历时十分短暂，而且极不巩固。推翻满清统治，代之以共和制度，并不曾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中国仍然处于封建军阀和买办的反动统治之下，而且，中国在近代现代之交变成了完全依附于帝国主义列强的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

在本书中，中国近代史分为以下四大阶段：(一)一六四四——一八三九年；(二)一八四〇——一八九五年；(三)一八九六——一九〇五年；(四)一九〇六——一九一九年。

本书按照这一分期法分为四编：«十七——十八世纪的封建清帝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侵入中国。农民战争和非汉民族的起义»，«清帝国变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和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开始»，«清王朝的被推翻和中华民国的建立»。占本书主要篇幅的是第三、四编，即帝国主义时代的中国近代史，这一阶段的历

史对于理解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有重大意义。本书第一编概括从一六四四年到一八三九年大约二百年的历史，意在使读者了解满洲封建主、军事首领、贵族在中国建立和巩固统治的情况。本编也考察了封建社会晚期中国社会内部发生的主要过程，说明清帝国政治制度的特征，阐述满汉统治人物的内外政策。第一编和以下各编一样，均以阶级斗争、劳动人民——农民和手工业者反抗封建剥削、反对满清统治者对其他民族执行征服政策为注意的中心。

本书第二编叙述英、法资本主义侵入清帝国的历史，阐明帝国主义大国——英国和法国对中国进行"鸦片"战争的原因、进程和后果。在这一编里，占中心位置的是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历史以及原来因使用暴力被强制纳入清帝国版图的各民族随之纷纷起义的历史。本编还研究了统治集团旨在巩固封建秩序的"自强"政策。

本书第三编专门探讨中国新起的资产阶级社会势力以及他们的政治组织在清代中国被变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劳动群众反抗清王朝和帝国主义侵略的自发斗争日益高涨的背景下所进行的活动。一九〇五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揭开了"亚洲的觉醒"的时代，掀起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强大高潮。

结尾的第四编专门探讨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中心事件——一九一一年推翻满人统治、宣告成立共和的资产阶级辛亥革命。本篇也研究革命之后封建军阀头子袁世凯以及北洋军阀中袁世凯的继承者攘夺国内政权的阶段，这些军阀集团在帝国主义列强压力之下把中国拉入了世界大战。本篇以叙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夕的事件为结尾，五四运动本身则属于中国现代史阶段。

读者可以在本书中看到有关中国农民领袖李秀成、洪秀全、张乐行等人的历史事迹的扼要记述，关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领导人

孙中山博士及其战友们的生平小传，对资产阶级地主立宪改良派首脑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张謇等人情况的评述，对一九一一年十月参加推翻华中地区清朝政权的武昌起义的人物们的简介。

本书还叙述了封建反动势力营垒的代表人物的活动，即满清皇帝、皇后以及扼杀人民运动的宫廷文武官员和地方封建大吏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人的活动。

本书有两章专门探讨中国近代史上关键阶段的经济状况，了解这些关键阶段的经济状况有助于理解资本主义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新的社会力量活动的过程，有助于理解中国以后发展阶段继承下来的社会经济极端落后和人民群众贫困的原因。书末专章概括地叙述了近代中国的文学。

读者可以看到，本书对于中国社会中的诸如军阀制度的出现、中国资产阶级中买办、华侨等各阶层的产生、秘密结社的活动、地方割据和各自为政情况的存在、爱国主义斗争中绅士成分的作用，农民空想社会主义平均主义思想对于劳动群众的影响，两千余年来一直是王朝制度的支柱的儒家封建思想体系的牢固性等一系列现象和过程也做了论述。

本书对中国民族形成过程给予极大注意。

书中作者们主要致力于研究中国社会发展的内部进程，对清帝国的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阐明在本书中只占居从属地位。

满汉封建主对喀尔喀蒙古诸汗国、黑龙江流域的俄罗斯诸村落、准噶尔汗国、东突厥斯坦、西藏、缅甸、越南各民族人民进行了流血的侵略战争；清政府(以及代之而起的“共和”政府)对待居住在国境内的非汉族人民的政策的特点是极端的残暴。蒙古、维吾尔、哈萨克、东干、壮、苗等族人民多次奋起反抗压迫者；有时候，非汉族农民群众和汉族农民一道展开反抗令人切齿痛恨的满清奴役

的斗争。

由于对问题研究得不够充分，书中关于居住在清帝国境内和中华民国境内非汉族人民的历史资料还很有限；全书内容以研究汉族人民的历史为主。

与中国的交往，对与中国毗邻的亚洲国家（朝鲜、蒙古、越南、日本）和欧美各国产生了影响和作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没有包括在我们这部集体著作之内。这一影响曾以极其多种多样的形式显现出来，研究中国在近代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地位问题时应当加以考虑。天主教传教士曾把理想化了的儒家哲学和清代前几个皇帝的政绩传到欧洲，他们报道的这些材料被法国百科全书派用以和中世纪制度、教会反动势力作斗争，他们根据这些报道鼓吹“哲学国王”的统治，据称只有在“哲学国王”治理之下才能使“理性获得胜利”，也就是使“第三等级”的代表人物参予国家管理。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各“开明”君主的宫廷中，模仿中国的建筑、绘画蔚然成风，出现了一种专门模仿中国的风格。

与中国通商贸易给英国（也给美、法、瑞典、荷兰、葡萄牙等国家）带来了神话般的利润，有力地促进了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贸易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彼此激烈竞争中进行的。一七七三年，英国当局对于从中国运来的茶叶征课超额关税，对此极为愤慨的波士顿居民把成箱茶叶投入海中，这就是历史上以“波士顿茶叶案”见称的事件，它是美洲殖民地争取独立斗争中的重要里程碑。曼彻斯特、利物浦、伯明翰的工商业集团向中国出售工业品而致暴富，他们对于英国的对外政策起着很大影响。英国、德国、法国、美国企业公司靠向中国供应军火和军舰、海轮而赚得大笔利润。铺设铁路、开发矿山的租让权，向清政府提供的一笔笔信贷，为英、美、德、法、比、日等国的银行家、工厂主、商人带来惊人的厚利。帝国主义获得利润的巨大源泉之一是十九世纪末开始在中国

创办的外国工业企业。在近代史时期夺自中国的香港和澳门直到今天仍然是英国、葡萄牙的殖民地，它们为宗主国带来巨额利润。从十九世纪末活跃于中国的各种传教组织的代表人物对于美国政策有强烈影响。这些传教士集团最后一个代表人物是不无名气的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在加利福尼亚出现"黄金热"之后，美国"黄奴"贩子开始向美洲输入中国苦力。使用中国苦力做为劳动力，促进了美国太平洋沿岸地区的经济发展。

清帝国统治阶级对十九世纪四十——六十年代英、法、美等国的侵略行动节节退让，屈膝投降，它们不借助于列强就无力镇压中国农民的起义。这种目光短浅的政策对于日本的各种新的社会力量是一个严重的警告，后者选择了维护国家独立、为实施业已成熟的资产阶级改革而斗争的道路。

清代中国多次干涉了朝鲜、蒙古、越南等邻国的内政，从而直接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历史。

近代中国反封建的阶级斗争的特点是带有鲜明的反满色彩，反满的民族主义使得中国各种新的社会力量的代表人物看不清主要敌人，不能进行反对把持着农村的封建关系的斗争，不能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政策的斗争。

然而，伴随着广泛的爱国主义的排满思想宣传以俱来的往往是大汉族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排外思想的增长。由于这种宣传的结果，远在中国古代和中世纪产生的中国人优越于其他所有民族的学说、号称"中央之国"和"天朝"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四外皆为蛮夷的学说也广泛蔓延开来。

大汉族沙文主义使中国各种新的社会力量偏离了解决紧迫任务的方向，即推翻封建制度、摆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他们认为，种种罪恶的唯一根源是满清王朝。在满清统治被推翻、各封建军阀集

团建立统治之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体系开始具有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性质。但是，即使到了中国史的现代时期，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也使劳动群众脱离争取自身社会解放的紧迫任务，扩散轻视国际革命运动经验的情绪，造成极度夸张中国所有的一切、不加区别地骂倒一切外国事物、维护反动旧传统的结果。

参予集体写作本书的成员在研究近代中国史的过程中，是以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教导为指针的。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不仅为当代进步的历史科学奠定了方法学基础，而且他们一直密切注视中国的事变，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发展进程作了一系列重要的阐述和评价。

比如，我们可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对于理解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鸦片战争这样一些中国近代史上极其重要事件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奠基人抨击清帝国的腐朽和落后，用他们的原话说，清帝国是“极端保守的堡垒”。他们把造成这种落后性的罪责归到满汉封建统治者头上。同时，他们怀着莫大的同情称颂中国人民与满清压迫者的英勇斗争，称颂中国人民抵抗英法殖民者的爱国主义行动。

我们在马克思著作中看到，马克思对与他同时的中国政治制度作了一系列切中要害的评述。他在一八五三年六月十四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分析了引起“延续了十年之久”、“通过宗教的、王朝的、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连绵不断的”起义的社会原因，指出“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马克思注意到：“仇视外国人，把他们逐出国境，这在过去仅仅是出于中国地理上、人种上的原因，只是在满洲鞑靼人征服了全国以后才形成一种政治制度。”马克思在解释满洲统治者与西方往来中采取这种闭关自守政策的原因时写

道："欧洲各国从十七世纪末为了与中国通商而互相竞争，它们之间的剧烈纠纷曾经有力地推动了满洲人实行这样的排外政策，这是毫无疑义的。可是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我们在同一篇文章中还看到，马克思对清统治者的政策和哈普斯堡王朝镇压奥地利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革命行动的政策做了比较。

列宁的著作中包含着帝国主义时期、清王朝统治末期的中国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许多光辉的论述。列宁早在第一篇论述中国的文章——一九〇〇年十二月在《火星报》第一号上刊登的《中国的战争》一文——中把清政府批判的体无完肤，指出中国人民和俄国人民一样，也"遭受到向饥饿农民横征暴敛和用武力压制自由愿望的亚洲式政府的压迫"。

列宁在一九一二年六月写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对辛亥革命前夕的社会做了确切的评价："中国这个落后的、半封建的农业国家的客观条件，在将近五亿人民的生活日程上，只提出了这种压迫和这种剥削的一定的历史独特形式——封建制度。农业生活方式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中国农民这样或那样地受土地束缚是他们受封建剥削的根源；这种剥削的政治代表就是以皇帝为政体首脑的全体封建主和各个封建主。"

列宁密切注视着中国人民与世世代代压迫他们的统治者进行的革命斗争。他全面地评述了一九一一年革命的性质和动力，透彻地分析了孙中山提出的纲领的历史意义。列宁把孙中山称为"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民主主义者"。俄国社会民主党布拉格代表会议上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是列宁亲自执笔起草的，在决议里，俄国共产党人热烈欢呼中国革命者的胜利。

在苏联史学文献中直到目前还没有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大部头的综合性专著。列宁格勒的中国史学家Г. В. 叶菲莫夫所写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一九五一年,莫斯科,第二版)是全面地阐述中国近代史所有事件的初次尝试。但是,五十年代初期研究中国近现代史问题的水平、该书叙述中国近代史的篇幅无多,使该书不能满足当前读者的要求。

苏联读者过去还可以利用译自中文的两部近代史: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第一册,一八四〇——一九〇一年,莫斯科,一九五五年)和简短的、通俗的«中国近代史概要»(莫斯科,一九六六年)。今天既不能认为上述两部中国著作十分完整,也不能认为符合当前历史知识的水平。

莫斯科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国组近代史小组全体编写成员几年来一直进行着编写这部专著的工作;在研究中国近代史个别阶段的过程中,先后出版了«中国的辛亥革命»(莫斯科,一九六二年),«满清在中国的统治»(莫斯科,一九六六年),«孙中山诞生一百年纪念文集»(莫斯科,一九六六年)等著作,刊布了«太平天国»、«义和团起义»、«辛亥革命»等文件集和«近代史历史文选»中有关中国近代史的章节、«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回忆录»(译自中文)等等。此外,中国近代史编写组中的若干成员近年来还就中国近代史的个别阶段发表了一系列专题论文。

本书考察的许多问题都是以研究原始史料为基础的。读者可以在附于本书之后的参考书目中找到著者们所使用的史料、文献的名称。

本书共分十七章。第一编是由历史学硕士А. Н. 霍赫洛夫执笔写的(第一章中的清帝国侵占喀尔喀一节是与历史学硕士И. С. 叶尔马钦科一起编写的)。以下各编的作者为,第二编:历史学博士В. П. 伊留谢契金(第二、四章)、历史学硕士А. Д. 伊帕托娃(第三

章)；第三编：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C. Л. 齐赫文斯基(第五、九章)、历史学硕士 Л. Н. 博罗赫(第三章)、历史学硕士 Н. М. 卡留日娜娅(第四章)、历史学硕士 А. М. 格里戈里耶夫(第五、六章)、历史学硕士 Ю. В. 楚多捷也夫(第七章)、历史学硕士 Е. А. 别洛夫(第七章中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一节)、历史学硕士 А. С. 科斯恰耶娃(第五、六、七章中有关农民运动的各节)、经济学硕士 О. Е. 涅波姆宁(第一章)；第四编：历史学硕士Е. А. 别洛夫(第二章)、经济学硕士 О. Е. 涅波姆宁(第一章)、历史学博士 А. Г. 克雷莫夫(第三章)、语言学博士 В. И. 谢曼诺夫(附录)。

本书是为对这一历史主题素感兴趣的广大读者编写的。为了便于阅读，决定不在正文中附加引用的这一或那一史料和文献的脚注(但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仍然标明出处)。在第一编第一章《俄国与中国的关系》一节中使用了俄国档案材料，所用材料的年、月、日都根据俄国旧历。

人名、地名、专名索引是三位历史学硕士 Л. Н. 博罗赫、А. С. 科斯恰耶娃、А. Н. 霍赫洛夫编的。他们也担负了将本书草稿交付出版的吃力工作。А. Н. 霍赫洛夫核对了中国地名、人名。

历史学硕士 А. С. 科斯恰耶娃担任挑选地图、图表、插图的工作。书目除由各章执笔人选定外，科学资料员Г. И. 格拉西莫娃也参加了这项工作。

本书编写组成员和责任编辑对于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国史组同仁在讨论本书草稿过程中提出的批评和希望表示恳挚的感谢。科学功勋活动家、历史学博士 Г. В. 叶菲莫夫教授、历史学博士 В. Н. 尼基甫洛夫、历史学硕士 Э. П. 司徒日娜阅读本书草稿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批评指正。编写组已经考虑了这些意见。

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领导以及资料员 М. П. 沃尔科娃协助准备了插图材料，本书作者们在此也深致

谢意。

本书编写组希望：提供读者的这部著作将促进中苏两国人民更能彼此了解和相互友好。

二、关于俄中关系部分

本书第一编题为«十七——十八世纪的封建清帝国»，这编的第一章«十七——十八世纪满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中有«俄国与中国的关系»一节，这一节的全文为：

俄国的哥萨克拓荒队向太平洋沿岸的推进，导致了十七世纪初俄国同明朝中国的头几次接触。一六一八年根据托博尔斯克省督的命令，托木斯克的哥萨克人伊凡·佩特林带领一小队官宦到了北京。善于观察的佩特林在中国首都逗留期间，收集了不少有关中国居民生活风俗的有趣材料。佩特林把明朝皇帝的一份公文从北京带到托博尔斯克，因为没有通晓中文的人，直到一六七五年才弄清这份公文的内容。明朝万历皇帝在公文中建议俄国人向中国派遣使节和进行贸易。

俄国拓荒者的大胆旅行，特别是瓦·丹·波雅尔科夫（一六四三到一六四六年）和叶·巴·哈巴罗夫（一六四九到一六五二年）对阿穆尔河（黑龙江）的勘察，为垦荒打下了基础。一六五二年建立了伊尔库茨克，一六五三年在石勒喀河的一条支流上建立了涅尔琴斯克（尼布楚）。在这之前不久，在阿穆尔河上游建立了阿尔巴津城，从一六八二年起，它成了阿尔巴津特别省的首府。

俄国移民从经济上开发阿穆尔河沿岸地区以及他们建造城市和要塞，引起了清当局的不安。当时，清当局只拥有满洲南部的一小部分领土。清朝将领企图把影响扩大到向俄国交纳实物税的邻近部族（埃文基人、达呼尔人和杜切尔人），在十七世纪五十年代曾

多次派兵打击小股哥萨克队伍。一六五二年，从宁古塔派来的二千满清军队突然进攻了哈巴罗夫的队伍。突击虽被打退了，但哈巴罗夫却不得不撤出松花江江口到阿穆尔河上游去补充队伍的人员、武器和粮草。

一六五二年，俄国政府决定向中国派出一个以贵族之子费多尔·拜科夫为首的贸易代表团。其主要任务是收集中国的贸易情报和邀请中国商人到俄国进行自由贸易。费多尔·拜科夫的使团实际上是第一个官方外交使团，俄国政府打算靠它同远方的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沙皇写给清朝皇帝的国书中说，俄国国王(阿列克塞·米哈依洛维奇)希望同中国皇帝深交、互爱和通信。拜科夫一六五四年三月收到了委托书和沙皇的国书，于同年夏天从托博尔斯克出发开始了艰难漫长的征途。一六五六年三月，拜科夫到达北京。从一开始，俄国大使就同清朝官员发生了严重摩擦，这些官员要他行卑躬的礼仪(包括叩头)。拜科夫把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交给清朝官员后，断然拒绝向他们递交沙皇的国书。尽管这些官员吓唬他说，因为他拒绝遵从朝拜而将予以惩办，但是俄国大使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要求亲自谒见皇帝递交国书。拜科夫没有达到目的，不得不于一六五六年九月七日离开北京。

拜科夫带来的中国商品促使俄国沙皇于一六五八年又派出了一个以“贵族之子”伊凡·佩尔菲利耶夫为首的外交使团。他一六六〇年夏天才到达北京。使团因被拒绝谒见皇帝而返回。除商品外，它还于一六六二年带回了回文，但是没有人看得懂。直到一六七五年，它同被佩特林带回的国书一起译成俄文时，才得知了上述国书的内容。国书说，中国皇帝接受了俄国沙皇送来的“贡礼”，并给予他“赐赏和恩典”。

И. 佩尔菲利耶夫使团和费·拜科夫代表团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阿穆尔河中上游的复杂的政治形势造成的，清当局企

图用武力把管辖权扩大到这些由俄国人占有并开发的土地。一六五八年奥努弗里·斯捷潘诺夫(代替哈巴罗夫)的队伍在松花江和呼热赫河之间的地区受到了大批满清军队的进攻。斯捷潘诺夫在力量悬殊的战斗中牺牲了,他的队伍撤退了,丧失了大部分兵员。

一六七五年三月,俄国政府又向北京派出了一个外交使团,并任命了一位曾在外务衙门干过事的尼古拉·斯帕法利(米列斯库)当团长。寄给这位团长向清朝皇帝递交的一六七五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沙皇国书中说,俄国沙皇希望同中国皇帝这位最亲切的近邻友好、友爱和经常通信。命令斯帕法利千方百计地说服中国商人带商品到俄国去,并使他们相信可以得到俄国政府的优待。除外交及贸易委托外,使团还有一系列纯科研性的任务。因此,使团随员中还包括地理、地图绘制、矿物学以及其他学科的专家。

一六七六年五月十五日,斯帕法利在商人和官臣的陪同下抵达北京。中国皇帝设宴招待了俄国大使,并准许俄商推销商品。但后来,清当局对使团的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清朝官员借口斯帕法利接受中国皇帝礼物时不是象宫廷仪式所要求的那样跪着而是站着,拒绝给他回文。他们同时还最后通牒式地声称,如果俄国人继续骚扰清朝"国界",俄国使节如果仍不执行宫廷惯用的全部礼仪,清当局不仅不会回答俄国沙皇的国书,而且将不许其使节和商人进入清朝国土。在清当局拒绝继续进行谈判后,斯帕法利于一六七七年九月一日离开北京,一六七八年一月五日回到莫斯科。

与此同时,清朝在镇压了大陆上的中国爱国者的反抗后,继续在阿穆尔河中上游加紧军事行动,企图千方百计地挤走那里的俄国人,并把这一地区并入自己的领地。

一六八二年满清康熙皇帝从北京到了沈阳。尽管官方宣布说,皇帝是在中国东南部的军事行动顺利结束后去那里祭祖的,实

际上此行是视察性的。中国皇帝了解了这一地区的军事政治形势回到北京后，派出大臣郎坦到阿尔巴津附近去以猎鹿为名收集情报。中国皇帝得知这一地区只有少量俄国军队的消息，便命令准备出兵。一六八三年在捷亚河河口以下的阿穆尔河右岸建了萨哈梁山城堡瑷珲，开设了转送公文和粮草的驿站，从中国内地向沈阳派出了补充兵员。

一六八三年六月，大批满清军队在瑷珲附近向梅利尼科夫伯爵的部队突袭。六十七名哥萨克人组成的部队在力量悬殊的战斗中遭到了失败。一六八四年七月，满清军队乘船到了阿尔巴津，俘虏了掩体外的三十多名俄国人，但未敢夺取城堡。清朝军队一年后再次来到阿尔巴津城下。拥有一万多军队、一百五十门野炮和五十门攻坚炮的总司令彭冲(Пэнчунъ)要阿尔巴津人投降。俄国城堡中会用武器的只有四百五十人，还有三门平射炮和四发圆形炮弹。尽管如此，当地省长阿列克谢·托尔布津仍决定抵抗。在火药和铅弹用完后，阿尔巴津人开始用石块抵抗。但是力量相差悬殊。托尔布津看到城堡已被烈火包围，妇孺可能遭难，才开始谈判。结果准许俄国人带家属离开阿尔巴津，并拿走武器。

涅尔琴斯克(尼布楚)省督伊凡·弗拉索夫得知这个消息就上报俄国政府，并于同年八月把从阿尔巴津前来涅尔琴斯克的哥萨克人和托尔布津送回去。哥萨克人回到阿尔巴津后，在被满清人毁灭的城堡旧址上建了一个新要塞，周围垒起土墙并挖了深沟。一六八六年七月六日清朝军队再次来到阿尔巴津，并要城防军投降。当时，城内有八百二十六人(包括农民和商人)。他们有八门铜炮、三门火绳炮、一门马炮、一百四十枚手榴弹、几个铁球弹、火药和铅弹。而清军指挥部拥有八千多军人和四百门攻坚炮。满清人对阿尔巴津的包围持续了五个月。一六八七年春俄国城防军的处境特别严重：被围人中发生了一种流行病。到一六八七年

五月，只剩下了七十人。满清军在阿尔巴津城下丧亡了二千五百人，始终未能夺取这一城堡。一六八六年十二月，他们根据皇帝的命令撤围，但仍对阿尔巴津各方实行了封锁。

早在一六八五年五月，中国皇帝在派兵到阿尔巴津去时，向俄国沙皇发了一封建议谈判的信，信中对阿尔巴津哥萨克人的行动表示不满，并要求他们从阿穆尔河撤走。一六八五年十一月中旬此信寄到了莫斯科。正忙于准备对土耳其作战的俄国政府决定用和平方式调解同中国的冲突，于一六八六年一月底派出了以费·阿·戈洛文为首的使团。俄国政府在由急使带往北京告知派出使团消息的信中，对清军侵犯俄国领土提出强烈抗议，它还强调说，要是中国皇帝在开战前派出使节，一切争端就都会和平解决。该信还建议中国皇帝把军队撤回原地，派出谈判代表。一六八六年十一月沙皇急使抵达北京，见到了中国皇帝。一六八七年五月六日解除了对阿尔巴津的封锁，但清军仍未撤出俄国领土。他们沿阿穆尔河而下，在离俄国城堡五俄里的地方扎下了大兵营。

清朝一面同意和谈，一面又企图唆使蒙古诸汗进攻俄国人。一六八八年一月初，奥其尔汗（土谢图汗）听信了清朝官员的话，向色楞格斯克和乌金斯克发动了进攻，但同戈洛文一起来的莫斯科射手和西伯利亚哥萨克人打退了这次进攻。蒙古汗被打败的消息，迫使中国皇帝急忙向戈洛文派出使节。但是，中国皇帝得知图舍图汗的又一次失败（这次败于嘎拉丹部队）后，命令使团从半途折回。

一六八八年九月，清朝急使来到色楞格斯克，他们要求俄国大使将谈判推迟到翌年夏天，似乎这是因为雨季的到来。满清人打算利用赢得的时间同嘎拉丹斗争。戈洛文接受了建议，但同时声明，要是中国皇帝过迟派出使节，而阿尔巴津城下的清军欺负老百姓和糟蹋当地人种的庄稼的话，俄国人将采取武力，而这要由中

国皇帝自己负责。一六八九年一月俄国大使给北京一封信，提醒中国皇帝即将举行谈判。

七月十六日清朝钦差大臣在七十六艘战船和八千军队的护送下来到涅尔琴斯克地区。一夜之间，在这个有六百名城防军的俄国小城市前面，就搭起了一座驻扎一万五千人的大兵营。八月九日，戈洛文带着一支射手队到达涅克琴斯克，八月十二日在离该城半俄里搭起的帐篷内开始了谈判。基于俄国人长期占有阿穆尔河左岸，而该地区的其他达呼尔土地的领主王公罕帖木儿又自愿加入俄国国籍，戈洛文建议将这个自然屏障当做最合适的边界线。戈洛文的建议受到了清朝使节的强烈反对，他们坚持沿涅尔琴斯克划分边界。不久清朝使节中断了谈判，把军队开到涅尔琴斯克，并从四周封锁了该城。由于清军不断准备新的军事行动，以及被围的涅尔琴斯克的形势恶化(马和骆驼大量死亡)，俄国使节八月二十三日决定作出最大让步：放弃阿尔巴津。八月二十七日签署了条约，交换了用俄文、满文和拉丁文写就的条约文本。

尼布楚条约共分七条，规定确定国界；规定双方各自保留和约签订前跑来的逃亡者；规定引渡和惩罚偷越国境、掠劫以及犯有其他罪行的人的办法；规定互相贸易。该条约只确定了俄国和清帝国在阿穆尔河上游地区的国界，而且正如此后进行的地理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划分得很不准确。由于俄国使者的坚持，乌第河以南的土地没有划界。俄国钦差大臣不得不毁掉了阿尔巴津，但他们从清朝使节那里得到了保证：今后将不在城堡所在地及其附近住人。尽管两国建立了和平与贸易，但用武力强加于人的尼布楚条约对俄国来说，"仍意味着丧失了俄国的哥萨克和移民花了四十年开垦出来的很大一块土地。

但是，根据尼布楚条约从俄国夺去的土地在以后的一个半世纪里(直到归还给俄国)，不仅没有得到经济开发，甚至连清朝臣民

也没有定居。在这期间，远东和滨海地区仍然是只有极少数果尔特人、乌里奇人、尼夫赫人等土著居民居住的原始森林边远地区。

一六九二年三月，俄国政府向北京派出了一个以移居到俄国的荷兰商人埃维尔特·伊兹布兰特·伊德斯为首的外交使团。伊德斯按斯帕法利的路线，于一六九三年十一月三日到达中国首都。尽管俄国大使两次被准许进入王宫，他的随行人员也推销了自己的商品，驻北京使馆的情况仍然十分不自由，这是由于地方当局的警察监视过严。清朝官员借口沙皇国书中把中国皇帝的尊号写在俄国沙皇尊号之下，就把国书和礼物退回给大使。尽管如此，他们仍向俄国使者保证愿意遵守尼布楚条约。伊德斯于一六九四年二月十九日离开北京，次年二月一日回到莫斯科。从皇帝根据理藩院(该院代表同伊德斯进行了谈判)的奏章发布的命令可以看出，准许俄国商人三年一次到中国首都来经商。

清朝当时正在寻找对准噶尔汗国作战的盟军。因此，从北京派出一个使团到正在伏尔加河流域游牧的卡尔梅克汗艾玉奇那儿去，这个使团于一七一三年九月底到达托博尔斯克。这个由图理琛为首的使团于一七一五年春天回到北京，并把关于自己经西伯利亚到伏尔加河的旅行详录交给了中国皇帝。一个俄国神甫也在一七一五年到了清朝首都。这实际上为未来的俄国传教团打下了基础，该团除了在被俘后分散居住在北京东北部的阿尔巴津人中办理宗教需要外，还研究汉语、满语和蒙语，并从事这三种语言的书籍的翻译工作。

清当局拘留边界上的俄国商队的做法给官方贸易带来了严重损害，这促使彼得一世政府向北京派出了一个以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团御林军大尉列夫·伊兹马伊洛夫为首的新使团。俄国使者带着九十名随员于一七一九年七月离开彼得格勒，于一七二〇年十一月到达北京。同清朝钦差大臣的谈判相当吃力，因为清朝方面

感兴趣的首先是边界事务，而俄国大使感兴趣的是贸易问题。在几百名蒙古人迁居俄境后，谈判陷入僵局，伊兹马伊洛夫不得不离开北京。

一七二四年在色楞格斯克开始了关于把逃亡到俄国的蒙古人归还给中国的谈判。谈判时，清朝大臣坚持要把俄国土地同当时还属于清朝版图的哈尔哈土地划开。代表俄方的洛连茨·兰格说他没有被授予全权，清朝官员要求派一名俄国大使来北京。俄国政府满足了这一要求，于一七二五年八月向中国派出了一个以特命大使全权大臣级的C. Л. 弗拉季斯拉维奇—拉古津斯基伯爵为首的使团。使团于一七二六年十一月到达北京。首都当局为大使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命令军队夹道列队并鸣礼炮。但是在盛大欢迎后，开始了艰难的日子，清朝钦差大臣要求交还后贝加尔等俄国土地。清当局为了制止俄国大使的反抗，不给使团以食物和水，甚至还威胁要把他们监禁起来。拉古津斯基建议到边界上继续谈判。一七二七年六月恢复了谈判，并于八月签订了条约，该条约按俄国大使扎营地布列亚河（位于色楞格斯克以南一百公里处）命名为布连斯奇条约。

拉古津斯基把人派到西面和东面边界去立界标，把布连斯奇条约送到北京，以便把它列入一个总的条约，总条约中有十条是早些时候在中国首都达成的。俄国大使发现，从北京寄来的条约文本同他早先与清朝钦差大臣达成的文本有很大的差别，感到惊奇万分。拉古津斯基提出了抗议，要求将此事报告中国皇帝。清朝使节开始时威胁要把俄国商队从北京赶出去，但最终还是向俄国外交官的要求让步了。一七二八年六月十四日，在恰克图河上举行了已签字的恰克图条约文本的交换仪式。新条约规定了同蒙古土地的界线，确定了两国外交交往的办法（通过枢密院和理藩院），规定了恢复同中国首都的商队贸易，固定了俄国传教团在北京的

地位（该团可经常保持三名神甫和六名从事中国各族人民语言研究工作的学生）。

同准噶尔汗国作战造成的困难，促使清朝再次求助于在伏尔加河流域游牧的卡尔梅克人的支持。因此，清朝决定向俄国沙皇派出一个使团。该使团应获得到卡尔梅克草原去的许可。一七三一年一月十四日，清朝使节到达莫斯科，受到了隆重欢迎。一月二十六日，他们受到了不久前登基的安娜·约安诺夫娜女皇的接见，把中国皇帝表示友谊的信件交给了女皇。清朝使节在正式和非正式谈话中，力图使俄国政府支持清朝对准噶尔的侵略计划。俄国政府没有对此作出回答，只是准许清朝使节到伏尔加河去一趟，但是这次对卡尔梅克汗的访问没有成功；因为汗根据俄国当局的劝告，拒绝派兵打准噶尔。清朝使节在归途上，于一七三二年一月在托木斯克附近遇上了另一个使团，这是使团在得知安娜·约安诺夫娜登基的正式消息后从北京派出的。第二个使团于一七三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到达彼得堡。第二天，在女皇的加冕周年日里，使团受到了安娜·约安诺夫娜的接见。接见时，他们报告俄国女皇：清朝希望同俄国友好。几天后他们走上了归途。

俄国是中国使节访问的第一个欧洲国家。清廷向俄国沙皇派外交人员，首先是出于军事战略考虑，而俄国政府进行接触首先是为了贸易。

在一七五五年满清中国封建主打败准噶尔汗国后，清廷对俄国的态度发生了激烈变化：以指责、污辱、甚至军事威胁代替了过去对俄国政府及其代表的友好。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首先是因为某些蒙古公国转到了俄国方面，这些公国的居民往往因为受不了清朝官员的压迫而不得不背井离乡。为了解决边界争端，俄国政府于一七五六年向中国派出了信使瓦西里·勃拉季谢夫。还责成他就俄国船只在阿穆尔河上自由航行以便供应远东城堡的粮草

而达成协议。清朝官员不友好地接待了俄国代表。勃拉季谢夫只获得了在恰克图恢复贸易的许可，于一七五七年离开北京。

一七六〇年清朝边防当局对在恰克图地区安装木桩子一事提出抗议，俄国当局是为了制止边界上的私货贸易而安装这些木桩子的。一七六四年，清朝边防当局完全停止了在恰克图的贸易，从买卖城贸易村召回了所有的中国商人。一七六八年五月初伊凡·克罗波托夫大尉来到伊尔库茨克解决边界争端。一七六八年十月他在恰克图签署了一项协定，协定规定拆除边界木桩并取消对俄国商人征收关税。这个协定还改变了恰克图条约第十条的措词，从而把以中国传统刑法为基础的惩罚叛逃者的原则强加给了俄方。

一七九一年，卡尔梅克喇嘛加邦(萨麦林)从俄国跑到中国，散布流言说俄国正在准备同中国作战。他以似乎有人写给一七七一年从伏尔加河跑到准噶尔的卡尔梅克人的一封俄文信作为根据。中国皇帝命令把喇嘛带到北京，要理藩院向俄国政府提出质问。枢密院坚决驳斥了关于战争的流言并证明信是假造的，建议解决边界争端。谈判结果，于一七九二年二月八日签订了一项协定，双方重申愿意遵守恰克图条约并保持“和睦”。这个被命名为国际条约的文件也规定了惩罚违反边界秩序的新办法：各方有权按本国法律制裁本国的臣民。把这条写入国际条约是俄国外交官的重大成就，因为这种司法程序消除了清当局干涉俄国当局行动的可能性。

十七世纪中叶前，俄国同中国的贸易主要是通过中亚商人进行的，这些商队经常到托博尔斯克、塔拉、苏尔古特、托姆斯克等西伯利亚城市。这些商人运来的东方商品中，主要是中国的丝绸棉布，以及有很高的医用价值的大黄根。

费·拜科夫之行是俄中贸易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他开辟的

道路(经雅梅什湖)立即引起了俄商的重视。G. 阿勃林一六六八年的北京之行尤其成功。他带回的商品价值一百八十九万七千卢布，沙皇国库从中获得了百分之三百以上的利润。

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于一六七〇年而后 H. 斯帕法利于一六七六年开辟的经过涅尔琴斯克的路线，不久成了俄国同中国开始实行贸易和外交联系的主要道路。随着通向中国新路的开辟和中国商人的直接而零星的联系的建立，俄国商人稳定地在俄中贸易中占有了统治地位，我们挤走了中亚经纪人。

签订尼布楚条约后，俄国同中国的贸易大大扩大了，特别是通过涅尔琴斯克的贸易，这里成了中国边界附近的主要转运站。据俄国海关资料记载，一六九〇年运来了一万四千五百卢布的中国商品，一六九二年运来了三万八千卢布的商品，一六九六年运来了五万七千卢布的商品(宝石和丝绸不计在内)。十多年中，经涅尔琴斯克同中国的贸易就其周转额来说已开始同俄国商人的中亚贸易不相上下，超过了俄国在西方通过普斯科夫·季赫文和斯摩棱斯克进行的对外贸易。

一六九五年，俄国政府了解了私商通过涅尔琴斯克贸易的情况，决定组织官商队同中国贸易。为此，一六九七年对珍贵毛皮(貂皮和玄狐皮)实行国家垄断。一六九七年二月从莫斯科出发到北京去的第一个官商队给国库带来了百分之十五的利润。一七〇六年，彼得一世政府禁止商队运私货到北京。同年发布命令，禁止俄国臣民向中亚商人出售毛皮。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于一七〇七年出发的第五个官商队给俄国国库挣来的利润比这以前的各个商队的利润多了四至五倍。

一七一〇年后，同清朝的官方贸易停滞并继而下降。原因之一是私商资本发展，尽管有了限制措施，但私商还是能找到通向中国市场的道路。一七〇六年命令发布后，蒙古的库伦城成了俄国

私商贸易的主要地点，从色楞格城到此城需十到十二天。在北京，打着“使馆”和官商的招牌，也在广泛进行私人贸易。另一方面，清当局也使俄国贸易遭受了严重损失，它经常中途拘留商队，在张家口征收巨额关税，并千方百计地阻挠俄国商人同中国居民建立业务接触。

一七五八年向北京派出了第十六个俄国官商队，也是最后一个官商队。因为一七六二年，俄国官方取消了对中国贸易的国家垄断。停派官商队促使俄中贸易集中到了边界上，主要是集中在恰克图，根据一七二七年的条约，私人贸易从库伦转到了此地。例如，一七四四年这里换来了价值二十八万七千五百卢布的中国商品，而官商队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起换来的商品还不多于十万卢布，并且往往亏本而归，根据这种情况就可以估计恰克图贸易的规模。

位于额尔古纳河右岸离涅尔琴斯克三百公里的楚鲁海图镇是另一个边境贸易点。根据一七二七年条约，俄国商人的私人贸易从满洲的齐齐哈尔市转到了这里。通过该点进行的贸易量不大，一般是在恰克图停止贸易时才有所增长。

一七七二年起，恰克图成了同中国的唯一的合法贸易点。尽管从一七七八到一七七九年这两年中断了贸易，此地的贸易额从一七六九年到一七八四年增长了一点七倍。俄国出口中占首位的仍然是毛皮，它占百分之七十八点八。在恰克图换得的中国商品中，占首位的是棉织品。一七七五年至一七八一年（一七七八年至一七七九年除外）这种织品（连同数量不多的毛织品在内）占中国对俄国出口商品中的百分之六十三。恰克图集市在俄国的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一七六〇年，从这里的贸易中得到的收入占俄国全部关税的百分之二十点四，一七七五年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五。对发展贸易联系感兴趣的俄国政府力争同中国建立睦邻关系。

至于清朝政府，它却千方百计地阻挠俄国商人同中国商人实业接触的扩大。清当局以各种借口（最常用的借口是细微违反边界规定）不止一次地中断恰克图贸易。据俄国档案库资料记载，仅从一七四四年到一七九二年，清朝边界站就曾十次中断过该站的俄中贸易，具体情况是：一七四四年（十七天），一七四七年（两天），一七五一年（一天），一七五三年（五个月零三天），一七五六年（一个月零七天），一七五九年（十一天），一七六二年（六年），一七七五年（三天），一七七八年（两年零十三天）和一七八五年（七年）。清当局的这种行动不仅对发展互利贸易带来了严重损害，而且阻碍了俄中两国人民间的紧密的政治和文化接触的确立。

本书第一编第二章《资本主义列强入侵前的清帝国（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有《清帝国和俄国的关系》一节，这一节的全文为：

俄国政府与西方列强不同，它对中国奉行另一种政策，力求建立睦邻关系。之所以奉行这种政策，是由于俄国和中国有着漫长的共同边界，而且俄国政府对保持和发展早在十七世纪中叶就建立起来的传统贸易联系深为关心。

一八〇三年四月，贸易大臣 Н. П. 鲁米扬采夫伯爵在为筹备往日本派外交使团而呈给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奏章中，建议向中国派驻外交使团，以便扩大贸易。俄国政府根据往年的经验知道派驻清廷的外国大使曾遭到什么样的刁难，于是决定预先征询清廷的意见。一八〇四年六月收到了答复及清朝当局表示同意俄国使团到来，但请求事先通知大使的启程时间及其随员人数。由于准备送给皇帝的礼品的工作拖延下来，枢密院于一八〇四年九月请求清政府把接待使团的工作推迟到来年。

一八〇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俄国政府任命 Ю. А. 戈洛夫金

伯爵为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陪同外交使团的有，由著名波兰历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波托茨基伯爵率领的科学考察团。这个考察团的成员有天文学家、植物学家、动物学家、矿物学家、流行病学家、外科医生、药剂师和语言学家。根据指示，戈洛夫金应获得清当局的准许可沿整个边界线或至少在其西段（经过新疆）进行贸易。还命令大使就俄国商人在广州，如有可能也在南京进行贸易的问题取得清当局的同意。他应就商队贸易的问题同中国达成协议——这种贸易在这之前俄国商人已获准在北京、满洲和蒙古进行了。这位俄国全权大使还应请求允许俄国政府往北京派驻其常任外交代表，如此事遭到拒绝，则为驻北京的俄国传教团团长求得就贸易问题同中国当局进行谈判的权利。

一八〇五年七月初，戈洛夫金由彼得堡启程，并于九月到达伊尔库茨克。当俄国大使正在熟悉西伯利亚的情况时，接到了库伦行政长官的来信。库伦行政长官责怪枢密院发来的信中内容含混不清，因为信里没有说明外交使团是否携有送给皇帝的“贡礼”，如果有的话，是什么样的礼品。象先前写给伊尔库茨克副省长的信一样，库伦行政长官在这封信里仍坚持要求减少大使随员人数，并要求提供献给皇帝礼品的详细清单。

十月十七日，戈洛夫金到达恰克图，并于二十日派出译员到库伦通知戈洛夫金本人已抵达边界，并告知外交使团的目的。戈洛夫金在信里说，他携有呈给皇帝的公文，俄国皇帝在这件公文里通知他已登基，并表示希望同中国保持友好。由于戈洛夫金懂得清当局企图把俄国外交使团同向皇帝“朝贡”的“藩属”使团同等看待，于是表示不能同意减少随员人数。

十二月底，终于传来皇帝准许俄国使团通过边界的命令。戈洛夫金把科学考察团团员和护送队留在西伯利亚，就启程前往库伦，于一八〇六年一月十五日抵达该地。在相互拜访后，大使应库

伦行政长官邀请出席了以皇帝的名义举行的宴会。当戈洛夫金及其随员到达宴会厅时，库伦行政长官竟当着一大群人的面让俄国大使在点着三支蜡烛的桌前行叩头礼。大使拒绝了。经过五个小时的争吵，戈洛夫金离开了库伦行政长官。第二天，有人向他宣布，他如果不行礼就应返回。但戈洛夫金回答说，在未得到皇帝的命令以前，他不打算返回俄国。

二月上旬，北京传来了命令，指示如果俄国大使拒绝按礼节行事，就让他返回。由于戈洛夫金拒绝到行政长官公署跪着接领圣旨，就把命令文本送到他的宾馆。库伦行政长官要他具结保证他在北京朝见前几天“演习”叩头礼，但戈洛夫金拒绝了，并准备返回。一八〇六年二月十五日，俄国外交使团离开库伦赴恰克图。这个外交使团在边界浪费了三个多月的时间等待入境，并在库伦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同清当局进行毫无结果的谈判之后返抵俄国。

早在一八〇三年八月初，由“希望”号和“涅瓦”号两艘船组成的考察团在伊·费·克鲁逊什特恩和尤·费·李斯扬斯基指挥下离开喀琅施塔得驶往远东。考察团除了要向在美洲大陆和堪察加的俄国领地运送货物外，还受命把 H. П. 列赞诺夫的外交使团送到日本，并在广州同中国商人开展贸易和在太平洋进行科学考察。原来预定，当时已准备派出的戈洛夫金的外交使团如能得到清政府有关许可，考察团才去广州。在俄国外交使团访问了长崎并返回堪察加以后，列赞诺夫没有得到关于戈洛夫金的消息但估计戈洛夫金同清当局的谈判会取得成功，于是就建议克鲁什特恩赴广州。一八〇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希望”号驶抵澳门。为了不驶入西江口，并于外停泊场等候“涅瓦”号，克鲁逊什特恩对中国当局说，他的船是军用船。过了十二天，“涅瓦”号驶抵这里。第二天，该船同早些时候曾访问过广州的克鲁逊什特恩碰头后，驶往该市。俄美公司代表找到了一名保人——“公行”商人（李彦玉），并得到海关

提督的许可，开始卸货。不久，根据克鲁逊什特恩的请求，第二艘俄船“希望”号也被允许进行贸易。当俄国代办人着手装载买到的货物时，地方当局扣留了他们的船。这是根据清朝总督那彦成的命令搞的，由于他害怕在皇帝面前承担允许俄船进行贸易的责任，就命令在接到北京有关指示以前，在广州扣留这些船只。直到在俄国代表再度抗议后，地方当局才撤走了看守队，并不等北京命令到达就允许他们的船出海。

俄船的到达广州，特别是许可它们进行贸易，引起了清廷的不满。尽管海关提督颜奉以开辟海上贸易似乎会减少恰克图陆上贸易的收入为理由，在从广州给皇帝的奏章中反对授权俄商在那里进行贸易，但是皇帝仍然由于他越权而下令惩办。

戈洛夫金的离开库伦以及枢密院就此事向北京提出的强烈抗议，使清廷，特别是使边境行政当局感到恐慌。库伦当局由于害怕俄国政府采取报复措施，于是命令它在买卖城的官吏严格遵守边界规则，并采取一切办法同俄国人保持友好。一八〇六年底，戈洛夫金被从西伯利亚召回以后，清当局对俄国军事准备的担心才平静下来。一八〇九年，库伦行政长官致函伊尔库茨克省长 H. Ц. 特列斯金，表示愿意亲自同他会晤。特列斯金在获准进行这次会议以后，就通知库伦行政长官，说他本人同意举行会谈。清廷认为，俄国方面会表示愿意派遣新的外交代表团去北京“朝贡”，于是就命令库伦行政长官不要反对这种愿望。同时，清廷还指示库伦当局争取未来的外交使团启程赴首都以前能减少该团的随员。

一八一〇年三月，特列斯金省长同库伦行政长官在恰克图举行了会谈。当提出向中国派遣新的外交使团的问题时，特列斯金建议根据双方平等原则签订一个互派外交使团的双边协定。讨论这个建议时出现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没有得到克服。尽管这样，双方分手时还是相当友好的。清廷在接到有关这次会谈的消息后，

就命令库伦行政长官：一旦恢复谈判就建议俄方向理藩院提出派遣外交使团的请求，并保证皇帝将予以优待。同时，库伦当局接到命令，不必要求俄国大使在库伦行叩头礼。但清廷却同时指示库伦行政长官拒绝往俄国回派外交使团，其理由是，清帝国作为一个拥有许多“藩属”的国家，似乎从未向其他国家派遣过自己的使臣。

尽管清当局回避同俄国建立以平等互利为基础的关系，俄国政府对中国的政策仍然是友好的。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K. K. 罗多芬金于一八三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在给北京俄国传教团团长的信中确定这一政策的原则写道：“俄国外交部对中国关系中的主要和一贯的目的是政治上的和贸易上的；政治目的是维持和加强同中国这个同我国有相当长的共同边界的国家的友好联系；贸易目的是为本国工业和相互利益而扩大并发展我国同中国的贸易往来。”

本书第二编题为《资本主义列强的侵入中国。农民战争和非汉民族的起义》，这编的第三章《一八五六——一八六〇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有《俄中沿阿穆尔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定界》一节，这一节的全文为：

俄国同英法不同，在十九世纪中期还继续同中国保持着睦邻关系。一八五一年七月二十五日俄国政府代表同清政府代表在库尔扎（伊犁）签署了俄中中亚边疆地区贸易正常化条约。这个条约宣布双方有权在上述地区进行免税贸易，俄国商人可以顺利进入库尔扎市和塔城，俄国领事负责监督俄国臣民的交易活动，清政府的专员负责监督清帝国臣民在同新疆接壤的俄国边疆地区的交易活动。伊犁条约为俄国同清帝国通过中亚边境进行定期贸易奠定了基础。

五十年代末，将俄国根据一六八九年尼布楚条约暂时丧失的远东领土归还俄国的问题已提到俄中关系日程上来了。俄国提出

这个问题有下列根据：一，根据尼布楚条约，乌第河、阿穆尔河中游之间被满人根据该条约用强力从俄国夺去的土地未正式划定，“俟后再行议定”，后来，一七二七年俄中恰克图条约第七条也确认了这点；二，当俄国在一六八九年丧失的领土没有被满人和汉人定居和开发的同时，俄国人越来越多地在东西伯利亚定居和开发，这样就使最终解决远东边界问题变得极为必要了；三，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美国和法国在英法对俄国发动的克里米亚战争的情况下积极向远东水域渗透，这样就造成了西方列强侵占阿穆尔河下游地区和滨海地区的威胁，甚至迫使俄国当局得要刻不容缓地解决远东边界问题。

考虑到这一切，东西伯利亚 H. H. 穆拉维约夫将军受俄国政府的委托着手同清政府的代表、镇守黑龙江的奕山将军就划定边界问题进行谈判。经过谈判，于一八五八年五月十六日（二十八日）签署了中俄瑷珲条约。这个条约规定，“黑龙江、松花江左岸，由额尔古纳河至松花江出海口，作为俄罗斯国所属之地；右岸顺江流至乌苏里江作为大清国所属之地。自乌苏里江往彼至海所有之地，此地如同接连两国交界明定之间地方，作为大清国、俄罗斯国共管之地。”这样，俄国在一六八九年丧失的大部分领土重新归还了俄国，而乌苏里边疆区（滨海地区）在定界之前仍为俄中两国临时共管之地。

两个星期之后，即一八五八年六月一日（十三日）签署的俄中天津条约承认，有必要进一步确定两国之间一系列地段的边界。条约中有一条说，中俄之间尚未划定的部分边界将立即由两国政府委派人员就地勘查并商定边界线：“边界既定之后，登入地册，绘为地图，立定凭据，俾两国永无此疆彼界之争。”

为了履行这个协议，在一八六〇年恭亲王同英法代表北京谈判中充当调停人的俄国驻中国钦差大臣 H. П. 伊格那提耶夫同恭

亲王签订了新的条约，并于十一月二日(十四日)在北京签字。根据这个条约，清政府重申了一八五八年瑷珲条约的各项条件，并承认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归俄国所有。顺便说说，在这块领土上既没有满族和汉族的常住居民，也没有清朝的管辖机构。

本书第二编的第五章《一八六〇——一八九五年清帝国统治集团的"自强"政策》有《一八六〇——一八八五年清政府和资本主义列强》一节，其中谈到中俄关系部分为：

中国为外贸开放港口，对于沙皇俄国来说是不利的，因为沙皇俄国处地遥远，商船队力量薄弱，工业又落后，所以它未能象英国、法国和美国那样把自己的商品运到中国海港，在那里购买中国商品。

一八七二年，四分之三的中国丝绸通过普鲁士输入俄国，四分之三的中国茶叶是通过英国，仅有四分之一是通过西伯利亚输入的。西欧资本家靠俄中贸易发了财。

虽然，整个说来沙皇制度的政策具有掠夺的殖民性质，但是，由于上述原因，沙皇政府既未曾主动地把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也未曾主动地维护一八六〇年以后一系列条约。俄国同中国的贸易是通过商队途径进行的，具有完全平等的性质；清朝和俄国两国皇帝根据一八五八年的瑷珲条约和天津条约通过和平外交途径确定了边界——世界上最长的一条陆界。一八六〇年的北京条约最后确定了两个帝国的边界；一八六四年的塔城界约和一八六九至一八七〇年界标的设立，都进一步明确规定了清帝国的西部边界。俄国靠开拓既没有汉人居住、也没有满人居住、在经济上同清朝中国没有联系的土地来扩大在远东和中亚细亚的领地。俄国在远东扎根，引起了西方大国的强烈反对。英国、法国和美国曾策划占领阿穆尔河(黑龙江)流域、滨海地区和堪察加。在克里米亚战

争期间(一八五三——一八五五年)，英法舰队对堪察加沿岸地区发动了攻势。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守兵给予了武装干涉者以英勇的回击；美国商人和兽业家加紧向太平洋的俄国领地渗透。

俄国加强它在中亚细亚的阵地，特别遭到了英国的阻挠，因为英国本身积极设法向中亚细亚渗透，同时竭力使自己的印度领地和阿富汗避免俄国的影响。

满洲中国的政权被推翻后，由于东土耳其斯坦和准噶尔境内的东干族和维吾尔族起义，到六十年代末，出现了几个独立的封建国家：维吾尔哲德莎尔汗国(首府在喀什噶尔)，东干苏丹国(首府在乌鲁木齐)和维吾尔塔兰钦汗国(首府在库尔扎——即伊宁——译注)。哲德莎尔汗国的统治者阿古柏一伯克同英国和土耳其两国的特使保持了密切的接触，这些特使也都竭力利用他来作为奉行敌视俄国政策的工具。为了防止阿古柏一伯克占领塔兰钦汗国和制止英国势力扩大到俄国在中亚细亚的领地，一八七一年，俄军占领了伊犁(库尔扎)地区。到一八七八年，左宗棠军血腥镇压了准噶尔和东土耳其斯坦的人民起义，开到伊犁地区边界。为了同沙皇政府谈判关于俄军撤离伊犁问题，特使崇厚被遣往彼得堡。一八七九年九月，崇厚在利瓦迪亚签署了关于把伊犁河谷西部一小块地方、特克斯河河谷和穆扎尔茨通道(Музартский проход)割让给俄国的条约；库尔扎城归还给了中国。受英国支持的中国统治集团拒绝批准利瓦迪亚条约；崇厚回到中国后就被捕判处死刑。利瓦迪亚条约未被批准，俄国政府也没有公布条约文本。英国报刊有倾向性地报道了这项条约，夸大了中国在该条约中拟定向俄国作出的领土让步。

清朝政府利用一八七七——一八七八年俄土战争后俄英关系的恶化，指望迫使沙皇政府从伊犁地区撤军；清朝政府加强了在伊犁边境附近准备对付人数不多的俄国军队的共有七万人的左宗棠

的部队。

受英国人唆使和受湖南绅士支持的左宗棠在湖南省动员了二十万人的军队“远征俄国”。伊犁的当地居民主要是受满洲中国封建主奴役的维吾尔塔兰钦人(耕种官地的农民)，他们由于害怕清军到来必遭一死，因而数以千计地逃往俄罗斯帝国境内。

尽管俄国政府采取了措施，示威式地加强自己在中亚细亚和远东的武装力量，派遣了以列索夫斯基海军上将为首的舰队前往远东，但是由于同土耳其战争之后国库耗尽，所以认为对华战争是极其不适宜的。清朝政府也很快意识到对俄战争的不利之处，因为这场战争必然会加强英国、法国、美国和其他大国在中国的地位，使它们更加干预清帝国的内政。满洲驻伦敦公使曾纪泽前往俄国进行新的谈判。一八八一年二月二十四日，俄中两国在彼得堡签署了新条约。根据新条约，在伊犁地区恢复了清帝国的主权，而俄国则保留了伊犁西部的不大一块地方，以便把土地分给由准噶尔和东土耳其斯坦逃出的维吾尔和东干难民，喀喇额尔齐斯河上游的边界也有某些更动。清朝政府应当向俄国偿付的临时占领伊犁地区费用的赔款数额由五百万卢布增加到九百万卢布。根据彼得堡条约和同时签订的贸易协定，俄国商人取得了在新疆进行贸易的一系列重大优惠。

本书第三编题为《清帝国变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和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开始》，这编的第三章中题为《一八九五——一八九八年外国资本在中国的扩张和列强的侵略政策》一节中说：

一八九五年十月，德国取得清政府的同意在汉口和天津建立德国租界。沙皇俄国从中国取得了在满洲建设中东铁路的权利并集中全部注意力于资助和组织这一建设。

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清政府被迫向俄国让步，“出租”一部分辽东半岛，连同大连和旅顺两市。

一八九八年七月，俄国从北京政府获得租让权建设中东铁路的南线，这条线使辽东半岛同干线连接起来。

本书第三编第四章《一八九八——一九〇一年华北义和团人民起义》中有一节为《中国同外国列强的战争》，这一节谈到沙俄的态度说：

沙皇俄国对所发生的事件（指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译者注）的政策，是由俄国在满洲的资本的利益所决定的，在这里正积极建设中东铁路。沙皇军队利用义和团起义占领了中国东北各省，想在这一地区取得更多的优势。在镇压了起义之后，俄国同清政府代表进行了单独的谈判，但是由于其他列强的严重抵制，谈判未能成功。

本书第三编第五章《清廷的“新政策”和革命组织的开始集聚（一九〇一——一九〇四年）》中有一节为《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其中谈到沙俄的态度说：

早在签订一九〇一年最后议定书之前，日俄矛盾就由于争夺对清帝国东北诸省的影响而大大加剧。由于八国借口镇压义和团进行的干涉，沙皇政府把自己的军队开进了这里。它希望以支持慈禧换取新的让步，并且保证自己在东北的优越地位。清廷则指望俄国的要求将会引起欧洲列强、美国和日本的反对，从而可使清廷对俄国的让步小到最低限度。

清廷和沙皇俄国谈判（在一九〇一年议定书签订之前就已开始）的结果，于一九〇二年四月签订了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ая конвенция о Маньчжурии）。俄国把在那里行使

行政权和治理权的权利交还清政府，并且议定分三期（共计一年半）撤退自己的军队。但是，在占领期间，关于驻满洲清军数量的问题要取决于沙皇政权。此外，清政府答应凡涉及南满铁路建设的问题都要同俄国进行协商。受到那些打算不仅在东北，而且在朝鲜开发资源的冒险集团敦促的俄国沙皇政府根本不想放弃自己的阵地。一九〇三年四月，在俄国军队第二期撤退前，中国外务部收到了一项照会，沙皇政府在照会中力图为撤军搞到一些新的"保证"。清廷必须允诺不把满洲的土地提供给其他国家使用，不委派其他国家的代表到这里的行政岗位上来。在沙皇驻北京代办随后给庆亲王（великий князь Цин）的一项秘密照会中声称，俄国的继续撤军将取决于清廷的让步。

沙皇政府要求的内容很快就被其他帝国主义强国的代表以及中国国内知道了。国内对清廷反民族政策不满的激浪，其他强国的正式抗议和警告，迫使清廷拒绝了沙皇新的要求。作为对此事的答复，沙皇政府在一九〇三年八月成立了以海军上将叶·伊·阿列克塞耶夫为首的远东总督管区（наместничество），并且委派他同清廷直接进行谈判。同时，除沙皇俄国外，帝国主义日本也积极活动，企图渗入华北和满洲。①

本书第四编题为《清王朝的被推翻和中华民国的建立》，这一编的第二章《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建立（一九一——一九一三年》中有一节为《辛亥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政策》，其中谈到沙俄的政策说：

沙俄并不希望北京的袁世凯政府加强，它甚至曾经打算同南方的共和政权建立尽可能友好的关系。沙皇政府采取这一立场的

① 下略关于日俄战争的简述。——译者注

原因是：在不属于俄国势力范围的地区发生内战对沙皇政府是有利的，因为它转移了清廷对满洲和蒙古的注意力，而俄国政府在满洲和蒙古得到了新的权利和特权。但是，沙俄由于不想同协约国——英国和法国的关系尖锐化，因而参加了这些国家旨在扼杀革命和支持袁世凯的所有集体行动。俄国驻北京公使科罗斯托维茨曾写道："对于我们来讲，不可能公开反对同我们友好的法国和英国的意图，因为一系列头等重要的问题把我们同这些国家联系在一起。"

本书第四编第二章中《革命时期的蒙古、西藏和新疆》一节中说：

随着科布多的陷落，整个外蒙古摆脱了满洲的统治。依附于沙俄的一些王侯和上层喇嘛取得了政权。

满清王朝在中国覆灭后，沙皇政府开始同北京政府就外蒙古问题进行谈判。谈判在一九一二年整整持续了一年没有成功。袁世凯拒绝承认蒙古脱离中国，不给蒙古内部自治。

日本政府利用俄中关系的尖锐化，于一九一二年一月要求俄国承认日本在内蒙古的特殊利益。按照一九一二年七月八日的俄日密约，内蒙古被宣布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俄国确信不可能同中国达成协议，于是它决定通过同外蒙古政府谈判来实现自己的计划。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三日在库伦签订了俄蒙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沙皇政府答应帮助蒙古捍卫其自治权，建立蒙古武装部队，不许中国军队进入。该协定的签署在中国激起了抗议浪潮。袁世凯开始准备派兵远征外蒙古。但是，沙皇政府于一九一三年夏天把一支部队开进科布多地区并迫使北京政权召回派往外蒙古边界的军队。袁世凯确信，对蒙古的军事行动必将导致同俄国的战争。同时他懂得了，为了彻底粉碎中国革命，

他必须要有包括俄国在内的大国的支持。

俄中谈判于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五日结束，签订了俄中宣言，重申并承认了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三日签订的俄蒙协定。自治的蒙古虽然其权利是很不平等的和从属于沙俄的，但它的成立归根到底使蒙古人民同当时作为国际革命运动先锋的俄国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联系。这促使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先进思想、各国人民友好和合作的先进思想渗入蒙古。取得自治权也是恢复蒙古的国家组织道路上的重要一步，这在客观上是蒙古人民历史上的一个进步现象。

（摘译自苏联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

第一个平等协定

——纪念苏中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签订四十九周年

阿列克谢耶夫

苏维埃国家从刚一建国起，就采取了同中国和所有其他国家建立平等关系的方针。苏维埃政府在外交活动上，从一开始就宣告以新的社会主义态度对待国际关系问题。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俄罗斯联邦政府在有名的致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书里，宣布放弃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并表示准备同中国就其他问题达成协议。在一九一九年的照会里，具体说明了苏维埃政府认为哪些俄中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照会强调说，俄国工农政府在十月革命后，立刻宣布废除同中国、日本和原协约国签订的一切有关中国的秘密条约。照会中提到，苏维埃政府建议中国政府举行谈判，以废除一八九六年条约、一九〇一年北京议定书和在一九〇七——一九一六年间同日本签订的一切协定。

照会声明准备放弃俄国的条约权利，这里指的是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俄国商人在中国的贸易站和特权，以及帝国主义国家在镇压义和团起义后强迫中国赔款的俄国享有部分。苏维埃俄罗斯准备放弃所有这一切条约权利，不管这些条约是同中国签订的，还是同第三国针对中国签订的。一九一九年照会的内容，在俄罗斯联邦政府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照

会里又得到了重申。由于那不敢违抗外国帝国主义者意志的北京当局的过错，直到一九二四年时，仍未同中国签订任何有关旧条约和其他问题的协定，而苏方宣布不平等条约失效的建议，当时也就悬在空中。直到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苏联和中华民国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才从法律上明确废除俄中不平等条约。这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一九二四年协定的意义也就在这里。协定规定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协定说明，苏联政府遵照自己的政策和一九一九年与一九二〇年的宣言，声明沙皇政府跟第三国签订的一切涉及到中国主权和利益的条约失效。这意味着废除一切有关俄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的条约。苏联政府放弃了沙皇俄国根据条约、协定等在中国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在中国任何地区的租界权。同时通过条约方式，重申放弃义和团赔款中的俄国享有部分，放弃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以及违背公平原则而制定的关税条约。沙皇俄国同中国在所有这一切问题上所签订的条约，都带有不平等性质。而一九二四年协定便正式宣布废除了它们。这样一来，不平等条约问题也就永远获得了解决，不会再影响两个伟大邻邦间的关系。中国公众在对那废除掉不平等条约的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协定作了高度评价。当时在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中央执委发表了声明，指出俄国从革命原则出发，放弃了原先那些损害中国主权的条约。因此，中国人民对俄国的公正友好态度表示感谢。声明强调说，帝俄列强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丧权辱国。而中俄协定却完全符合两国平等、互相尊重和主权原则。毛泽东也同意了这一看法。他在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上说，苏联首先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同中国签订了新的平等条约。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他又一次说道，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苏联政府首先废除了沙皇俄国时代针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近来中国领导人在对外政策上踏上了大国沙文主义、冒险主义和公开敌视苏联的道路，不肯再提这样的话。

他们企图捏造和歪曲明显的事实，谈论起俄国似乎根据不平等条约从中国侵占的领土。北京需要用这些毫无根据的说法在人为制造的所谓苏中领土问题上煽风点火，目的是给非法觊觎苏联领土打上历史基础。事实上，在苏联和中国之间根本就不存在着什么领土问题。苏中全部边界已有条约、议定书、说明、地图和其他现行条约文件加以规定。这些文件完全保存着法律上的效力，跟不平等条约毫无关系。

（莫斯科电台一九七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华语广播）

北京怎样伪造历史

尼古拉耶夫

关于苏联政府废除沙皇俄国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个历史问题，在苏联政府的正式文件中，在汉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的学术著作中，以及中国领导人在没有同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最后决裂期间所发表的意见中，都是阐述得非常清楚的。只是由于中国继续伪造俄中和苏中关系的历史事实，现在才又不得不回到这一早已弄清的问题上来。

这里指的是毛分子再三重复的俄中边界条约似乎是“不平等”的，以及俄国侵占了中国领土的问题。北京领导人以这种毫无根据的论点拼凑其对苏联领土的狂妄要求，力图在苏中边界问题上制造疑问，破坏边界条约的法律基础（详见《国际生活》一九七二年第二期，第十四——二十九页）。

一九七二年，北京的领土野心主要是披着地理的外衣，表现在对臭名昭著的《世界地图册》的解释上。而现在，这种野心披上了新的外衣，这一次是历史的外衣了。一九七三年一月北京出版的史军的小册子《读一点世界史》（《学点历史》丛书）的词语解释，是荒谬地蓄意歪曲俄国历史和俄中关系史的骇人听闻的大杂烩。北京的这个新作不过是老调重弹，是要在中国居民中激起对伟大邻国的仇恨，企图使中国的青少年忘记苏联人民在中国劳动人民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长期艰苦斗争中给予他们的高尚的援助。

毛分子现代史“研究”的核心是毫无根据地断言俄中边界条约

是“不平等”的。顺便提一下，这种说法不是毛分子本身的创造，这是从二十年代中国军阀手中接过来的衣钵。

早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北京当政的军阀集团提出侈求，要重新审定苏联国界，使之有利于中国。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索取自古以来就属于苏联的领土（包括滨海地区及黑龙江流域）的各种要求，就被形形色色的中国民族主义分子用作武器。

确定在许多代人生活中业已形成的两国边界走向的条约，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签订的。它是根据当时的国际法及缔约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它们的法律效能是无懈可击的。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从来没有受到怀疑。相反，大量事实说明，正是中国方面曾经坚决要求恪守条约附图上标明的“红色国界线”。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民族主义分子，为了给他们的领土野心提供根据，不惜伪造历史，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提出毫无根据的论断，好象苏联政府自己曾经宣布一切俄中条约（其中包括边界条约）都是不平等的，并已被一九一七——一九二〇年的文据所废除。由此得出结论说，两国间的边界应该“重新划定”。

事实究竟怎样，只要重温一下列宁的意见和在他直接领导下的苏联政府所制定的文件和采取的实际行动就容易弄清楚了。

列宁曾经痛斥欧洲资产阶级政府，包括俄国政府对中国的侵略掠夺政策。他特别尖锐地批评沙皇军队伙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参与镇压一九〇〇年义和团人民起义。列宁在一九〇〇年写道：“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早就对中国实行这种掠夺政策了，现在俄国专制政府也参加了进去。”（《列宁选集》第一卷，中文版，第二一四页）因此，正如列宁所指出，随着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沙皇参加了掠夺中国的政策。然而，确定中俄边界的条约文件是在比这早得多的时期内签订的。列宁和苏联政府从来没有认为这些文件是属于二十世纪初沙皇所推行的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北京的社

会沙文主义，为了使它的中俄边界条约“不平等”的说法貌似真实，竟断章取义地摘引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历史文献的某些论点。他们在为其边界野心寻找“理论根据”时，把列宁主义忘得一干二净。《读一点世界史》的词语解释，把列宁关于欧洲资产阶级早在俄国专制政府之前就推行掠夺政策的重要指示，篡改为歪曲历史的论断，好象沙皇俄国是“最先侵犯中国”的。

团结在共产党周围的苏维埃国家的人民，完成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永远结束了民族压迫政策。根据列宁的历史性的指示和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其他文件，废除了沙皇俄国同东方（其中包括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十月革命烽火中诞生的俄国工农政府的史无前例的、崇高的立场，应该得到世界各被压迫民族的深深感激。

根据列宁的和平法令，废除了旧制度的一切秘密条约。这些条约，很快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尼·格·马尔金小组所编制的著名的七本文件汇编中公布了。以后，又在其它出版物中刊登了沙皇外交部秘密档案中的文件。但是，在这些文件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份关于俄中边界的条约。和平法令废除的并非旧俄国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而只是那些标志着抢劫和暴力政策的秘密条约。列宁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我们拒绝一切关于抢劫和暴力的条款，但是我们乐于接受一切关于善邻关系和经济协定的条款，这种条款我们决不能拒绝。”（《列宁选集》第三卷，中文版，第三六〇页）

为了正确理解苏联政府对旧沙皇政府所签订的条约的立场，一九二四年四月二日根据外交人民委员格·瓦·齐切林的指示，致海牙国际调解协会（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посредниче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负责人的信是值得注意的。该协会在一九二四年七月公报中发表的这封信强调说：和平法令曾经“宣布旧政府签订的、‘对地主资本家有利的’秘密条约无效……废除沙皇旧制度和临时政

府期间签订的一切条约，永不生效”。齐切林在信中继续解释说，除了和平法令所废除的那些条约以外，关于所有其它条约的命运问题，“应视具体情况个别解决”，要根据已经变化的情况，“每个国家每个条约分别解决”。（海牙《国际调解协会公报》一九二四年第七期，第一五四——一五五页）

苏联政府对俄国同中国签订的条约的态度，在众所周知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对中国人民及中国南北方政府的宣言中，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外交委员会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的照会中早已明确。一九一九年宣言具体指明了苏联政府认为不平等的俄中条约。宣言强调指出，俄国工农政府在十月革命之后立即宣布取消一切同中国、日本和原协约国阵营各盟国间的秘密条约。宣言向中国政府提出“就废除一八九六年条约、一九〇一年北京议定书和一九〇七至一九一六年与日本签订的一切协定进行谈判”的建议。（《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二卷，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二二一——二二三页）声明放弃俄国根据条约享有的权力（这里指的是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放弃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放弃俄商在华的商业代理店及特权，以及帝国主义国家镇压义和团起义后强迫中国接受的庚子赔款。苏维埃俄国准备放弃全部这类条约，不论它是同中国签订的或者是同第三国就中国问题所签订的。

一九一九年宣言指出：“苏联政府放弃沙皇政府从中国满洲和其他地区夺取的领土。让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民自己来决定，他们愿住在哪个国家的国境内，愿在自己的家园建立什么样的政体”。这里讲的不仅是中东铁路占用地带，还有整个满洲，甚至包括根据一八九六年条约和一九〇七——一九一六年日俄条约划归沙皇俄国势力范围的外蒙和内蒙的大片土地。

一九一九年宣言根本就没有哪项是同中俄边界问题或是确定

这些边界走向的俄中条约文件有关的。自然，在这个宣言中，也就谈不上什么边界条约属于不平等条约之列和废除这些条约的问题了。

无论是年轻的苏维埃国家在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对外政策的主要文件，还是一九一九年宣言和苏联政府以后的法令，都没有哪一条可以被解释为承认了十九世纪中叶俄中领土分界是不平等的。根据列宁所发展的关于民族自决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苏联政府在十月革命之后很快就把这一原则作为对边界问题的态度的基础。列宁说过："国界是根据居民的意志确定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四卷，第二二六页)中亚各族人民运用自己的民族自决权，建立了自己的共和国，作为一个组成部分，参加苏维埃共和国统一的大家庭。其它与中国接壤地区(滨海地区和黑龙江流域)的居民(很早以来，他们中间大部分就是俄罗斯人)，同俄国其它人民一道，实现了民族自决，创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

一九一九年宣言发表前后，苏联政府，顺便提一下，还有中国政府，完全是以俄中边界条约文件作为解释两国边界走向的根据的。众所周知，在苏联政府和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远东劳动人民和苏维埃国家的全体人民，曾以何等的毅力同远东的外国干涉作斗争，反对日本、美国及其它强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驻兵。(《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一卷，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二二四——二二六页)远东劳动人民在一九一八年八月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对滨海地区的干涉是"最粗暴、最令人愤懑的践踏和侵犯俄国人民主权的行为"。他们声明："远东是伟大的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社会主义祖国的领土寸土不让"。(《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一卷，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四五六——四五七页)

在成立远东共和国时，在它的一九二〇年四月非常代表大会

上宣告："从贝加尔湖到太平洋，包括后贝加尔斯克、阿穆尔州、滨海地区、萨哈林、堪察加地区"，以及包括"中东铁路占用地带"(《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二卷，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四四四页)都是远东自治共和国。根据这一事实，当时的中国当局同意和远东共和国调整关系，接待了远东共和国派往北京的代表，并派自己的代表到维尔赫涅乌金斯克（今乌兰乌德），以后又派代表到赤塔。

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远东共和国非常会议对中国人民及政府的宣言强调了同中国的边界条约的不可动摇性。宣言中说："中国和俄国有绵延数千俄里的共同边界。现在，远东共和国从俄国那里承继了这辽阔的共同边界的很大一部分"。(《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四卷，第二十页。《国际生活》一九七二年第六期，第十四——二十九页）苏维埃俄国和远东共和国在二十年代同中国当局就边界状况及白匪部队利用中国领土作为基地等问题交换了几十份文件，双方都是以中俄条约规定的乌苏里江、黑龙江和萨雷库尔干山的边界走向为依据的。

由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解放，列宁在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致远东共和国政府的电报中说："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占领海参崴，使备受日本帝国主义沉重压迫的俄国公民同俄罗斯的劳动群众结合起来了。谨向俄国全体劳动者及英勇的红军祝贺这一新的胜利，并请远东共和国政府向解放了的各省及海参崴市的全体工人和农民转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的祝贺。"(《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三四四页）列宁在他最后一次演说——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在莫斯科苏维埃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海参崴的收复向我们大家表明(要知道海参崴距离我们虽远，毕竟是咱们的城市)，我们是众望所归，大家希望我们胜利。这里和那里都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

会主义共和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三九五页)

这仅仅是很少的一点历史事实，但却雄辩地说明，无论是俄罗斯劳动人民，还是以列宁为首的苏联政府，都从来没有把废除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建议扩大到中俄边界条约上，也未曾把将沙皇从中国夺来的土地还给中国人民这点引伸为放弃根据条约被认为属于俄国人民的若干州。

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照会重申了一九一九年宣言的原则。照会强调指出，外交人民委员部“将不懈地维护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的宣言中所阐明的原则，并以此作为中俄友好协议之基础。”(«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三卷，第二一四页)这样便重申了准备放弃苏联政府在一九一九年宣言中所表明准备放弃的那些条约和俄国对中国领土的那些权力。

但是，目前中国领导人却极力歪曲一九二〇年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一九六九年十月八日的所谓“文件”断言，说一九二〇年照会不是重申了一九一九年宣言的原则，而是把这些原则“发展”为废除过去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放弃已由这些条约确认属于俄国的领土。(见一九六九年十月九日«人民日报»)当时，一九二〇年照会是以下面这段话开始的：“一年多以前，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发表了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方政府的宣言，俄罗斯政府在宣言中放弃旧沙皇同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归还沙皇政府及俄国资产阶级用暴力从中国人民手中夺取的一切，建议中国政府为建立友好关系而参加正式谈判。”于是，“一切条约”和“夺取的一切”等词就在一九二〇年照会中出现了。但是，从上面引的那段话看得非常清楚，照会中讲的并不是什么“发展”(“развитие”)，而仅仅是复述(пересказ)了一九一九

年文件的内容。因此，这里所讲的是在一九一九年宣言中提到的那些不平等条约和侵占的领土。

虽然一九二〇年的照会仅仅重申了一九一九年宣言的原则，但是这两个文件是有区别的。第一个是阐明苏维埃政府对华关系的原则性纲领，第二个则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及关于对华关系原则一般性条约的草案。在草案中，正如一九二〇年照会本身第一段那样，又一次提到了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无可争议的是，这里指的只是那些对中国不平等的条约，即苏维埃政府在一九一九年宣言中声明的，以及一九二〇年照会第一段重申准备放弃的那些条约。

建议签订废除某些不平等条约的协定，在法律上完全不等于单方面放弃这些条约。一九二〇年没有同中国签订任何有关旧条约及其它问题的协定，责任决不是在苏联方面。那时，苏联关于宣布不平等条约无效的建议悬而未决。以一九二〇年的照会为口实，把它作为苏维埃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证据，是毫无根据的。

不仅在建议废除不平等条约方面，而且在苏维埃政府建议放弃由于义和团起义对俄国的赔款这样一个明显的问题方面，情况也是如此。苏联驻华代表机构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在解释问题的法律方面时指出，苏维埃政府一九一九年宣言及一九二〇年的照会实际指的是放弃庚子赔款。但仅仅是中国政府知道照会的内容这一事实，不足以使它得以摆脱一九〇一年议定书所加于它的法定义务。苏维埃政府的照会，一方面阐明了对全部俄中问题的观点，另一方面则建议在此基础上签订协定。但遗憾的是，中国政府对这些照会并未给予应有的答复。众所周知，直到现在中苏之间也没有签署任何协定。中国政府知道，照会的内容这一点，并未赋予它任何权力来根据其文本确定自己的行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即当苏维埃声明的原则已被有国际意义的、双方订立的文

件正式确定下来时，中国政府才享有根据这些原则而取得的权力。（«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六卷，第五三八页）

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的苏联和中华民国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把废除俄国对中国不平等条约在法律上肯定下来了。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这正是一九二四年协定的意义所在。

一九二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副外交人民委员致中国在苏联的代办的照会中说："苏联政府早在一九一九年就主动地在对中国人民的宣言中声明废除中国同沙皇俄国之间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在一九二四年的协定中，苏联政府实现了自己的声明。"（«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十二卷，第三八三——三八四页）

一九二四年协定第四条（«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七卷，第三三一——三三五页）规定，苏联政府根据其政策及一九一九年与一九二〇年的宣言声明，凡沙皇政府和第三国所订立的有损中国主权及利益的条约，一概无效。就是说，废除有关俄国在中国（即在满洲、外蒙和内蒙）的势力范围的一切条约。协定第五条承认了中国在外蒙的主权，并以此停止了与该条款相抵触的沙皇俄国的条约的效力。（中苏协定签订不久，蒙古就推翻了神权统治制度，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根据协定第九条，苏联政府同意除纯属商务营业性质的问题外，有关中东铁路的事务均移交中国当局。这说明正式废除了关于在中东铁路占用地带取消中国主权的一切条约。根据协定第十至十三条，苏联政府放弃使沙皇俄国在中国享有专门权利及特权的各种专约、条约和协定，放弃在中国的一切租界和庚子赔款的俄国份额，放弃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放弃违背"平等互惠原则"的关税税率。

在上述这些问题上，沙皇俄国同中国签订的条约的各项条款是带有不平等性质的。所有这些都是一九二四年协定正式规定要

废除的。因此，不平等条约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不会再给两个伟大邻国关系带来阴影。

中国的公众高度评价结束不平等条约的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协定。当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孙中山曾公开发表声明，指出俄国放弃它过去在中国的特权和侵犯中国主权的条约，是以俄国革命的原则为准则的，并指出中国人民对俄国的公正与友谊表示深切的感谢。

即使毛泽东也是赞同这个观点的。他在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说："苏联是第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国家。"（《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一〇三四页）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他再次重复说："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第一个废除了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北京对什么保持沉默》，莫斯科通讯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第十页）北京在对外政策方面走上大国沙文主义和冒险主义，公开反苏之后，对这种承认竟然闭口不谈。但是，事实是逃避不了的。

除了不平等条约、中国承担的不平等义务以外，在俄中条约系统中还包括涉及某些技术问题的协定。例如，互通电报的计算办法（这个问题已由一八九六年七月十八（三十一）日在北京签订的关于修订一八九二年八月十三（二十五）日电报专约第九条的中俄两国政府补充声明加以说明）。（见《远东问题条约及外交文件汇编（一八九五——一九〇五年）》，圣彼得堡一九〇六年，第一八一——一八二页）

这类技术协定是在考虑两国利益的基础上制定的，具有互利性质。但它们是在十月革命甚至中国一九一一年革命之前签订的，对两国关系新阶段来说是远不相适应的，应该重新审定并代之以新的协定。一九二四年协定第二、三条规定召开苏中会议废除过去的条约，并在"平等、互惠、公正和一九一九年及一九二〇年苏联政府宣言精神的基础上"订立新的条约，其所指的正是这一类协定。

中国的军阀集团对同苏联接近不感兴趣，对召开这个会议抱拖延态度。开始在北京谈判并不是如协定第二条规定的那样，在协定签字以后一个月内进行的，而是在一年多以后，即一九二五年八月底才进行。谈判继续到一九二六年六月，直到中国方面建议中止为止。

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关于签订新的领事馆协定、贸易条约、引渡罪犯协定、民事司法协助条约以及遗产协定等问题。没有一个问题最后达成了协议（见卡皮查：《苏中关系》，莫斯科，一九五八年，第一五四——一五五页）。正如外交人民委员部一九二五及一九二六年关于国际状况及苏联对外政策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鉴于当时中国政府的主要注意力放在由国内战争和在首都没有一个稳定的政府而引起的国内问题上，因此在上述几年内，特别是在北京会议上，未能解决任何一个能确定苏中两国正常关系的政治性问题。（《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九卷，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六三四——六七四页）

这样，一九二四年协定第三条关于缔结新条约的规定未能实现，但责任绝不在苏联政府方面。需要再说一遍的是，该条款规定在苏中会议上废除的旧条约，不是指的不平等条约，因为苏联政府放弃根据俄中不平等条约而得的权利一事，已由一九二四年协定本身解决了。

还应注意另外一个事实：一九二四年协定第三条不包括边界条约文件，因为边界问题已由协定中单独的条款第七条专门加以说明。该条款说："两缔约国政府同意在本协定所定会议中将彼此疆界重新制定，在疆界未行制定之前，允仍维持现有疆界。"如果双方有意在行将举行的会议上同时废除不平等条约和一九二四年协定第三条指出的其它条约，那么在协定中单列第七条说明边界问题就是没有意义的了。由于专有一项阐述边界问题，双方就不会产生把边界条约和第三条中所提出的条约混为一谈的意念，对

这一点不应该有丝毫的怀疑。

缔约双方在三个性质不同的问题上的分歧是很清楚的：不平等条约是一九二四年协定本身所废除的；其它两国的条约应在行将举行的苏中会议上解决；两国的边界应维持现行条约文件所确定的现状，虽然考虑到要在苏中会议上"重新核定"("вновь проверить")边界。

在邻国相互关系中，核定(Проверка)边界完全是正常的事。特别是苏中边界是在一九二四年协定以前的几十年形成的，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就地制定边界的。核定或保留条约内说明边界走向的标记，绝不意味着以此修改边界条约。这种意图在签订一九二四年协定时是不会也不可能有的。

但是，目前中国领导人却企图歪曲、捏造事实，上面提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一九六九年十月八日的文件中断言，根据一九二四年协定，双方商定"重新划定"("вновь определить")边界。上述"文件"的作者声称："如果真象现在苏联政府所说的那样，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都是平等条约，不存在任何问题，还有什么必要重新划定疆界呢？"(一九六九年十月九日《人民日报》)问题恰恰是这样，一九二四年协定商定的不是"重新划定"("вновь определить")边界，而是"重新核定"("вновь проверить")，在协定中谈到的就是这个。

北京领导人之所以要毫无根据地议论似乎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掠夺了领土，是为了就人为制造的所谓"苏中领土问题"燃起狂热情绪，并为其对苏联领土的觊觎提供"历史根据"。

实际上苏中之间不存在任何领土问题。全部苏中边界都是由条约、议定书、记文、地图和其他有效的条约文件确定的。这些文件具有充分的法律效能，同不平等条约风马牛不相及。

(译自苏联《国际生活》1973年第4期)

研究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七〇年苏中关系的新步骤

科瓦廖夫

苏联政府一向重视苏中两国关系。这一立场不仅表达了苏维埃国家希望同这个有着几千公里共同边界的国家建立睦邻关系的自然愿望，而且也表明理解如弗·伊·列宁所预见的中国在世界革命中的作用和地位。他写道："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大多数的人口，最近几年来也非常迅速地卷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来，世界斗争问题的最终解决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在这个意义上讲来，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四百五十三——四百五十四页）苏联历史科学过去和现在主要从这一立场出发来研究苏中关系（见斯卡契柯夫：《中国书目》。莫斯科·一九六〇年，第二〇四——二一一页；尼基甫洛夫：《苏联历史家论中国问题》。莫斯科，一九七〇年，第三四九——三五〇页）。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以苏中友好与合作为特征的苏中关系新阶段。

谈到现代的中国历史编写工作，其特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内部对内对外政策上的路线之争，其中一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主义路线，另一方是小资产阶级、大国沙文主义路线。在中共领导中的国际主义力量顶住了民族主义力量的压力和采取加强同苏联的国家关系和同苏共的党的关系的方针时，中国历史编写工作总

的说来是在加强中国和中共同苏联和苏共的友谊与合作的标志下发展的。(例如,参见彭明:«中苏友好史»。北京,一九五五年中文版。本书中文第二版的俄译本是:彭明:«中苏友好史»。莫斯科,一九五九年)但是,随着小资产阶级分子、民族主义分子将清醒的对外对内政策方针的拥护者排挤出中国党的领导机构,以及毛分子在领导机构中阵地加强之后,中国历史编写工作就越来越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并以敌视科学共产主义的"毛泽东思想"取代这些原则。现代中国历史编写工作以这种"思想"为指南,歪曲过去和现在的苏中关系。

资产阶级历史编写工作也竭力利用一切可乘之机来破坏苏中关系,首先是通过挑拨性地迎合中共和中国毛派领导的民族主义、反苏主义情绪的办法。资产阶级(主要是美国)历史编写工作的这一主要方针,在国外的"苏联通"和中国通的许多著作中,尤其是一九六四年至一九七〇年发表的著作中暴露了出来。(参看例如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著作«俄国同中国的战争»。一九六九年纽约出版。索尔兹伯里向中国领导人保证,美国不会同苏联结成反对中国的联盟。他无耻地公然声称,许多美国人认为"俄中两国之间的冲突"甚至它们之间的"战争""对美国有好处……,这只能削弱两个对手和加强美国"(第二〇一页)。索尔兹伯里突出中国领导人的反苏路线并且以调解的目的打掩护,他要求美国当局积极干预苏中关系(第二〇五页)。索尔兹伯里认为这种干预"对美国来说是无可比拟的"难得的"机会",客观上是为了支持和鼓动毛分子的反苏方针,是为了加剧中国同苏联的关系。)

苏联历史学家和政论家不止一次地给予毛分子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编写工作以应有的回击。(参见«列宁的对华政策»文集(一九六八年莫斯科版),本书阐明苏中关系(一九一七——一九六七年)的最重要方面;卡皮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十年,两种政

策»，一九六九年莫斯科版；克鲁契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苏联对华的列宁主义政策的基础»，载«列宁和现代中国问题»文集。一九七一年莫斯科版）既然由于中国领导人的过错，苏中关系越来越紧张，并且使西方反动集团掩饰不住地感到满意的是毛分子继续诽谤苏联的对外政策，那末，苏联汉学家们就面临着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仔细分析战后苏中关系，并给予诬蔑苏联对外政策的毛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以有凭有据的答复。

鲍里索夫和科洛斯科夫叙述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七〇年苏中关系史的专题学术作品就是这样的尝试。（鲍里索夫、科洛斯科夫：«一九四五至一九七〇年的苏中关系»。"思想"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全书共四百七十六页。印行二万七千册。定价一卢布七十一戈比。本书是一九七一年很快售罄的那一版的重印本。作者对新版作了若干修订补充。）这部作品确认，苏中关系的发展并不象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出版的某些作者的作品所描写的那样是简单而道路笔直的事情。这是反映两条路线——苏共加强我们两党、两国人民和两国友好与合作的始终不渝的路线以及同其对立的中国民族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力量的路线——之间斗争的复杂进程（第八页至第九页）。鲍里索夫和科洛斯科夫强调指出，与此同时，苏中关系史同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和革命斗争史是"分不开的，苏联对这一斗争的援助和支持是这一斗争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第三页）。因而作者认为自己的任务在于，"在总结已有材料的基础上仔细研究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七〇年苏中关系的发展情况，说明苏共给予中国革命力量以国际主义援助和支持的基本方针，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所采取的政策的真正列宁主义性质，以及这一政策完全符合苏中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情况"（第九页）。

读一下这一专题学术作品就会相信，作者完成了所提出的任务。创造性地运用列宁关于中国的基本论点有助于作到这一点。

这些论点证实，早在苏维埃国家建立的初期弗·伊·列宁就认为发展和加强苏中关系具有巨大的意义。不引用苏共、苏联政府大量的文件，不对中国方面的大量材料加以批判性分析，作者就不能顺利地完成任务。这一专题学术作品引用大量的文件，这使它具有客观的科研性质、可靠性和说服力。

作者在追溯战后二十五年内苏中关系发展情况时，划分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五年、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〇年这样几个时期。作者对其中的每个时期都同影响苏中关系的主要因素密切结合起来加以研究，即密切结合中国的国内外总的情况和中共领导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路线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加以研究。

鲍里索夫和科洛斯科夫分析作为苏中关系以后发展的重要前提的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时期，并且考虑到这几年的苏联的历史编写工作"非常片面，而有时甚至不真实"（第十一页）。他们强调指出，这几年的苏中关系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的胜利所决定的，而苏联对取得这一胜利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作者引用关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力量估计过高而对其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希望"推动革命"、坚持在没有应有的准备和装备的情况下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强行进攻这一事实，作为片面理解这一历史因素的后果和片面理解另一情况（即在这一时期苏中关系由于受到中共领导中的民族主义的和有反苏情绪的力量的压力而复杂化了）的例子。毛泽东在上述时期无视阶级态度将苏联和美国混为一谈，他说什么，如果中国无论同苏联、还是同美国都没有外交关系，那就更好，这一事实也证明他从"左"倾机会主义跳到右倾机会主义（第四十二页）。应当把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毛派领导尚未掌握国家政权时所发生的这些情况当

作形成毛泽东集团反苏路线的重要起因阶段。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二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同它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签订了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根据这一条约苏联帮助中国人民恢复被日本占领者、国民党及其大洋彼岸同盟者的长期统治所破坏的经济，支持人民中国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作者引用了有说服力的事实来证明这一点。例如，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〇年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苏联大量的航空兵兵团对华东工业中心上海和东北工业区进行空中掩护（第五十四页）。这一事实和苏联在经济、国防、以及科学和文化方面给予中国人民兄弟般援助的其他行动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可靠地保证了中国的安全，巩固了它的人民民主政权，为中国逐渐转向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条件。

这本书说，中共领导人、中国的国家和党的机构曾强调中国同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和合作的意义，作者分析了反映中国方面当时态度的大量文件和资料。一九五三年二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次会议上发言时在提出的三项主要历史性任务中指出必须"向苏联学习"（第六十四页）。在一九五四年秋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写着，"我国同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各人民民主国家已经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第六十六页）。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一九五六年九月）通过的《总纲》号召努力"发展和巩固我国同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友谊……"，以"国际主义精神"教育自己的党员和人民，而中共中央向代表作的政治报告中宣布必须同"大国沙文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危险倾向的一切表现"进行斗争（第八十页）。

书中指出，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强调指出，党的活动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南，严格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实际上改变

了一九四五年前一次代表大会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党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的决议，这“同毛泽东的政治概念截然相反因而对他的独裁造成了实际威胁”(第八十二页)。作者总结说，正因为如此，在代表大会之后中共两条路线的斗争激化了，毛分子为了修正八大决议，以“毛泽东思想”代替党的理论原则和组织原则，向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力量发起了进攻。所有这些都影响到中国对苏联的政策。

鲍里索夫和科洛斯科夫写道：“一九六〇年是苏中关系发展中的转折点。它标志着新时期（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五年——科瓦廖夫)的开始，在这个时期，把民族主义方针强加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力量在中共领导中占了优势。实行这一方针导致了中国对外政策方针的根本改变，导致了中国共产党背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导致了北京首领断绝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和合作关系，展开公开反对这些国家的政治斗争”（第一百九十二页)。这篇专题学术作品作出了正确的结论：民族主义方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部发展过程是分不开的。由于毛分子“大跃进”和强制性的“人民公社”政策所造成的严重错误，引起了国民经济情况的普遍恶化和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降低，削弱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阵地，从而使反社会主义势力为所欲为。

毛分子在困难面前屈服了，将社会主义建设无限期地推迟，实质上采取了不相信社会主义在中国胜利的托洛茨基立场。作者指出，毛派宣传硬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并且在世界主要地区是相当强大的”，要谈建设共产主义那就是一句“蠢话”(第二百页)。毛分子的国内政策虽遭到失败，但是并不放弃这种政策，而是通过奉行冒险主义的对外政策的途径寻找实现这一政策的新的可能性。中国领导人虚伪地宣布同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而实际上加紧努力同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排除美国）搞好

关系。同时这样做时损害到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合作的发展，指望“以战争‘推动’世界革命，使苏美两国卷入两败俱伤的战争，然后在其废墟上创造”以中国为首的“新的光辉灿烂的文明”……(同上页)。作者说，破坏和平共处政策和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的方针、背离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实行的一致同意的路线的方针(这种背离在一九六二年秋天加勒比海危机期间表现得尤其明显，当时中共首领认为不需要采取支持古巴的积极措施是符合那种大国主义、霸权主义的目的(第二百零二页)。

一九六三年秋天，毛派领导突然转向公开反对苏共和苏联。一九六三年九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借口答复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公开信发表了一系列反苏文章。鲍里索夫和科洛斯科夫写道，这些“答复”文章“引人注意的不仅是对苏联的病态性的仇视。在这些文章中毛分子表现为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疯狂敌人，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公开宣战”(第二百八十三页)。苏中边界的紧张局势也加剧了。由于中国方面的过错，两国的贸易联系缩减到最低程度。在国际方面，毛分子拒绝了苏联提出的关于采取联合行动援助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建议。这篇专题学术作品中引用以下事实说明了这一问题。在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尼·柯西金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在赴越南民主共和国途中一次在北京停留时，中国领导人拒绝了苏联以下的建议：越南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表联合声明揭露美国破坏保障越南民主共和国独立并规定所有外国军队撤出印度支那的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第三百三十七页)。

作者指出，一九六六年下半年，中共毛派领导在国内外政策方面公开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这个时期的开始恰恰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举行的中共中央第十一次全会通过在中国进行“文化革

命”决议的时候。“加强对苏共和苏联的斗争成了北京首领在‘文化革命’中进行活动的极其重要的方针之一”（第三百六十二页）。帝国主义集团千方百计地怂恿北京的反苏政策。华盛顿说，美国希望毛泽东继续当政（第四百零六页）。书中多处揭露毛分子在苏中边界制造的事件的挑衅性质。他们打着对苏联提出领土要求的旗号。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周恩来说，“中苏之间边界战争的爆发早于同美国的战争”（第四百一十六页）。在中国灌输反苏心理的做法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一九六九年四月）被推崇为中国官方政策。

从同苏联友好合作到对它进行武装挑衅，这就是毛派领导对苏政策的变化。作者反问道：“民族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倾向在中国领导中占上风并且左右目前的国内政局，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的呢？”（第一百零四页）他们在回答这一问题时阐述了中共领导内所以产生反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观点的客观上和主观上的社会因素和历史因素，并且得出结论，“现今中共领导公然转到反苏主义立场不是突然的和偶然的”（第四百七十页）。旧中国是一个小农占优势的极端落后的国家。弗·伊·列宁写道：“一个国家愈是落后，这个国家的小农业生产、宗法制度和闭塞性就愈加厉害，而且这种情况必然使最深刻的小资产阶级偏见，即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狭隘性特别顽固有力。”（《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一卷，第一百三十一页）。鲍里索夫和科洛斯科夫指出，早在人民革命胜利之前，中共内就进行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主义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第一条路线的拥护者的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世界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结成联盟、同苏共和苏联友好合作。第二条路线的拥护者以假马克思主义词藻和中国革命的特殊特点作掩护，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针，实质上是使中共脱离世界工人运动和共

产主义运动，离开苏共和苏联，成为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和民族主义的传导者。在人民革命胜利后，毛分子通过“文化革命”夺得了党和国家的权力，他们积极推行自己的霸权主义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反苏方针，他们早就站在这种方针的立场上，但是以前没有实际实行这一方针的可能性”（第四百七十页）。作者明确阐明的产生中共和中国现今领导反苏方针的主要客观和主观上的社会和历史条件就是如此。

鲍里索夫和科洛斯科夫的专题学术作品使读者得出一系列非常重要的结论。至于谈到苏联对华、对外政策的战后方针，可以有充分理由地说，它经受住了时间的检查。这一方针的理论基础过去是，现在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伟大原则。苏共本着这些原则，过去以同各国人民友好与合作、对他们争取民族独立和公正社会制度的斗争给予兄弟援助和支持的精神教育苏联人，现在还继续这样作。作者令人信服地指出，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是苏联对华政策的基础。对中国革命胜利结局有影响的不仅是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而且还有国际社会主义力量对革命的积极援助和支持。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不同意书中得出的结论：“中国革命清楚地证明，在当代，任何一个国家里，尤其是无产阶级比较薄弱、党首先必须依靠广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的国家里，革命运动是否取得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运动是否得到已经胜利的社会主义方面的援助和支持，取决于社会主义在国际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取决于它在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中所占的地位。没有这种支持，革命的顺利发展和转向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可能的”（第十页）。

毛派的历史编写工作同资产阶级作者们的反苏言论沆瀣一气，千方百计地贬低和闭口不谈苏联对粉碎希特勒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的决定性贡献，以及这一事实对战后中国的斗争结局的巨

大影响。毛派宣传“忘记了”中国领导人(其中包括毛泽东)曾经多次地对苏联在从日本占领者手中解放中国东北的作用所给予的高度评价,几乎把事情说成是这样,好象不是苏军,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肃清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并且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努力才对全中国战后革命运动的胜利结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本书的作者们没有忽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用,他们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这样一个论点:红军解放中国的东北,是使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获得解放的首要因素。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部队依靠苏联的援助和支持,才有可能把几乎五分之一的国土变成为扩大中国革命的疆域、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获得胜利和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基地。在随后的年代中,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和支持,为在中国奠定社会主义基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书中对战后苏中关系的分析,对主张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性质的人和伪造苏联对华政策的人是个打击。在现代的资产阶级书籍中常常碰到这样一种说法,既然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是苏联“输出”给中国的,那么,它对于这个国家来说,就是“异己的”思想,而毛泽东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则作为对这种“异己性”的反动而出现了。例如,被开除出法国共产党队伍的罗·加罗迪断言说,中国在六十年代的发展证明,它摆脱了“进口的”、“外国式的社会主义”,并走上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认为“文化革命”是一种“爆炸”,其目的就是要“破坏外国式的……政权的诱惑力”,包括“苏联式”的政权的诱惑力。他接着说,因此,不能谴责“文化革命”,因为它尽管是“艰苦的、然而却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的阶段”(罗·加罗迪在他的《社会主义的伟大转折》(一九六九年巴黎版)一书中发挥了这些观点。加罗迪在谈到“外国式”和“进口式”的那一部分中并不是什么独创,他不过是在宣传毛泽东的右倾修正主义思想。早在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毛泽东

就已号召为争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生存权利、为反对“外国式”、主张“中国式”而斗争)。加罗迪在为社会主义的多种形式的必要性和合法性进行辩护,称颂“中国式”,即毛派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概念时,他不仅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性质和世界革命过程的客观规律性,而且还诽谤苏联,说什么好象后者把“苏联式”“强加给”中国。

对苏中关系的客观分析驳倒了这种诽谤性言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苏联根据中国领导人的请求,为了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帮助了中国人民夺取人民革命胜利的斗争,而在胜利之后,又帮助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基础。这种态度同把“苏联式”“强加给”中国人民毫无共同之处。因为,象中国战后发展的客观过程以及中国共产党自己在多年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经验这样一些因素,开辟了这个国家在考虑到它的民族特点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革新的合乎规律的前景。加罗迪没有考虑中国在抛弃了殖民地奴役枷锁以后为它开辟的社会主义前景的客观性质。在加罗迪看来,这种前景只不过是“强加给”中国人民的“苏联式”。他并不掩饰自己对“中国式”的反苏方针的同情,他认为,“中国式”好象已经在一九六六——一九六九年的“文化革命”过程中受到了全民的拥护。但是,鲍里索夫和科洛斯科夫的专题学术作品表明,“文化革命”并不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自由的意志表现。提出“破坏外国式的……诱惑力”这个目标的并不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而是在党内和国家内占统治地位的毛泽东大国主义—民族主义集团。这个集团很善于从思想上腐蚀居民中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并鼓动他们去破坏中国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但是,红卫兵和造反派也象毛派上层领导一样,仍然代表不了全中国,代表不了整个中国共产党。苏联人民决不会把现今中国领导人的言论和行动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各族人民的真正利益混为一谈。

最近一个时期，在中国领导人的对外政策导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孤立以后，毛分子不得不作了某种改变，对他们的令人反感的对外政策理论重新进行美化和更加巧妙的伪装。前不久对于要同资产阶级西方进行接触的微小暗示，还被虔诚的毛分子看成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可恶的”背叛。而现在，毛分子从加速提高军事工业潜力以便实现中国的世界霸权的纯粹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正在同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同美国调整经济和政治关系，并在联合国内加紧进行活动。至于谈到北京对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对苏联的态度，则仍然未变。象过去一样，极恶的反苏主义和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作斗争，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北京把苏联、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看作是妨碍建立中国的大国沙文主义霸权的主要障碍，它正在不择手段地企图破坏苏联、苏共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威信，分裂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利用联合国的讲坛来达到这一目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权利是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下得到恢复的；不断地攻击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旨在缓和南亚和东南亚的国际紧张局势、旨在加强欧洲及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建议，也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宣传挑衅性的、丧失阶级立场的“两个超级大国”概念、把苏维埃国家同美国相提并论、故意破坏苏共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和社会主义思想对发展中国家和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影响，还是为了这个目的。

在进步人类为了和平共处原则的胜利、为了消除制造不信任和怀疑气氛的侵略势力、消除新的局部性冲突和世界性冲突而进行斗争的情况下，毛分子的行动给社会主义、民主与和平的事业带来巨大的危害。北京领导人的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得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反动政权的支持和鼓励决不是偶然的。正如美国共产党总书

记葛斯·霍尔在美国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说的，美国统治集团欢迎“毛式的独立，因为这种‘独立’实际上是敌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对帝国主义国家持温和的态度的”。他们赞同“现今毛分子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诽谤攻击……赞同毛分子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制造分裂和分歧的政策……赞同毛分子支持全世界的所有分裂主义集团的政策”(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日《真理报》)。

列·伊·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向党的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作的总结报告中说：“我们坚决摒弃北京所散布的并向中国人民灌输的对我们党和国家政策的诽谤性捏造。在帝国主义者加紧对爱好自由的人民发动侵略行动的形势下，在中国和苏联之间制造纠纷尤为荒谬而有害。形势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切反帝力量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并采取联合行动，而不需要在象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国家之间煽动敌对情绪。……同时，我们党和苏联政府深信，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的改善将符合我们两国根本的长远的利益，将符合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自由和巩固和平的利益。因此，我们不仅愿意全力促进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的正常化，而且愿意全力促进两国睦邻关系和友谊的恢复，并且表示相信，这一点终将会实现。”(《苏共二十四大文件集》。一九七一年莫斯科版，第十一——十二页)

鲍里索夫和科洛斯科夫的书写得很了解情况，书中的评价有令人信服的论据和深刻的党性，书中不仅揭穿了毛分子和资产阶级的历史编写工作中的谎言和诽谤，而且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尽管存在着毛派领导所设置的障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基础上使苏中关系正常化的客观要求，必将导致中国同苏联友好与合作的思想的胜利。

(译自《历史问题》1972年第11期)

为北京的大国主义阴谋效劳的假历史

阿斯塔菲耶夫、纳罗奇尼茨基

由于“文化革命”，由于不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工作，把他们送去进行“再教育”和以“修正主义”和不重视“毛泽东思想”的罪名为借口加以消灭，在社会科学领域内沉默了很长一个时期，在这长时期的沉默之后，中共中央理论杂志《红旗》发表了署名史军的一系列关于研究世界史的文章〔《读一点世界史》(《红旗》杂志一九七二年第四期)；《再谈读一点世界史》(《红旗》杂志一九七二年第五期)；《读一点有关帝国主义的历史》(《红旗》杂志一九七二年第六期)；《了解一些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红旗》杂志一九七二年第十一期)〕。

这些文章侈望揭示世界历史进程的普遍规律，因而实质上是具有政治方针性质的。文章的目的是从意识形态上为北京领导的大国主义战略方针找根据，反映在国内外推行这一方针的策略上最近发生的变化。《红旗》杂志上登出这类文章不是偶然的。

打着“文化革命”的旗号来摧毁党和国家机关，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中间过去和现在都有不少反对毛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方针的人。党的干部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力图使中国回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不愿服从中国领导现今的政治方针。毛分子借助于红卫兵和军队暂时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然而伴随着“文化革命”而来的对政敌的无情镇压，各级党组织的垮台，国内军事专政制度的确立，制造表现形式空前的远远超过对清朝皇帝迷信的个人迷信，

这些不能不激起进一步的反抗。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一九七一年的“九月事件”，当时中国最高政治机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某些成员——毛泽东的所谓“合法继承人”（一九七〇年宪法确定）国防部长林彪和党的“主要理论家”陈伯达起来反对官方的路线。众所周知，他们已被赶下了政治舞台。

毛分子政策令人生厌的特点、“文化革命”的怪异方式和把“文化革命”移到国际舞台上的企图，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孤立逐渐加重了。

苏共代表大会上、苏联政府的声明中、外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活动家的文章和演说中、苏联和其他进步学者的著作中对毛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实质的揭露，正在帮助世界各国人民理解中国领导政策的反列宁主义的、沙文主义实质。这项政策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以狂热的反苏主义形式出现的反社会主义。列·伊·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联合举行的纪念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五十周年的庆祝大会上强调指出，中国领导人“采取反苏方针，而实际上是反对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方针”已经有十多年了，“他们把这个大家庭继续看成是他们实现大国主义意图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中国首领对策略进行修改，同时继续推行其反对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以及瓦解其各支队伍的原先的大国主义战略方针，重又试图使当代民族解放运动与社会主义力量隔绝而服从自己的霸权主义目的。

在印度半岛上，中国领导人在对待孟加拉人民的解放斗争方面扮演了可耻的角色。他们反对独立的孟加拉国的成立，反对接纳孟加拉国加入联合国，而现在又企图妨碍印度、巴基斯坦和独立的孟加拉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中国现领导人力图孤立印

度，他们认为印度是他们在亚洲确立大国霸权地位的严重障碍之一。

中国领导人拒绝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于采取联合行动援助越南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建议，已有多年。中国首领阻挠近东问题的政治解决，偷偷地怂恿那些反对消除以色列侵略后果的人。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同南非和葡萄牙这两个极端反动的种族主义政权的代表联合起来了。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侵略愿望，使中国领导人实际上拒绝同帝国主义作斗争，而同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反动的势力建立合作。他们把苏联改善对华关系的建议抛在一边，却去为帝国主义效劳，而损害本国人民的民族利益。

中国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反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把欧洲变成和平大陆。北京首领谴责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苏联和波兰缔结的关于战后边界不可更动的条约，谴责西柏林地位正常化和欧洲安全会议的筹备工作。他们声援英国和其他国家反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反动势力。在远东，中国领导支持日本某些没有远见的政界人士对苏联提出没有根据的领土要求。

中国毛分子领导的政治方针，目的是挑起武装冲突，反对通过谈判解决两国之间的争端，这一方针正在助长火箭核军备的竞赛，阻挠采取那怕是局部的裁军措施和禁止核试验。中国首领远非爱好和平的意图在不久前的联合国大会上公开表现了出来，当时中国代表不同意关于禁止热核武器试验的决议。

在中国国内，中国领导人的政策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使数亿人民遭受闻所未闻的贫穷和苦难。由于军备竞赛，由于军备竞赛占用了相当大一部分国民收入，也由于“大跃进”式的经济冒险行动，居民极端穷困，甚至是赤贫的状况人为地固定下来了。中国领导人为了使人民对其冒险主义政策的后果不引起注意和愤怒，就中国面临着什么“来自北方的危险”一事在国内制造一场虚惊，

对苏联提出荒诞的领土要求。

显然，之所以需要这类诽谤，是为了让中国人民无法看清这样一个事实：正是苏共和苏联政府的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政策，保证了苏联劳动人民福利和文化的空前提高，而与此同时，北京领导人当前的政治路线却阻碍着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进步。

恰恰是"文化革命"时期建立的专制制度的动摇不定和中国领导人的政策在国际舞台上遭到越来越明显的失败，才促使他们在内外政策中采用新的策略。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和这次大会"选出"的中央的第二次全会，制订了实行原先的大国沙文主义方针的新方法。其实质是更进一步加强反苏，在这基础上调整同一系列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试图同其中的某些国家接近，以反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其他国家。中共领导特别寄希望于扩大对亚非年轻国家、对拉丁美洲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上，以便削弱它们同苏联和欧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

这条政治路线意味着北京领导完全背离了对外政策中的阶级立场，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原则。正如列·伊·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中所说，"实质上，现在决定中国领导人对任何一个重大国际问题的态度的唯一标准，就是力图给苏联造成尽可能大的损害，侵害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

最近，中国统治者的当务之急是站在假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从意识形态上"论证"他们所奉行的沙文主义方针。中共现领导人需要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制造中国领导人的政策是有根据的这种表象，而且是为了把这一方针捧成某种新的理论"成就"，以完全脱离列宁著作涵义和实质地引用的，有时用加以直接歪曲的列宁著作中的语录来证实这种方针。由于客观历史进程显然是同中国领导反动的反苏方针相抵触的，北京宣传家接到一项任务，要伪造整个世界发展

史，制订出从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和反苏主义立场出发编造的世界历史进程的某种公式。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中国领导人才决定采用研究世界史（不过，当然是在假科学的基础上）这种手段。史军的文章就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文章试图为北京领导的大国主义政策提供虚假的历史论据。同时，《红旗》杂志建议编写和大量发行通俗历史读物，根据中国领导人目前的立场来阐述世界史和各国的发展情况。可以不必怀疑，这种出于宣传目的的书籍很快将会到处充斥。

中国领导人当前的政策，是以违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方式来歪曲社会主义原则，当然，要为这种根据找到科学根据完全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跟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矛盾的。正因为如此，上述文章中进行了大量的伪造，提出用喋喋不休的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议论作掩护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科学的论点。

这下子在上述文章中却又不象以前那样企图开门见山地断言"毛思想"是什么纠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不正确论点的社会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了。文章甚至指出必须学习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不过是照一个特定的书目，总共包括四、五本书。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奠基人的重要指示，文章怎么对中国领导人有利就怎么解释。卡·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在历史中的作用的论点在史军的文章中首先被歪曲地用来为搞掉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共干部，为周期性地实践托洛茨基"清理"，即杀戮干部的论点辩解，其目的是把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反对北京领导大国主义反苏方针的人和主张同苏联友好的人驱逐出党。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研究历史是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要反映历史。这个论点实际上已被北京宣传家们归结为利用历史来为中国的"特殊方针"和普及"毛思想"找根据。

史军的文章指出，研究世界史之所以有意义，仅仅是因为这似乎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也就是说，实际上是为毛分子的大国主义方针进行辩解，而这种方针以可疑的“对人类作出大贡献”的愿望为掩护（«红旗»杂志第五期，第二十四页。苏刊的俄译引语与原文不符，照俄文译出——译注）。毛泽东的著作，特别是他的«新民主主义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奠基人的著作一起，被宣布为“学习近现代史的理论指南”（«红旗»杂志第五期，第十九页）。“毛思想”被毫不客气地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相提并论，而这一经验似乎是毛泽东总结的（«红旗»杂志第四期，第二十页）。而恰恰是为了掌握他的“理论”，必须研究这一运动的历史（当然，是根据毛分子的解释）。

看来，为了恢复中国领导人政治方针的名誉，考虑到国际革命运动对迫使其各个队伍接受“中国经验”的做法的不良反应，史军的文章中已经不谈“亚洲的”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革命经验”的特殊意义了。现在不是直截了当地宣传“中国的革命道路”了，而是迂迴曲折地、加以伪装地迫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接受毛泽东的思想领导。

这种把历史看作是用来为任何随心所欲的政治行动辩护的手段的实用主义态度，还反映为企图以下述论点为北京领导人政策中的无数反复和失败找到根据，这种论点是：“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在曲折的斗争中前进，这是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世界上从来没有一种革命在取得胜利后就可以万事大吉”（«红旗»杂志第五期，第二十三页）。为了证明这一点，史军列出了同众所周知的事实相矛盾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时间表：英国五十年，法国八十年，美国甚至长达一百年。

史军所解释的历史，其任务是为中国领导的大国野心找根据，是吹捧毛泽东及其“思想”。但是与以前的策略不同，现在是在分

析随心所欲地编造的历史规律的掩饰下这样做的。

史军十分粗浅地转述了弗·伊·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学说的原理，随后就武断地肯定，毛泽东似乎“捍卫和发展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作为“论据”，他引用了毛泽东为了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直至发动世界热核战争而提出的宣传性的论点，即：“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红旗»杂志第六期，第三十三页)

老实说，史军关于毛泽东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似乎作出了贡献的“结论”不过就是这些。然而，文章对列宁学说的歪曲和伪造却没有不到之处。同以往一样，把帝国主义(同从弗·伊·列宁著作中引用的帝国主义是垄断、腐朽和垂死的资本主义这段语录相反)讲得十分狭隘，仅仅说成是侵略和掠夺政策。“掠夺是帝国主义的本性”(«红旗»杂志第六期，第三十四页)，史军这样写却忽视了自己下的论断：殖民主义掠夺早在帝国主义时代之前很久就存在了。对帝国主义历史的具体分析仅限于强调指出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划分势力范围的协定是不牢靠的、帝国主义战争是一种解决矛盾的方法。归根到底可以看出，北京伪造家们之所以需要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是为了替反对苏联这一反革命思想“找根据”。于是就明目张胆地伪造列宁关于机会主义的根源和实质的学说。为了诽谤苏联和破坏世界革命进程三种极其重要力量——社会主义大家庭、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联盟，北京宣传家们诽谤性地运用列宁关于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是社会帝国主义的论断来称苏联(«红旗»杂志第六期，第三十九页)。

在北京关于世界近现代史的公式中，分析事件的阶级立场被民族主义和大国主义的立场所代替了。在«红旗»杂志新炮制出来的世界历史“观念”中，只字不提工人阶级在世界史上的使命和现代史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作用。史军的文章无视当代的基

本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没有提到苏联和欧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史上伟大的进步使命。实质上，把近现代史上世界历史进程的基本内容仅仅归结为民族解放运动，仅仅归结为这样一点：扩大到“中小国家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干涉、颠覆、掠夺的斗争”(《红旗》杂志一九七二年第五期，第十九页)的殖民地被压迫民族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是人类发展的动力。尽管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意义重大，但这样提出问题会偏离当代的根本矛盾——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为了掩盖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倾向，这种片面论断是同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实质、人民群众作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等个别论点交杂在一起的。但是在下面的叙述中又根据北京关于“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在反对“两个超级大国”，而首先是反对苏联方面的作用的论点，说什么人民群众的决定性作用只有在“毛思想”的基础上对他们加以领导才能实现，以此来偷换马克思列宁的正确论断。

经过北京编造的世界史和世界革命运动的经验显得极为贫乏，进行整理和伪造是为北京统治者的政治目的服务。

史军文章实际上忽视了近现代史之间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在历史舞台上的出现而产生的原则区别。史军在指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的同时，不是把这个时期看成是世界史中的特殊时期，即现代史时期，而只是把它看成是“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走向灭亡的过程……社会主义诞生、发展和走向胜利的过程”(《红旗》杂志一九七二年第五期，第十八页)的近代史的第三个时期。

北京宣传家对世界史各时期的划分采取特殊态度不是偶然的。在这种态度的背后所隐藏的是不仅力图贬低苏联的作用，而且根本无视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在世界舞台上的进步意义。在上述图表中，社会主义这支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其中

包括对中国起着越来越大的决定性影响的强大力量被忽视了，消失了。更有甚者，苏联完全被歪曲成沙皇帝国主义的继承者，似乎它以“社会帝国主义”这种特定方式继续奉行沙皇俄国的侵略和殖民政策。抹煞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的伎俩，也是为了直接把沙皇帝国主义同毛分子臆造出来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串在虚构的对各国人民，其中包括对加入了苏联的各族人民进行殖民压迫和奴役这条线中。实质上，史军文章中有关苏联的论述，与西方最反动的帝国主义“苏联通”的拙劣作品如出一辙。北京编造的世界史的新公式，恰恰就是又一场反苏、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把戏，其目的是破坏各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信任，给我国各族人民伟大友谊和苏联在世界上起的进步作用抹黑。

北京“理论家”企图把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连同苏联一起赶下历史舞台。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被说成是什么受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奴役的，而且一定会起来同苏联斗争。显然，在这一方面，北京宣传家的声音也是同帝国主义国家中最凶恶地反对社会主义的人的声音相呼应的。目前北京“理论家们”打着世界史“新公式”的幌子宣传的正是这些反革命妄想。

毫无疑问，北京宣传者的这一“公式”和关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骗人说法，只是为了掩盖毛分子反苏主义的侵略实质和站不住脚。

史军根据没有任何证明的关于沙皇俄国的目标是称霸世界的说法，不顾历史事实地硬说什么沙皇俄国“侵占了大片中国领土”。史军在引用弗·伊·列宁揭露沙皇在中国的行动的语录时，直接歪曲了列宁对这个问题的说法（«红旗»杂志一九七二年第十一期，第六十九页）。弗·伊·列宁在一九〇〇年写的«中国的战争»一文中指出：“欧洲资本家的贪婪的魔掌现在已经伸向中国了。

俄国政府恐怕是最先伸出魔掌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四卷，第三百三十五页）史军按其所需改编了这段话，于是在他的文章中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沙皇俄国向中国“最先伸出了魔掌”（史军把引号中的话冒充为列宁著作中确切的引语——原作者注）。而弗·伊·列宁在提到鸦片战争时则强调指出，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在对中国进行殖民主义掠夺方面表现出了主动性。弗·伊·列宁在«中国的战争»一文中还写道：“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早就对中国实行这种掠夺政策了，现在俄国专制政府也加了进去。”（«列宁全集»中文版，第四卷，第三百三十五页）这样，北京宣传家就公然歪曲了列宁关于俄国对中国的政策的思想，把根本对立的论断强加给了弗·伊·列宁。

史军在评论沙俄的帝国主义政策时，只字不提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德国、日本和美国把俄国禁锢在其陆疆内，不让它自由出入海洋的计划，把俄国力争保障自己的安全航线的做法说成扩张。

总之，俄国在一九一七年前的整个世界史中，错误地被写成是一个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侵略势力，而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掠夺政策却被减轻了，被置于次要地位，尽管就置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压迫下的领土大小和人口多少来说，这些大国的殖民侵略要比沙皇俄国的掠夺大许多倍。在这方面，北京的历史伪造者也加入了西方的反苏宣传家和俄国历史伪造者的大合唱。

史军把侵略计划硬按到俄国头上，是为了一个十分明确的政治目的：指责苏联似乎也有一个殖民主义计划。（«红旗»杂志一九七二年第十一期，第七十一页）在这里，进行历史伪造也是为了一个明确的政治任务：诋毁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诋毁其各族人民间的友谊与合作的国际主义原则，抵消世界上第一个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联盟存在并顺利发展五十年的经验对各民族间关系起

的巨大影响，而这个联盟是唯一正确地解决民族问题和建立各族人民间新型的、兄弟般的社会主义关系的典范。

史军文章的伪造性质还表现在文章用人为设计的帝国主义与“社会帝国主义”(或“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和“超级大国”与其他国家(包括从社会主义国家到资本主义国家，甚至连最反动的国家在内)之间的矛盾这样一个公式来代替当代的主要阶级矛盾，即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北京诽谤者把苏联的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对外政策与美帝国主义的政策同等看待，把苏联说成正在为统治世界而斗争的“两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之一是徒劳的。他们试图宣传所谓苏美勾结称霸世界的捏造并且使中小国家起来反对苏联的爱好和平的政策。

史军文章对世界近现代史具体事件的分析，实际上是从属于这样一种用意的：试图证明用政治上合北京领导人心意的观点，即“超级大国”失败、其他各国反帝和反“社会帝国主义”斗争获胜的观点解决上述各种矛盾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作者强加于人的人为制造的当代世界矛盾的民族主义公式的内在原因，就在于“证明”中国领导人为了争夺世界霸权，不仅有必要利用广大劳动阶层，而且有必要利用中间阶层，甚至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种族主义政权和其他反动政权。

北京的宣传家们不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反帝斗争中占主要地位，而让“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在反帝斗争中占主要地位，似乎后者肩负着这一斗争的主要重担。为了证明这一点而又缺乏事实，于是就只有引用毛泽东所说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定将给整个旧世界以决定性的摧毁性的打击”这类言论(《红旗》杂志第十一期，第七十三页)。

当然，民族解放运动在反帝斗争中过去和现在都起巨大作用。这在过去就没有人提出异议，现在也没有谁想提出异议。共产党

人一贯认为这一运动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最重要后备力量之一，是工人阶级在解放斗争中的同盟军。但是同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里从来也没有把民族解放运动看成是一股独立存在的力量，更没有看成是能够摧毁“旧”世界即资本主义世界的唯一的革命力量。

史军把民族解放运动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混为一谈，接着又把民族解放运动变成了世界反帝革命的基础。史军只字未提苏联人民在战胜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中的作用，未提苏联对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解放斗争的巨大援助。他只是写道，“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接着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亚非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掌握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红旗»杂志第十一期，第七十页)

可见，«红旗»杂志的文章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内容所作的说明是错误的。错误地把它的内容说成是各被压迫民族实现北京的政治路线。不顾历史的真实情况，把苏联说成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敌人。还提出了不反对“苏联新殖民主义”，民族解放运动就不能取得彻底胜利这种荒谬的思想(«红旗»杂志第十一期，第七十一页)。

北京领导人为了完全控制民族解放运动，试图采取一切方法丑化苏联给予发展中的国家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把苏联的这种政策说得同美帝国主义的行径没有任何差别。

为此就再次“完善了”中国领导人为欺骗世界各国人民而提出的“中间地带论”。据他们最近解释说，有“两个中间地带”：亚非拉国家是第一中间地带，“西方和东方的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是第二中间地带。毛派宣传家们说，“两霸”——美国和苏联在这里为“称霸世界”而进行争夺。同时，中国首领们试图把世界上的各种力量，甚至是对立的力量团结起来置于其霸权之下，为此提出了

建立反苏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口号。北京宣传家们还企图使人相信，“中间地带”国家，即亚非拉国家不仅应该相互支持，而且能够同“第二中间地带”，即同除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这一切都是在首先反对苏联这个北京领导人奉行大国主义政策的主要障碍的名义下提出来的。宣扬“两个超级大国”只是一个幌子，其背后是现代中国首领的反苏主义。

北京的假历史学家的意图并不局限于反社会主义、反苏主义的目的。在他们的文章里，完全放弃用阶级的观点对待全部世界史，民族主义的中国中心主义以及从种族主义观点出发使东方各国人民同西方各国人民相对抗的做法是非常显眼的。由他们提出来的“近代史”时期的世界发展公式得出的是这样的结论：西方国家对于世界文明和世界进步好象没有作出任何贡献，这些国家向来只是侵略与压迫的体现者；与此同时，东方国家在它们受西方奴役之前几千年以来一直是高度文明的发达国家。在这里却完全不提这些国家国内反动势力和侵略势力在它们历史上起的作用。

我们丝毫不想否定东方国家对世界文明作出的巨大贡献。但是我们不能不指出的是，否定西方各国人民起的进步作用只能被看作是北京宣传家企图用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夸大东西方各国人民之间的矛盾，用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原则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激起各国人民之间的仇恨和敌视、通过这种情绪来达到沙文主义霸权主义的目的。贬低西方国家和人民在世界文明史上的作用也同贬低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在过去和现在世界革命斗争中的作用有关。

如果说北京伪造历史的人们还不得不承认十九世纪西方无产阶级斗争的某些进步作用的话，那么他们认为，在二十世纪，从十五世纪以来就“掀起一次又一次的革命风暴，向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发起猛烈进攻”的亚非拉人民是唯一的革命力量。（«红旗»杂志

第五期，第二十二页——二十三页）

在北京这家刊物的概念里，当代最伟大的运动——各国人民争取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及其最高阶段——共产主义的斗争完全被抹煞了。史军的拙劣作品完全忽视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历史成果。

看来，唆使在《红旗》杂志上写文章的人们由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取得进步而恼羞成怒，坐立不安。他们感到不满的是，苏联的政策在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制止热核战争的威胁和加强全世界和世界局部地区、特别是欧洲的安全的斗争中一再取得成就。使他们感到恼火的是各社会主义国家、各民族民主政党、解放运动和民主团体的代表都承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五十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然而，对当代世界发展提出的假科学的公式无助于北京宣传家欺骗世界人民。《红旗》杂志发表显然站不住脚的有关世界史的论断，只是更清楚地向全世界表明北京现领导人立场的真正大国沙文主义实质。他们在政治上无论怎样进行主观主义的歪曲，也不能改变历史的客观进程。苏联和中国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决定了两国人民之间必须保持和平与友谊。苏联人愿意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一个繁荣的社会主义大国，并同它一道为争取和平和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这什么时候才会实现，取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当然，任何东西也不会使苏联背离有原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背离坚定地捍卫苏联人民的国家利益和苏联领土不可侵犯的事业，背离坚决反对中国领导在社会主义世界和解放运动中的分裂主义活动的斗争。

（译自苏联《近代史和现代史》1973年第1期）

毛分子的世界史概念和东方各国人民的真实历史

别列柳勃斯基

当代的中国抱着各种目的三番五次地宣布必须了解整个人类的历史。还在一九五三年，中国科学院的前领导人之一刘大年就指出过中国在整个历史科学方面的落后现象。但是，这方面的工作实际上是从上面受到妨碍的。例如，在一九五六年，中世纪国际关系问题专家向达就因为建议扩大科学研究的问题范围而被宣布为"右派分子"。一九五八年三月，著名的历史学家翦伯赞提出了"在最近的时间里以集体的力量建设中国史、亚非史和世界史的高等学校教材"的建议，而主要的史学杂志《历史研究》编辑部在转载《人民日报》这些讨论资料时却未(发表)他的发言。这证明了史学界领导对这一思想的否定态度。在一九六三年，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宣称："我们不能满足于使用外国学者们写的世界史。我们必须对沾染了现代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史学家对世界史的歪曲给予认真的客观的批判"。然而就连这样一个以完全正统的毛分子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愿望，三年后也被斥责为"在西方面前卑躬屈节"。不论是刘大年，还是翦伯赞、周扬，都步向达之后尘。在"文化革命"时期由于各种原因从科学和政治生活中消失了。长期以来，任何关于研究世界史的议论在中国都是很危险的事情。

仔细研究毛泽东的观点体系便很清楚，上述情况不是偶然的。

还在一九三〇年五月，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就写道："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在这里，他第一次提出将知识划分为"有益的"和"无益的"原则，"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泽东还更尖锐地表达了自己对理论的态度："强迫刚刚十七、八岁的青年去背《资本论》和《反杜林论》。这就导致了许多学生对中国生活的问题毫无兴趣，他们不重视党的指示"。在以后的年代里，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强调了对理论的"书本"知识的否定态度。他在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宣称："知识分子有尾巴，应该在那上面泼一桶冷水"。过了一年，在成都会议上他又重复了自己惯用的思想："我们许多同志在教授面前胆怯……不害怕帝国主义者，而害怕教授，怪事！"二十年来，在中国不仅中学而且高等学校都开不出系统的通史课程，没有搞出标准的教科书。就是这样贯彻着经过深思熟虑的有意识地降低民族文化水平的方针。

一九七二年春天，中国又发出了学习世界史的号召。北京领导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一九七二年四月至六月发表了三篇文章，文章的构思表明，毛分子已把整个历史从"无用的知识"转列入"有用的知识"。这几篇文章都用史军署名，这个名字显然就是"历史的大军"的意思。中央各报转载了这几篇文章，新华社也播发了这几篇文章，它们已被列为政治教材。在这里（不署真名等于代表官方）"文化革命"期间许多批判文章都曾不止一次地署了矫揉造作的化名：如史反修（反修的史学战士）、史红兵（红色史学兵）等等。这一次的笔名的选择又意味着什么呢？他象征着依袭故技呢？还是掩盖着新的思想上的曲折手法？

对外政策的接连失败和国内不稳定促使北京领导在保持原来的战略目的的同时，在国际舞台上奉行看风转舵的政策，于是《红旗》杂志编辑部谈起世界史的经验来了。而要实现这个方针，就要求比一味地重复"革命战争"、"世界革命统一战线"、"世界农村进攻世界城市"之类的口号具备更广泛的理论根据。史军的文章为研究世界史和为毛主义的对外政策理论提供了什么新鲜玩艺呢？

《红旗》杂志编辑部坚持毛主义特有的对一切知识的狭隘的实用主义态度。因此在史军的共达十五页的文章中，谈古代和中世纪史的不到一页："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场大革命，因此总是充满着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和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在人类历史上每个伟大的转折时代都是如此。西方奴隶制度崩溃的过程中，古罗马帝国的奴隶起义此伏彼起，外族进攻连绵不断，内战和外战交织在一起。世界封建制度崩溃的过程中，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风暴席卷了欧洲和美洲大陆，频繁的内战和国际战争、复辟和反复辟、帝制和共和，前后经过了近二百年的大动荡。"（第四期，第十七页）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红旗》杂志中阶级斗争的理论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分阶段发展的理论，无视社会从一种形态过渡到另一种形态的进步性质。史军避而不谈资产阶级在近代史时期中非常革命的作用，不谈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指出的作为资本主义上升和衰落的物质基础的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意义，并非偶然。在这里，阶级斗争被认为是超历史的、永恒的规律。而且还经常把阶级斗争同民族斗争混为一谈。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生存斗争不可避免的学说——的变种。

尽管史军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命运非常操心，但在这里没有用激昂慷慨的修词来谈这几个地方。关于十五世纪前这三大洲的历史，我们只能看到泛泛地提了两句："世界历史告诉我们，

亚洲和非洲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亚、非、拉都有各自的灿烂的古代文明，对人类进步有过伟大的贡献。”(第四期，第十八页)的确，离开分析亚、非、拉各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就谈不上任何反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但是，如果不正确理解欧洲进步力量，首先是无产阶级反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作用，进行这样的斗争也是不可能的。《红旗》杂志对三大洲现实的文明史漠不关心，真使人吃惊。这一体系暗示的民族主义的言外之意在于：史军在这些地区既没有发现十五世纪以前阶级斗争规律的作用(甚至没有象毛分子通常做的那样为农民战争进行辩护)，也没有发现历史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的作用(他认为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因此，在评述头两个阶级的社会经济形态时，目前的“第三世界”地区未被提及。史军没有把社会的规律性运用到它们的历史上去。可见，在史军的体系中设想存在着两个世界：由于阶级斗争、革命、战争而四分五裂的西方和安静地“对人类进步作出伟大的贡献”的东方。

史军指出，终于开始了转变：“从十五世纪末以来，由于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亚、非、拉广大地区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共同遭受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残酷剥削和奴役。”(第四期，第十八页)这种论点并不新鲜：还在一九六一年，中国历史学家周谷城就重复了国民党历史文献惯用的概念，他写道：“十五世纪前亚洲人民，也就是黄种人在世界历史中占主导地位，十五世纪之后主导地位逐渐被欧洲人，也就是白种人所代替。”后来周谷城的文章在中国被认为是否定阶级斗争的作用而遭到猛烈的攻击。但是他的种族主义意见的错误没有受到批评。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阶级批评被“亚洲中心主义”代替了，而这种“亚洲中心主义”已经从那位非党老学者个人的言论变成官方的思想纲领。在史军的文章中，虽然没有提到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肤色，但是保留了主要的论点：

东方的落后是由西方的殖民主义者造成的。可是，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军事成就是受生产力更高水平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关系在欧洲的早熟决定的。殖民主义的扩张并非一次完成的。它延续了四百年，因为它遭到了亚洲和非洲各国人民的英勇反抗。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侵略者的优势才确定下来，因为他们当时有可能利用工业革命的成就了。

在东方国家中，清朝、卡扎尔王朝、莫卧儿王朝、奥斯曼王朝及其他王朝，依靠集权的国家机构阻碍了社会发展，推行早期封建社会和封建社会以前的社会联系形式，通过掠夺性的战争耗尽了各国人民的力量，破坏了生产力，压制了社会思想。绝大多数的亚非国家的封建统治者未能理解时代的历史任务和保持本国的独立性。他们出卖了本国人民，难怪多数的亚洲王朝都以沦为外国资本的傀儡而寿终正寝。

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已经比较晚了。它在“鸦片战争”时期所表现出来的社会经济的落后性特别明显地证明，关于殖民主义国家入侵前西方和东方发展平衡的观念只是一种幻觉。尽管从民族主义者的角度吹牛说“鸦片战争”证明“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武器”，事实却完全相反。清朝实行的孤立政策，使人民在侵略者面前解除了武装。孤立政策首先使统治集团陷于盲目。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把荷兰、葡萄牙、法国、丹麦和英国同暹罗和朝鲜一样，都列为中国的朝贡国。所以官员们把英国的侵略看成是“蛮夷的暴动”。清帝国的高级官员非常不了解自己的敌人。举两个例子：湖南巡抚牛鉴参观了英国轮船，对于带动轮子转的不是公牛而是机器感到惊讶；两广总督林则徐在给英王维多利亚的信中说：“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一日不可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呢羽哔叽，非得中国丝斤，不能成织。”对敌人的完全无知加速了中国的失败。一八四〇年夏天，积累了一

个半世纪的孤立政策的后果表现出来了。四千名侵略军不能征服一个庞大的国家。英国人奉行的是寄希望于进行威胁恫吓和占领中国沿海战略基地的冒险主义计划。由于防御者极端虚弱，英国人的想法实现了。至多不过装有十二门炮的中国小帆船根本无法跟装有七十四门炮的英国军舰相比。防御者海岸工事的武器无论在射速方面，射程方面或者是命中率方面，都同英国武器差得很远。作战指挥部束手无策。

优秀的中国人清醒地估价使民族蒙受深深屈辱的侵犯的后果。孙逸仙写道："中国的闭关自守和他的傲慢自大是有长期的历史的……尽管孤立的状况已在六、七十年前就被打破，中国人的观点却没有改变，并且依旧象一个被抛在无人荒岛上的人的观点一样。"鲁迅也谴责过"中国中心主义"，据说："中国的民族精神是不平凡的和好的"。然则他为何落到这般田地？据说："保持民族精神是难的。只有禁止同外国的海上联系，方能保存民族精神"。但如果说在禁止海上联系之前，民族精神统治着国家，那为什么当时的史册上如此多地说到人民的灾难呢？过了几年，鲁迅写了散文诗《万里长城》，"我们的民族因这打了新的补丁的古老的墙而与世隔绝。什么时候才不在你上面打补丁啊，伟大的可诅咒的城墙！"甚至在那些命中注定要被作者本人付之一炬的郭沫若的文学作品中也能看到这样一些呼声："我们将以雷暴之声呼喊，我们以喷发的火山毁灭那腐朽和过时的一切"。而史军却成为一切"腐朽和过时了的事物"的激烈的保卫者，反对中国人民了解自己的灾难。而且他们还想给"万里长城"打上新的补丁。

《红旗》对殖民主义前的历史（甚至不仅是中国，而且是整个三大洲的历史）作无保留的正面评价，这仿佛是个"新"现象。但是这个现象并不出人意外，因为史军的结论来自：十多年来在理论上美化许多帝王征服者、在实践中复活中世纪某些政治活动方法（试

比较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放弃用中国的民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彻底批判封建社会的传统，这种作法早在“文化革命”的发起人之一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中已开其端，而在史军的文章中终于确立下来。

美化从前独立时期的历史，必然导致对资本主义入侵的客观后果作出错误评价。建立世界经济、破坏闭关自守的原始公社制度和封建制度的历史进步进程是通过暴力的形式发生的。整个整个的民族为此作了牺牲。这个进程大大加剧了西方和被奴役的亚、非、拉国家的发展不平衡，使三大洲人民的民族财富以及人力资源变成欧洲和北美资本原始积累的源泉之一。资产阶级在这些地区实行特别野蛮强烈的超经济压迫方式——奴隶剥削。它勾结最反动的社会势力，力图使被征服国家永远处于落后状态，压低那里的劳动力价格，保证能够进行非等价交换和直接掠夺。比如，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和满洲的封建主在殖民主义者支持下实行长期的、死硬而保守的反民族政策，这成了决定中国人民革命斗争长期性和苦难深重的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资本家阶级为了获得最大利润不由自主地为消灭殖民主义创造了客观前提。弗·伊·列宁写道：“帝国主义最主要的特性之一，正在于它加速最落后的国家里的资本主义发展，从而扩大和加剧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这是事实。由此必然得出结论：帝国主义往往要产生民族战争。”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在经济方面形成了殖民主义的结构，在某些国家里还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结构和国内市场，出现了新的生产力等等；在国家方面实行了集权制，这种制度总的来说消灭了属地上的分崩离析状态；在社会方面，形成了新的社会阶级和阶层，出现了能够领导小生产者解放运动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知识分子；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发出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广大人民群众参加了

有组织的民族解放运动。

«红旗»杂志的文章用完全否定的态度来看待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建立同它以前的各种社会制度相比所取得的成果。然而，资本主义曾为某些国家向无产阶级社会过渡准备了客观条件。只有建立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许多从前落后的民族才有可能越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向社会主义过渡。

为自己古老的文明而自豪，希望恢复被侵略破坏了的历史继承性、憎恨殖民主义者，这些亚、非、拉革命者的特点是有其充分理由的。但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爱国者虽有赤诚的革命精神，却往往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红旗»杂志企图利用这一点进行投机，可是如果对社会发展道路没有科学的理解，没有对殖民地以前的历史，对资本主义扩张的社会后果，以及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客观前提和今后发展前景的清醒评价，这种赤诚的革命精神是不会奏效的。为了回答俄国民粹派指责马克思主义者企图"让每个农夫到工厂的锅炉里去受煎熬"，弗·伊·列宁指出，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革命者的真正勇气在于："受大资本的支配……把零星的无意义的骚动变成全体劳动大众求解放的有组织的斗争，这一斗争从这个大资本主义存在条件的本身中吸取力量，因而绝对有希望获得可靠的成功。"把西方同东方对立起来而不去分析它们经常不断的无数次的接触、冲突和互相丰富的情况，这无非就是制造一种老牌的反动的泛亚细亚主义，外加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分子提出的、已经改头换面的"无产者民族"和"资产者民族"的论点特殊的混合物。

«红旗»杂志三篇文章专门讲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但在描绘这一发展的规律性的时候，«红旗»杂志表现出如此非阶级的和非历史的态度：认为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建立和近代史开始之后，历史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开始和阶级斗争的规律一道起作用了；它

表现在欧洲超级强国——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盟主——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国、德国和沙俄的相继形成、竞争和衰落上。按照史军的意见，这一过程在今天以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暂时兴起而告完成。在史军的笔下，过去大国相继兴衰事例的清单成了关于“超级大国”的有垂训后人意义的教训成了毛分子“历史乐观主义”的依据。甚至史军在正确地援引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例证时，也用偷换概念的手法来宣布关于在现代不可能防止战争和不可能和平调整国际安全协定的论点，«红旗»将这种协定称之为“强盗的勾结”。（第六期三十六页）在«红旗»杂志上，世界历史被简化为“超级大国”的争霸，简化为各民族为争夺霸主而斗争。它被隔绝在真空里，那里没有生产力、文化、思想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在史军所叙述的历史里，没有建设性的积极的因素。

在这里，一些含糊的惯用语——“全世界革命人民”和“殖民地各国被压迫民族”，被系统地用来取代“国际工人运动”一词，以掩盖对国际无产阶级作用的否定。按照上面叙述的公式，在某些情况下，这一国家或那一国家的工人阶级可能被毛分子宣布为该国的“革命人民”的一部分；但是，按照«红旗»的说法，它却不是、也不可能是世界工人运动的一部分。这样一来，亚、非、拉工人运动被取消了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的斗争任务。这种避而不谈世界社会主义体系，避而不谈国际无产阶级的作用，而把帝国主义分子视为自己国家不可分离的主人的作法，不是由于国际工人运动反对毛分子的口号或过高估计了当代资产阶级的作用所引起的策略步骤，而是来源于“无产者民族”和“剥削者民族”神话的战略路线。

史军只用靠殖民主义掠夺得来的收入来说明帝国主义的强大。而实际上问题远不是这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向整个

“第三世界”销售的产品只占百分之二。如果说，在一九〇二——一九一二年间靠殖民主义掠夺得来的收入占西欧和美国的资本家的剥削收入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三至二十六，那么，现在大约占百分之二。对资本来说，生产率高的劳动是比落后国家的劳动——这种劳动的效率极低——更加有利的剥削对象。因此，无产阶级不可能不关心既消灭资产阶级，又消灭保留着世界资本主义资源意义的殖民制度残余。而“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经受着帝国主义者压迫的痛苦，帝国主义者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榨取的金额相当于亚非拉的每年总积累的一半。因此对帝国主义作斗争就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民族解放运动合作的客观基础。《红旗》杂志忽视了帝国主义的内部潜力：对工人剥削量的增加，国家作用的加强，军国主义化，采用科学技术革命的成就，扩大国内市场的容量等等，——不提这些，将使三大洲的爱国者迷失方向，把现实的帝国主义“铁老虎”变成为“纸老虎”。

毛分子否定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适用于“第三世界”。在“第三世界”出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中叶已然预见到了的资本主义因素的“上升运动”，正是为了克服这一运动，一些民族才选择了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为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所正确理解的民族解放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阶段的特点，如今没有在史军的公式里提出来。

《红旗》杂志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在阶级对抗社会里存在两种文化的学说。文章三次以嘲笑的口吻提到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的没落，但是，却一句也没有说到英国工人阶级愤怒反对鼓吹沙文主义。英国的宪章派写道：“确实，而且是令人遗憾的确凿事实是，在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角落，不列颠没有升起鲜血染红了的旗帜”。过了十年，英国工人的领袖、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朋友恩斯特·琼斯在监狱里捎回了这样的话：“在不列颠帝国

的殖民地上空太阳永远不落，而它们的土地上血迹永远不干”。

为了反苏，史军燃起了反俄情绪，重提莫须有的中国失地问题，并把沙皇俄国说成是“亚洲的宪兵”（第六期，第三十四页）。在沙皇的倭臣中，确实有一些想当亚洲宪兵的冒险主义者，但是他们没有能从英国资本家方面争过来这一角色。在弗·伊·列宁的«巴尔干和波斯的事变»一文中，谈到了欧洲的大国“都帮助俄国扮演亚洲宪兵的角色”。史军从这一段文字中挖出了这几个词：“俄国是亚洲的宪兵”，但是既没有提“戴王冠的强盗和国际资本的联合势力”，也没提弗·伊·列宁提出的“打倒任何形式的殖民政策！”的口号，然而这是最主要的。

整个俄国有过什么时候曾是中国的敌人呢？还在一八五八年，«现代人»杂志就翻译了太平天国的传单，而在一八六二年，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杂志上转载了英国议员约·布雷特反对英国干涉中国的讲话（约·布雷特的反殖民主义讲话获得了卡·马克思的称赞）。这是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受检查的刊物上对侵华计划表示抗议的唯一机会。

难道可以不谈从俄国到亚洲来的并非只是宪兵这一点吗？一九〇八——一九一一年，外高加索的四百名志愿兵抗击了俄国沙皇和波斯沙赫军队，保卫了伊朗的自由。沙赫刽子手活活烧死了十六名俄国革命者。君主专制对远东的冒险遭到了俄国工人的愤怒抗议。伊朗革命军敢死队员在俄国学习了街垒战术，印度爱国者从俄国学到了大规模罢工的方法。亚洲的革命者贪婪地学习俄国革命者的经验。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杂志«民报»第二期和第三期的首页上分别登了索·里·皮罗夫斯卡雅和米·亚·巴枯宁的照片，这不是偶然的。鲁迅也懂得官方俄国同进步俄国的区别：“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鲁迅全集»

卷四，第三百五十一页）。而孙中山同民粹派“到民间去”运动的参加者 H.K. 苏齐洛夫斯基通信也非偶然，因为俄国的革命运动最先以其斗争的一般民主性质对东方起了影响。最后，难道可以象«红旗»杂志那样，在议论亚洲革命的命运时不提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作用吗？

史军宣称中国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部分。（第四期，第二十四页）为了在民族主义基础上形成亚非“团结”，史军准备甚至避而不谈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和殖民地时代以前的亚洲的一般的阶级斗争。«红旗»杂志给“第三世界”国家提出了什么样的纲领呢？史军写道：“不可能设想，世界人民不经过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就能在一个早上把帝国主义消灭干净。但是只要全世界人民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长期坚持，百折不挠，帝国主义的必然灭亡，人民革命的必然胜利，都是毫无疑义的。今天，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为了一个一个地夺取革命的胜利，世界各国人民还将经历曲折的艰巨的斗争。”（第六期，第三十四页）而这就是一切么？当然，斗争是需要的，但斗争的目的是怎样的呢？这里没有社会改革的纲领，革命仅仅归结于取得民族独立。对殖民地以前的过去时期的辩解——史军的文章是从这儿开始的——不禁令人感到«红旗»杂志的社会理想是不是远在古代？

现在能够回答我们在一开始提出的那些问题了。«红旗»三篇文章的署名象征着继承“文化革命”口号的思想。这些文章只是那些在现在的中国早已流行的旧货色的新拼盘而已。而那些旧货色有许多是从被宣布为政治敌人的人们那儿借用来的。史军的说教——乃是红卫兵口号和六十年代初提出的大国主义野心的独特的综合。

史军的文章有两个方面。一是面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红旗»的言论有助于准确地了解毛分子在“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宣传的社会目标——即向与资本主义社会前的生产方式有联系的阶级和社会集团进行呼吁。毛分子为了争夺对这些阶层的影响，不得不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假面具，用充满民族主义色彩的平均主义观点来批评资本主义。史军的说教的目的是要使民族解放运动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和世界无产阶级。其反苏方针给发展中国家人民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和选择盟友造成了困难，并且取消了本着真正的革命爱国主义的精神来进行本民族的自我批评的任务。

«红旗»杂志编辑部竭力借助于貌似科学的论证来使中国人民相信毛分子方针的正确性。这里根本没有“发现”任何世界史的规律。史军的文章并非出于对科学的关心，而是想用新的手法继续执行对劳动人民进行蛊惑宣传的老政策。被歪曲了的“历史例证”只不过是燃起反苏主义和激起民族主义狂热的工具而已。

（译自苏联«亚非人民»1972年第5期）

关于中国领导违反列宁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的谈话

阿列克谢耶夫

近来，中国宣传机构发表了故意歪曲世界史，尤其是歪曲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运动史的文章。最近几期《红旗》杂志发表的史军的三篇文章，就是一个实例。

对这些文章的分析表明，现今中国领导人企图从理论上论证其在第三世界里的所谓特殊使命。为此，他们肆意伪造有关当代主要矛盾的问题，力图把世界历史进程说成是亚非拉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解放斗争，而不是当代两种对抗力量——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从而(×××)忽视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产物世界社会主义在世界革命进程中的历史使命。中国领导人××一个十分明显的目的，表明亚非拉人民为一方，中国为另一方的共同命运，从而企图论证其在第三世界革命人民中间确立霸权的奢望。譬如，《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的《学习世界史》的一文中指出，“学习世界史，使我们更正确地认识到，我国人民与亚非拉受压迫人民有共同的历史命运。我们有共同的反帝任务。因此，我们更自觉地在对外关系中，彻底实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将更好地履行自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坚决支持全世界受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

不难理解，提出关于三大洲人民和中国人民有共同命运的论点，是为了在第三世界国家里实行毛泽东及其亲信的大国沙文主

义方针。

«红旗»杂志的文章一个劲地重复什么取得革命胜利的中国应当对全人类的事业作出更大贡献的断言，正是为了这个目的。

所有这一切证明，中国领导人力图以自己的反科学的、与真正的科学毫无共同之处的民族主义论点偷换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科学性论点。

列宁从科学观念上论证了今天所谓世界革命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发展规律和途径。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向全世界受压迫人民指出了在反帝、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斗争中，在世界无产阶级联盟的基础上得到彻底解放的前景。民主革命解放力量依靠列宁的思想，利用战后时期的良好国际环境，(使) 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帝国主义的削弱以及殖民地当局的危机，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和支持，大多数的殖民地获得了彻底解放，成立了年轻的民主国家。

中国领导人的活动，他们分裂世界革命运动的政策，对民族解放运动采取的大国主义意图，客观上帮助帝国主义保存其在发展中国家里的经济统治，从而也保存其政治影响。

生活本身证实，在所谓尊重民族特点的借口下，把民族解放运动分割成个别的队伍和集团，以及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贬低国际工人运动积累的革命经验的作用，把一个国家——中国的经验绝对化，把它说成是万灵药的意图，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来说，是同样有害的。

亚非拉的革命力量在全世界的革命洪流中，越团结地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工人运动结成统一战线，反对殖民主义残余，争取加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独立与阶级自主性的民族解放斗争，就会越××。

(苏联莫斯科电台一九七二年七月四日华语广播)

列宁论当代帝国主义矛盾及其发展的学说

（摘　要）

普列特涅夫

第三部分：帝国主义的矛盾和当代现实

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帝国主义统治范围内的发展过程，只不过是整个国际生活中的各种复杂现象和事件的一部分。过渡阶段的各种矛盾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对抗。帝国主义本身的矛盾的“分系”同整时代矛盾体系的联系，是通过三条主要渠道来保持的：

——帝国主义同完全摆脱了它的压迫并坚定不移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各种力量的对抗；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同仍然处于它的压迫之下、但力求解放的各国人民的斗争；

——国际帝国主义同在政治上同它断绝了关系、但仍然受到它的经济压迫的各国人民的冲突。

为了延长它的寿命，帝国主义经常加剧国际局势，甚至直接进行侵略，例如在越南和近东，公开地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对各国人民进行讹诈。但是它无法使历史车轮倒转。帝国主义在世界上的地位正在不可挽回地削弱。它不论用什么办法都无法摆脱无情的敌人——使它自己毁灭的自身的矛盾。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不用动员和集中反对帝国主义的各种力量，它就会“自然而然地”垮台。相反，日益加强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劳动人民、国际工人阶级和摆脱了殖民主义桎梏的各国人民的反帝同盟，还需要对帝国主义势力进行相当艰难的斗争。在目前情况下，正确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帝国主义阶段的客观规律性和内部矛盾、估计帝国主义势力同世界革命过程的力量对比的今后变化、及时揭露和揭穿辩护者企图歪曲帝国主义本性和对帝国主义的潜力和弱点所作的不真实评价，这都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因此，«红旗»杂志第六期发表的和今年六月十二日北京的«人民日报»转载的署名为史军的文章«读一点有关帝国主义的历史»，是引人注意的。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再次要人相信，“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这种至少是肤浅的评价中，可以看出对帝国主义在历史上的凶险作用毫无所知和企图使人类忘却帝国主义所犯下的各种罪行。帝国主义不仅仅是最后的一个剥削制度，而且是最强大的一个剥削制度，虽然在世界革命发展过程的打击下它被迫地并且也是必然地将放弃它原来的阵地。而北京的可怜的理论家们却继续(已经多少次了！)用很不自然的宽容态度把武装到了牙齿的帝国主义反动派同对人无害的狂欢节上的稻草人相比拟！上述文章的作者在评述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的作用时，也显示了同样的深刻(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态度，结果，这个规律被归结为这样一条“原则”：“我上去，你下来”。这不成了玩快乐的跷跷板了！然而，帝国主义的历史证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更加复杂、更加断断续续、更加冲突。列宁主义对这个规律的提法是考虑到发展的跃进性，帝国主义者在加强实力方面的互相竞争，帝国主义势力的冲突，而主要的是无产阶级向社会主义的革命突破的可

能性和必然性，而不是“上下”的机械摆动。

但是，北京的“历史教员们”在确定帝国主义的基础和当代矛盾的性质方面最公开地反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这一理论的发展。听了这些“教训人的人”的话，就好象是，帝国主义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在其最高和最后的阶段的发展规律产生的，而是由国家的大小产生的！例如，他们要人相信，既然苏联是一个大的国家，它就可能同美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相比拟！在署名为史军的文章中说，“两个超级大国又勾结，又争夺，企图称霸世界”。当然，没有任何必要去驳斥对苏维埃国家的这种无耻的诽谤，这个国家在几十年过程中奋不顾身地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和无私地支持世界上所有反帝力量。在北京的历史教员的描绘中，谁是反帝战士呢？原来，这是“大、中、小国家”。原来一切都很简单：反对“超大的”正是“大的”、“中等的”和“小的”。在北京聪明人那里，算术大小的冲突代替了就其社会本质来说是对抗性的力量之间的现实斗争，他们的魔术代替了对时代的现实矛盾的具体分析，整个世界的“阴暗场面”代替了国际舞台上各个阶级的斗争。

北京讲授这种“历史课”并不是偶然的。这些“理论”言论的目的，是要掩盖北京政治家们在国际关系和外交方面的实际行动。大家知道，北京领导人同西方活动家多次会见时确凿地承认，今后仍将反对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但是，据西方报刊说，毛派领导对欧洲共同市场“表现了积极的兴趣”，特别是欢迎由于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而使它扩大了。北京政治家们毫不掩饰，他们把欧洲经济共同体看作是对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抗衡物”。他们也在其它大陆寻找对反帝力量的“抗衡物”。

不久以前，北京政治家们对美国黩武主义者在太平洋地区及其它地方的“存在”表示关心。这种关心看来是出于这样一种企

图：对那些抵制毛分子本身大国外交路线的努力进行抗衡。他们想从理论上掩饰自己不体面的外交勾当的企图也是由此而来。但是，世界人民从帝国主义历史中所吸取的教训，并不是北京力图要他们记取的那些教训。所以，他们处处警惕帝国主义反动派的一举一动，揭露帝国主义反动派意识形态方面的诡计。

在反对帝国主义阴谋的斗争中，世界各国人民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受到苏共二十四大所提出的和平纲领的鼓舞。今后将为实现列宁党的历史性会议所提出的对外政策任务而进行激烈的和长期的斗争。

（摘译自苏联《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1972年第9期）

北京的“世界战略”后面掩盖着什么

（摘　要）

雷　巴　科　夫

北京对外政策的主要的、最典型的特征是不加掩饰地力图确立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领导权。中国报刊开始发表一系列旨在论证中国这一特殊使命作用的理论文章，据称，中国应当领导世界人民反对“腐朽力量”的斗争，应当“团结各国、各民族、各国人民彻底战胜两个超级大国”。在这几篇材料中，作者强调指出，美国和苏联“走向没落”，“它们的破产是必不可免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影响日益增长”……（«红旗»第四、五、六期）。

……北京领导人对巩固国际稳定局面、保障和平和各国人民安全不感兴趣，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在保持国际紧张局势和最大国间极端尖锐的关系，在现代国际关系中造成新的力量的两极分化，才能够实现他们的霸权主义的计划。虽然毛分子现在并不直截了当地讲：国际形势新的尖锐化会使他们称心如意。但是，北京的理论家们在断言目前世界形势的特点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天下大乱”的时候，恰恰还是从上述心情出发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的一篇纲领性的文章中说：“今日世界形势的特点就是‘乱’，或者叫‘天下大乱’。”（«红旗»第四期，第十六页）这个论点反映了中国领导人不满意今天的国际关系局面，这个论点追求的目的在于论证世界发生变动的必要性。而在种种变动中，国际事务的领导权将会转到中国手中。

……

……在中国宣传的描述中，今天的世界只是帝国主义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和“瓜分势力范围”的场所(«红旗»第五期)。在这里，毛分子借助于卑劣的诽谤和与现实生活毫无共同之处的挑衅性的教条，力图把各国人民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自然而然的不信任转嫁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身上。他们给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加上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头衔。北京宣传者甚至于把话说到这种份地：帝国主义国家所固有的规律，也为苏联所固有。«红旗»杂志断言，超级大国，“不论是资本帝国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都必然要受帝国主义规律的支配，走霸权主义的老路”(«红旗»第五期，第二十页)。

……

近来，毛分子特别频繁地重复毫无阶级内容的一个论点：出现了“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某种“历史潮流”。(«红旗»第六期，第四十页)在这里，“革命”被中国领导人主要理解为“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姚文元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日的讲话)。

……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中国领导现在宁愿掩饰其人所共知的立场。毛分子竭力不发表可能被人评价为公开赞成战争的声明。号召开展“武装斗争”、“人民战争”等等的调门被压低了。北京精心地避免可能引起中国与帝国主义大国发生冲突的行动。

然而实际上，毛分子并没有放弃中共九大上提出的、由于现代世界所谓基本矛盾的发展，“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观点。这一论点，在今年«红旗»杂志四月号和五月号的理论文章中重又出现了。诚然，这次采取更为隐蔽的形式。北京煽动中小国家不要畏惧“纸老虎超级大国”，“拿起武器”，“打败一切帝国主义侵略者”(一九七

一年十二月八日乔冠华团长在联大的发言)。«红旗»的文章强调说:“在今天反对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斗争中,只要……‘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红旗»第四期,第十八页)

(摘译自苏联«国际生活»1972年第10期)

在毛主义哈哈镜里反映出的世界史

茹科夫、克里夫佐夫、费托夫

中国的现状证明了毛主义在思想政治上的深刻危机和人民对现政权稳固性的怀疑情绪日益蔓延。在一九七一年九月事件中，继著名的党的活动家陈伯达之后，国防部长、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的正式接班人林彪和几名高级军事首长一起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这个事件暴露了北京上层领导的又一次分裂，不过这次分裂更为严重。这次分裂给毛分子的思想政治立场以沉重打击，明显地削弱了他们的队伍，据种种迹象判断，发生这次分裂的原因是在中国对外政策方针进一步面向帝国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这个问题上有争论。

反对改变方针的人想必曾得到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某种支持。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毛分子在上述事件过了半年多之后，迄今还在继续大骂“被识破的骗子”，以他们所遭到的命运恫吓所有明里暗里对现领导“特殊方针”的可疑的明智和远见表示怀疑的人。怀疑最初是由于经济领域里的“大跃进”的破产而产生的，之后是由于“文化革命”产生的，显然，这些怀疑不仅没减少，相反，而是增加了。可以证实这一点的是在开展大规模的恐怖运动——这一运动本身就令人想到是政权的上层和其他环节各派信仰者之间无休止的潜在斗争——的同时，北京官方宣传机构正在寻找种种手段来巩固中国群众对毛主义已经动摇不定的信仰。北京宣传机构懂得，在现今的条件下单靠发指示是无济于事的，他企图为大国

沙文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和反苏的政策提出“理论根据”。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刊登的史军关于世界史的三篇文章就是证明这种努力的例子之一。三篇文章是:«读一点世界史»(一九七二年第四期,第十六——二十一页),«再谈读一点世界史»(一九七二年第五期,第十八——二十四页),«读一点有关帝国主义的历史» (一九七二年第六期,第三十三——四十页),这些文章实质上是宣扬沙文主义和中国中心主义。

无疑，史军的文章是有指导性的，是为一定的政治目的而写的。其目的在于:从毛主义反科学的大国主义立场出发,伪造历史发展的过程,将全人类进步的主要结果一笔勾销,特别是歪曲革命历史进程,把世界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混为一谈,把一切革命运动都归结为民族解放运动,并且把中国描绘成“第三世界”的先锋和首领,“论证”毛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的必然性。用事先定好了的毛分子领导霸权野心的公式来硬套世界历史进程。

作者随意编造的历史规律，不单单是为北京大国方针和全球霸权思想辩护，而且也是为了把这种历史规律说成是世界历史全过程的“自然产物”。

我们这里评论的这几篇文章犹如“预映”毛分子打着“历史规律命令”的幌子在争霸斗争中准备采用的全部战略;在现阶段，这一战略首先表现为反苏战略。

正因为如此，在作者随心所欲地解释民族解放运动史和革命运动史基础上构设的公式中，完全抹杀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社会主义体系——当代主导力量——建立和发展的世界历史意义。国际工人阶级——革命改造的主人公、历史进步的代表也没有被提到。其结果是,完全颠倒了世界舞台上阶级力量的对比。作者既“没有发现”资本主义总危机,也“没有发现”两个世界体系的对立。没有指出发展不是分为人类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世界发展

清楚的主流，而是在世界上充满了“乱”和“天下大乱”，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外族进攻”和“内战外战”都说成是“乱”和“天下大乱”（第四期，第十六——十七页）。把“天下大乱”解释为“是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尖锐化的表现”。用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这些传统概念来简单化地解释社会政治过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这样，自然就产生一个问题：世界上究竟还剩什么呢，什么是当代世界的极和历史发展的动力呢？如果抛开表面的词藻，那么史军所指的一极和动力不是阶级的，而是民族主义的、种族主义的和地理政治论的。总之，史军是以资产阶级方法论惯用的均势范畴来衡量极和动力的，史军所作的估价是适应北京的大国主义欲望的。

按照毛主义地理政治论概念，在史军的所谓“天下大乱”的一极中有两个“超级大国”（苏联和美国），这两个国家都是反动势力和剥削制度的代表者，都是两个超级大国之外整个世界的压迫者。作者把两个社会制度根本对立的国家混为一谈，同时企图把世界上必然存在着的对美帝国主义的不信任转嫁到苏联头上，企图削弱苏联共产主义建设榜样对中国人民、发展中的国家和人民以及世界人民的吸引力。

至于“第三世界”的国家，史军人为地抹杀它们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多样性。“第三世界”，既是“乱”的主要地区，同时在“乱”当中又有其不仅同当代其他主导革命力量分开，而且与之对立的独特的共同性。

史军断言，似乎“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任务不是积极参加全世界的社会改造，不是选择进步的发展道路，而是在抵制“超级大国霸权”的幌子下反对苏联和世界社会主义。直接挑拨“第三世界”的国家进行这种斗争。作者预言，“两个超级大国的侵略和压迫正在迅速唤起世界各国人民的新觉醒，正在促使广大的发展中的国家联合起来。”（第五期，第二十四页）他偷偷地塞进“两个超级大国”

的反苏观念，企图使人相信“第三世界”反对苏联的斗争的历史必然性和规律性。这里，毛主义内心深处的愿望暴露无遗：把年青国家推上不稳当的反苏道路上，走这条道路，他们要么将成为帝国主义唾手可得的牺牲品，要么寻求北京的保护。显然，这样的目标同发展中的国家的根本利益是相冲突的。但是，这并不会使毛分子感到难堪，因为，他们指望在自己的争霸斗争中得到“第三世界”中的反共分子的响应。

这几篇文章中还谈到了“中小国家”，作者把他们说成是某种统一的东西，也和“第三世界”的情形一样，应该献身于“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毛分子把除了美国以外的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在臭名昭著的“中间地带”理论中，毛泽东把这些国家通称为资本主义国家）都归在这个国家的堆积物上，把赌注下在这上面可以证明，北京仍然打算拼凑由各种国家组成的反苏同盟，以便利用这些国家来执行自己的大国主义方针。

史军写道，“由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第四期，第十六页）。还写道，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行动“都是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垂死挣扎的表现。它们已经和正在激起全世界人民和广大中小国家如火如荼的反两霸的正义斗争”（第六期，第三十九页）。这里暗示，将由北京自己根据这些国家对“超级大国”斗争的程度如何来判定他们的历史作用。

这些议论的意思很明显：既然当代两个互相对抗的力量——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时代“正在过去”或“已经过去”，那末取代它们的应当是一支新的力量——中国，随着北京被确认为世界政治中心，中国应该占据它们的位置。

此类“历史发现”首先是为了给中国居民灌输一种思想：应该有耐心，应该继续不顾一切地遵循毛泽东制定的方针，中国称霸全球的“时钟敲响了”，因为“历史本身就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

在史军的文章中，中国是作为决定性力量出现的，这种力量“欢迎”当前世界上的“乱”，把它看作是“伟大的革命时代中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正常现象”。这恰恰暴露，在抛开评价“乱”的一切社会政治标准的情况下，作者之所以要歌颂“乱”是有实用主义目的的，即为了证明毛分子的一系列假设是正确的。首先是试图给毛分子著名的世界发展概念找到“历史根据”，在此基础上，把战争和世界冲突奉为促进革命过程的主要兴奋剂。实质上，这等于是指望国际紧张局势，把它作为使两个世界体系国家关系尖锐化的普通条件。

此外，史军的全部议论都是服从这一思想的，即只有中国和毛泽东（这几篇文章就是用毛泽东语录凑成的）才能够在“乱”中洞察历史前景，为它指出“革命”方向，突出北京现在称为“七十年代的伟大趋势”的“反对超级大国的斗争”。把革命进程和反对“超级大国”的斗争混为一谈，并从这个角度来评价革命力量。实际上，这是一个纲领，其目的是打着冒充革命和“反对超级大国争霸”旗帜的毛分子反苏战略旗帜，动员“第三世界”国家和其它力量。这实质上是一个把“第三世界”看成是毛主义称霸范围的纲领。

史军企图用强调中国和“第三世界”是连在一起的来掩盖这一概念的实质，他说，“中国和亚、非、拉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属于第三世界的，都是患难与共的战友”。（第四期，第十九页）

如果注意到毛分子把反苏主义作为自己政策的基础，并要人相信似乎“第三世界”同苏联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向“患难与共的战友”发出的呼吁的意思就完全清楚了。作者公然竭力地阉割当代世界发展的极其重要的社会内容，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同他们的天然盟友——世界社会主义和国际工人阶级以及其他大洲各国人民相对抗。

史军企图把世界历史进程说成是证实了毛分子关于亚非拉是

革命过程的唯一力量的论点；他把“第三世界”的兴起称作是它本身斗争的“必然趋势”，把这一力量同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割裂开。(第五期，第二十三页)他宣布，这三大洲人民“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伟大贡献”，又突出了这些人民同中国在命运和革命传统上的“共同性”。

对上述三洲人民的历史作用确实应该给予最高度的评价。但是问题却在于，史军作这样的评价是故意夸大和居心不良的，而仅仅是为了：第一，使这些人民同社会主义大家庭相隔绝；第二，为中国在“世界革命人民”中间称霸“提出历史根据”。他写道：“读一点世界史，可以使我们更亲切地了解我国人民与亚、非、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有过共同的历史命运，今天又面临着共同的反帝斗争任务，从而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第四期，第十八页)。因而，照毛分子的解释，中国人民和三洲人民命运的“共同性”，是由历史形成的“贯彻执行毛路线”的前提，也就是说，实现毛派领导的大国方针的前提。

因而，应该直言不讳地说，虽然最近时期中国宣传机构和在联合国的中国外交官发表了不少关于“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的声明，但所有这些声明起码是奇怪的，因为很清楚，无论从实质上，还是从中国首领们经过掩饰的、但众所周知的要求在世界上取得政治上和思想上统治权的观点来看，中国都不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在中国为了内政的需要而推行的封建时代的大汉族主义残余，关于似乎亚洲大多数国家曾依附中国人以及中国民族在种族上比其他各民族优越的概念，就是这些在“文化革命”时期特别明显地暴露出来的要求的基础。

总之，史军要求(并作了示范)“读一点历史”只是为了从历史中“得出”下列结论：在一“极”是“两个超级大国”(这样就否定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体系的根本对立)，而另一“极”则是第三世

界和“已被历史确定”起领导作用的中国；世界发展的趋势是进行“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而这一斗争具有“历史规律”的特点。

尤其是在第三篇文章中，史军竭力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关于帝国主义从历史上必然灭亡这一原则也完全适用于世界社会主义。英帝国的兴衰史被他说成是“认识现代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一面镜子”（第四期，第十七页）。

史军及其思想感化者暗示，说什么“社会帝国主义”这个词他们只是指苏联这个“超级大国”，说的是苏联的灭亡。第一，这就再次露骨地强调，毛分子把实现其大国主义阴谋首先同诋毁苏联的立场联系起来。第二，他们只不过把反苏看成是颠覆和消灭整个世界社会主义的最有效的手段，而这是符合毛的“打其头，而其余不击自溃”的“指示”的。的确，那种企图使苏联同社会主义大家庭其他国家分隔开，或是使社会主义大家庭其他国家同苏联相脱离的做法，都极其严重地损害世界社会主义的利益和阵地，这还有谁不明白？

毛分子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分析已被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关于当代特点及其主要矛盾的结论所全部推翻。

生活每天都在证明共产党人下面这些总的结论是正确的：即列宁主义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工人阶级和民族解放运动这些当代伟大力量统一的革命进程，以及在反帝斗争中日益密切的联合和相互影响的论点在当代得到具体体现。当代的主导因素——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决定性影响也日益明显。而毛分子为适应其具体化为反苏战略的大国主义野心，歪曲当代主要矛盾，把世界社会主义排除在革命力量之外，并在实际上把革命力量仅仅说成是民族解放运动，并顽固地坚持把后者同世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他们在表面上大捧民族解放运动，但实际上却在破坏这个运动，因为他们妄图分裂当代基本革命力量

的团结，使之互相对立，使亚非拉各国人民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唆使这些国家的人民反对其主要战友和盟友。毛分子修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结论，全面展开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斗争，实质上也就是抛弃了自己以前的一系列论点。

毛分子在颇为出名的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还把"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称作是当代主要矛盾。而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却放弃了这一立场，把"各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矛盾"说成是当代主要矛盾。

可以看出，对主要矛盾的看法现在已完全用来适应毛分子的大国主义战略，反映出这种战略的主要目的——利用第三世界——而反苏主义则是北京作为主要赌注来实现这种战略的手段。显然，毛分子领导认为，该是以世界历史这个有权威的东西为这种"理论"结论的过分赤裸裸的民族主义动机提出根据了。史军的文章也是为了这一目的，他顽固地力图向其他国家和人民证明，中国应成为唯一的"标准"，成为万能的社会主义"样板"。

史军全面伪造历史，他拚命想改变苏联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抹煞苏联对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所建立的公认的功勋。例如，他故意不提在卫国战争年代从法西斯奴役中拯救人类的苏联人民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功勋。他在几次提到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因为这实在没法迴避)后，作了如下的论断：似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全部历史也就此结束。更有甚者，他还竭尽恶毒诽谤之能事，重弹最赤裸裸的反共宣传老调，散布苏联"完全继承了沙皇帝国主义的衣钵"的腔调，因而也逃脱不掉与沙皇同样的命运(第五期，第二十二页)。

史军捏造了一个又一个谎言，说是第一个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复辟资本主义。他一笔勾销苏维埃国家半世纪来所走过的整个历程，竟然滑到这种地步：在叙述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各国人

民的历史时添上对苏联的诽谤。真是连篇累牍的捏造。作者竟然到了这种地步：竭力把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作为把美国和苏联的社会政治历史发展规律相提并论的“根据”。他把苏联描绘成似乎是实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国家(它完全“沿用”沙俄政策)，是一个由……帝国主义发展规律决定其整个内部演变的国家。

史军的挣扎真是可怜。首先，在他的叙述中，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理论本身被歪曲和被庸俗化了。尤其是从这一理论中实际上阉割了关于帝国主义经济因素和内容这些极其重要的论点，从这点上说，作者很象资产阶级理论家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毛分子这样做是有其原因的。用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来分析苏联，真是荒谬透顶，只要对这个问题的经济方面，尤其是对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态度以及苏联经济政策的社会目标进行具体研究，就会彻底摧毁这种荒诞的谬论。我们顺便指出，北京经过“更新”的对美政策，使毛分子在评价美国帝国主义这个世界剥削者的作用时有所克制。

史军的“两个超级大国”概念有特殊的倾向。史军实际上要求用全力打击苏联。为了向读者灌输这一思想，他采用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言论进行投机这一毛分子的典型手法，并且引用弗·伊·列宁关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不同反对机会主义斗争联系起来就是一句骗人的空话的论点(第六期，第三十九页)。既然毛分子认为所谓的机会主义指的就是苏联，结果列宁的威望被史军用来号召首先反对……列宁缔造的国家！简直只有最卑劣的政治破坏者才会进行这种伪造。实际上，在史军看来，把同“革命”斗争和“确立社会主义”斗争混为一谈的反对“超级大国”的斗争，是主要为了消灭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现实的、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的斗争。

史军之所以须要讲帝国主义历史，还有一个非常实际的目的——为毛分子战略中继续保持的指望爆发“大战”、苏美武装冲

突提供“论据”。为此，他又采取非常特殊的分析近代史和现代史上的“基本矛盾”的方法，单提出其中的一个——“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第五期，第二十页）。他把近代史和现代史描绘成“殖民主义大国之间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争霸的时期”。他认为这些国家的政策就是美国和苏联今天的政策的典型，把它们的关系称作是“帝国主义强盗联盟”和“争霸”，建议看看英国历史，弄清楚苏美“既勾结又争夺的过程”（第六期，第三十六页），“翻翻美帝国主义的历史和沙俄帝国主义的历史”。说什么这“对于观察今天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和其他一些国际问题，是有很大帮助的。由于帝国主义的本性，它们之间的勾结是会经常进行的，它们之间的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是无法调和的”（第五期，第二十二页）。

史军在胡诌近代史和现代史时向读者抛出了又一个炮制出的历史规律——苏美冲突“不可避免”。毛分子需要这样作，是为了迫使各国人民照着这个假“规律”而行动，为自己加剧紧张局势、挑起苏美冲突的政策辩护。

这几篇文章的特殊逻辑无疑反映出其思想体现在史军大作中的那些人“历史思维”的特殊逻辑。

如上所述，史军认为，世界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作为积极的历史力量已不存在，中国之外的社会主义奇怪地在“消失”。他写道，因为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后，“近代史进入了第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一六四〇年的英国革命到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第二时期从一八七一年到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原作者注），即“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还刚刚在“走向胜利”的时期（第五期，第十八页）。因此，人类是否有幸进行“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进入“真正的”现代史阶段，完全要看中国是否将“对于人类有较大贡献”（第四期，第十六页）。

在“中国对于人类的贡献”和“为世界革命服务”的招牌下，偷

偷地塞进在全世界“中国伟大”的说法。“世界革命”成了中国霸权思想的暗语。

毛分子在遵循自己的方针的同时，特别注意对历史的“探讨”并非偶然。

历史科学(更确切地说是历史伪造)在中国首先被传统地广泛运用于灌输中国中心主义的观念，多卷的中国历代编年史可以证明这一点。毛分子从中国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还继承了伪造历史的本领。

他们早就在歪曲历史科学各方面的事实，其目的是本着他们观念的精神来捏造“历史规律”。伪造历史是他们的政治手腕。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毛泽东制订的并于一九四五年四月通过的中共中央特别决议，决议规定按照毛的个人迷信和他的“路线”的绝对化来完全修改党史。北京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周年的文章(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是这方面的最后一个步骤。

五十年代，中国曾不止一次地掀起颂扬成吉思汗的运动。再晚一些时候，中国历史学家韩儒林宣称成吉思汗的功劳是“灭国四十”，而把中世纪汗的残酷和暴行捧为对被征服的各民族的“恩惠”，说是这使他们“看见了有更大的世界可以活动”。韩儒林承认，“灭国四十是不会没有流血和破坏的”，可是，成吉思汗却使那些“封闭本国人民的耳目，和外国隔绝起来”的人完蛋了，给了这些民族“在经济文化上创造互相交流互相学习”的条件。(《历史研究》，一九六二年第三期，第九页至第十页)

有趣的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也使中国流了血的征服者却受到赞扬。但是，看来毛分子甚至宁愿把本国人民的奴役者都列入“民族英雄”的名人公墓，因为，以灭国数十个的途径来无限扩张到“小天地”以外的“历史范例”使他们眼花缭乱。

史军的文章通篇充满的正是这种霸权主义和中国中心主义的精神。这些文章与毛分子史料研究早先的赝品的区别在于，文章

提供了在世界近代史和现代史接近当代的时期范围内进行研究的方针，研究的对象是那些应当直接成为以反苏主义为核心的毛分子对外政策战略基础的“探讨”的方向和题目。

还从这一观点出发来歪曲世界历史发展的任何里程碑和事实。这不仅是指史军的漏洞百出的概念。所有“阻碍”北京霸权主义计划的东西，都被毫不客气地从川流不息的历史洪流中抛出来（或者是受到歪曲）。这特别是指那些证明社会主义在当代世界起主导作用的事实。

例如，史军显然走上了从民族主义的和种族主义的立场出发，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同欧洲人民对立起来，他不承认后者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的任何功绩。换句话说，他号召对欧洲的文明和文化采取虚无主义的和彻底推翻的态度。

史军以装模作样的热情空谈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而迴避这一运动高涨的具体的历史环境和原因，迴避对这一运动高涨的形式和进程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迴避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共产国际、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对中国革命的成就是怎样的决定因素。史军认为还是讲早已过去的时代和避而不谈现实为妙。所有这一切不是偶然的，因为毛分子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态度是实用主义的和霸权主义的，而有时简直是背叛性的。大家都记得，在与中国接壤的东巴基斯坦人民最近最大的一次民族解放运动中，中国首领曾站在镇压这一运动的刽子手一边。

出于同样的原因，在颂扬亚洲的作用的时候，没有提到伟大的亚洲国家印度（只谈了与俄国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有直接联系的问题）。出于同样的原因，在拉丁美洲，史军看到了“拉丁美洲国家规定二百浬沿海范围的斗争”，但却看不到古巴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降临西半球。

在史军的文章中能够找到不少就形式而言是老掉牙的、就内容来讲是蓄意歪曲的论调，例如：“推动历史前进，推动科学文化

发展的，是千千万万的奴隶。”可以说，这里毛分子稍稍暴露了一下自己的嘴脸。首先他好象向被压迫的群众申诉，把自己说成是他们的保护者，对他们阿谀奉承，而实际上掩盖两种制度的斗争，仅仅力图利用劳动人民的力量作为远远脱离人民群众利益的政策的资本。近十多年来，中国的整个事态进程证明了这一点。此外，把人民群众同奴隶们混为一谈，是出于对毛的崇拜，和迷信以前的中国皇帝一样的对毛的个人迷信所固有的轻视群众的心理。

说什么一七八九年开始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持续了八十多年，而一七七五年开始的美国革命持续了近一百年，这些论点也可以认为是北京历史学家的科学“发现”之一。“经过这种长期的斗争，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才巩固了自己的统治。”这种无知的箴言，看来是为了使人忘记社会主义革命同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的原则性区别和使幼稚的读者相信一切革命的转折都是缓慢的，并以此为中国“历史状况”的停滞找根据。

这里引用的事实以及所分析的文章的全部内容表明，毛分子关于历史进程的说法是令人不能容忍地反科学的。显然，毛分子遵循其反社会主义的沙文主义的和冒险主义的方针的内在逻辑，实质上采用了无所不至的伪造手法。正因为这样，在史军的文章里假革命的激情多于具体的历史分析。

在我们所分析的文章里，不止一次重复了关于毛泽东“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以什么来说明这一武断的论点呢？首先是以毛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一著名论断。被毛本人称为“战略性”的这个方针，使那些宣称“毛主席的论断是我们战胜帝国主义的强大思想理论武器”的倒霉的北京历史学家们欣喜若狂。

但是不难确信，这一“理论”离真正科学揭示帝国主义的本质甚远，一方面它产生不负责任的冒险主义，因为它无视反帝斗争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它最终导致投降主义，因为它以空洞的口号来

代替现实的、具体的、实际的反帝斗争。但是，北京的伪造家们恰恰满足于这种不大高明的历史哲学家并不是偶然的。这样他们可以不必分析世界革命过程中的真实情况，不必揭示世界革命进程的动力，和研究阶级斗争的各种具体表现了。说句不客气的话，毛的这一“理论”在北京领导集团的手中早就被用来促使其他国家和人民采取冒险行动，同时还替北京所执行的向帝国主义送秋波的政策辩护。

* * *

史军的文章对中国历史科学提出的任务是明确的：通过歪曲历史材料的途径来“论证”和加强毛分子领导集团的政治方针和大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方针。对世界史及其各阶段和规律提出的反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公式也与此相符。

刊登在毛分子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的史军的文章是为谁写的呢？首先是为宣传机构写的，因为宣传机构看来已经是黔驴技穷，并且需要“精神弹药”的补充，以便继续制造许多谎言来鼓吹使中国居民相当厌烦的反苏主义。为了“令人信服”起见，在把世界史掐头去尾以适应毛分子各种说法的情况下，自充世界史权威。史军直接提出了“写出几本简明通俗的世界通史”的任务（第四期，第二十一页）。这些“通俗的”书目的是掩盖人类的现实历史并把中国人民对世界的认识归结为毛主义的政治信念。

当然，史军的文章其次是为帝国主义反动势力、所有反对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人以及整个反共阵营写的。史军的大作为这些势力理解中国领导集团政策的反苏方针提供了相当明确的指南。

最后不能不指出，史军的作品是毛分子道德上和政治上完全蜕化的某种证据。它们表明，明显的谎话和伪善是毛分子的方法和武器。毛分子大国沙文主义的欲望是这样的，历史真理本身和反映这一真理的历史科学将反对这种欲望。

（译自苏联《共产党人》1972年第16期）